[德]弗兰茨·瓦尔特 /著
张文红 /译

社会民主党往往是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和萎缩时期，然而随后总是能够令人惊奇地再度恢复元气。作为雄心勃勃的受亏待者的反对派运动，它总会通向活泼沸腾的再生的源泉。但是，一些人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民党不再是解放运动，而更多地是作为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政党处于其历史的秋天。作为新发迹者的利益群体，社民党在21世纪将发挥另一种作用。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

Deguo Shehui Minzhudang:Cong Wuchanjieji Dao Xinzhongjian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Ouzhou Shehui Minzhu Zhuyi Ji Ouzhou Shehuidang Yicong

瑞典与“第三条道路”：
一种宏观经济学的评价

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思想、理论与全球化

德国社会民主党：
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

荷兰的奇迹：
荷兰的就业增加、福利改革、法团主义

新工党、新福利国家？
英国社会政策中的“第三条道路”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
1980 年以来的左派及其经济政策

梦想与内疚：
法国社会党一百年

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能力：
执政政策在西欧面临的挑战及其总结

ISBN 978-7-5366-9596-2
9 787536 695962 >
定价：26.00元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编委会

顾问：殷叙彝　主　任：王学东

成员：王学东　张文成　刘庸安

贺和风　林德山

[德]弗兰茨·瓦尔特　/著

张文红　/译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

Deguo Shehui Minzhudang:Cong Wuchanjieji Dao Xinzhongjian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ie SPD.Vom Proletariat zur Neuen Mitte by Franz Walter
Copyright © 2002 by Alexander Fest Verlag Berli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Verlag GmbH,Reinbek bei Hamburg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根据德国 Alexander Fest Verlag Berlin 2002 年版译出，重庆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 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德]瓦尔特著;张文红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ISBN 978-7-5366-9596-2

Ⅰ.德… Ⅱ.①瓦… ②张… Ⅲ.社会民主党—党史—德国 Ⅳ.D751.664-09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
DEGUO SHEHUI MINZHUDANG: CONG WUCHANJIEJI DAO XINZHONGJIAN
[德]弗兰茨·瓦尔特　著
张文红　译

出 版 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　玮
责任编辑:别必亮　　责任校对:李小君
版式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13.5　字数:205 千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册
ISBN 978-7-5366-9596-2
定价: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总　序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主要政治思潮之一,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是对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出现的社会分化、工人贫困、劳资对立等"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后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社会民主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1848年革命前后,当时自称或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派别大体分为三类:主张"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主张"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前两个派别主要从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养分,把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的那些社会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而后者则以布朗基派为代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思想传统,所以也被称作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毫不犹豫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参加并领导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们有时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和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采用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结合成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在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决议中越来越多地采纳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逐渐取得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同义语。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生分化，逐步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原第二国际左派与右派、中派彻底决裂，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右派和中派则重新联合起来，维持原来的名称并明确地对社会民主主义作出改良主义的解释。此后，原来在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斗争，变成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外部对抗。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由于与左派的革命理念决裂而成了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同义语。而社会民主党人为了突出自己与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的根本对立，开始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继续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并开始了通过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和推行社会民主改革的实践。

二战结束后，以 1951 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及其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发表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被正式确定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目标，并开始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与 19 世纪末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渐从各国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消失，而当年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却日益发展并在各党的纲领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制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彻底实现，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不再被理解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壮举，而是一项持久的改良任务。此时，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虽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然已经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概念重新界定，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则起到了把新、旧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区分开来的作用。

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西欧各国社会党已普遍认同了现行社会体制，作为体制内的合法政党与其他政党轮流执政，成为欧洲中左翼政治的主要代表。西欧多数社会党都有过较长时间的执政经历，有的党甚至长期连续执

政。它们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积极扩大国家干预职能，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对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控，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各国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高峰。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结束了。面对经济"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高成本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难以为继，民主社会主义呈现出整体衰落的趋势。从70年代末开始，新保守主义政党陆续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其特征是放松国家控制，大力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和税收政策，限制工会权力，削减社会福利。在新保守主义的进攻面前，社会民主党人因缺乏有效对策而陷入被动防御地位。

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征候更加明显。各国社会党不仅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急剧减少，而且理论上迷惘退缩，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出现认同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爆发了关于是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它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最终没有得出正式结论，但实际上现在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党国际）已很少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更偏爱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我们这套丛书所收著作的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

概念的变化反映了西欧社会党力图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应对时代的挑战，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巨大转型压力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向被设定为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改良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而只是强调这种制度替代的和平性质和渐进性质。而此时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尽管表面上的理由是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上是要彻底清理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其目的不是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使其同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决裂，抛弃一切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整体性制度替代的东西，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

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或"现代化"成为西欧社会党转型的主题词，在此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从思想理论到纲领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转型很快为西欧社会党带来了回报。90年代中后期，西欧各国社

会党陆续走出政治低谷，进入了一个政治复苏期，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3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就有一些社会党相继下台，仍旧执政的党则面临着许多政治和经济难题，特别是如何改革社会福利国家的难题。

20世纪末以英国工党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相应提法是"新中间"），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了一个新的载体。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宣称，"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第三条道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目标是要超越左右两分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既不走老左派"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也反对新右派完全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在继承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公正、互助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又让经济富有活力的新路。"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转型压力作出理论回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它的成败得失还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由各国社会党的实践来证实。

总而言之，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历史性分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渐行渐远。尽管有一些社会党或党的领导人迄今仍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来源之一，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现在仍然是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之一，但是从总体上看，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论证的科学性，只抽象地设定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反对提出任何全面的制度替代方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把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为变革社会的唯一途径；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成为所谓的"人民党"。

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性的区别，但是从广义上讲，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

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它虽然不再追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制度替代，但仍旧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团结的理想，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它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培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仍旧力求与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通常更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更倾向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尤其是二战以后，它们是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推动经济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此外，它们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其他社会思潮中有价值的思想兼收并蓄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提高的能力，以及它们的政治竞争战略和执政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最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的研究，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译著，其中有一些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1987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共5种)；1994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未来的社会主义》；1996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和译著《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199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和专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文集《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200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2007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由于国外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比我们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其研究成果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所以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和加强我国学术界对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重庆出版社合作，选编了这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本译丛的选题原则兼顾了理论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主要从两类著作中进行挑选。一是选择从总体角度探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变革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二是选择一些研究有代表性的欧洲社会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的著作。选择的标准一是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二是要在学术界或欧洲社会党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作者都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与我们有很大差别，所以书中会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鉴别。

王学东

2007 年 12 月 25 日

一段漫长解放历史的终结?!

——中文版作者序言

一

自1998年以来,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未间断地统治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令人奇怪的是,这在社民党基层却没有引起愉悦。在德国国内,几乎碰不到一个为其政党和政府而自豪的同志。社会民主党昔日的烈焰如今只是冷灰残存了。

这些烈焰正是曾经刻画了社会民主党人性格的熊熊燃烧之火。特别是在历史上的艰难时期——在专制国家直到1914年都在诋毁和压制他们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更是其政党的激昂斗士。距离权力越远时,社会民主党人就越热情地投身于他们的"事业"。社会民主党虽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很多时候是孤单寂寞的,有时是受屈辱的,偶尔还受到威胁,在绝大多数时期是没有影响力的。但是他们的气氛是乐观的,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长期以来,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本质,即它是天生的反对党。社民党在反对派的位置上度过了110多年;他们只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单独执政。反对派——长期以来——是他们的命运。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喜欢这种宿命。因为这使他们伟大而自信,并且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好的人的光芒;因为他们在几十年中不只是简单的反对派。历史上,他们曾经在1/4个世纪里遭到国家的迫害、被驱逐出境、被投进监狱;在最恶劣的时期,曾经被严刑拷问、被杀戮、被处决。然而,这一切却未阻止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相反,国家的压迫还在道德层面上提升了他们的政治使命。对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种体验是最起码的,即他们在痛苦中成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简直就是乐于承受痛苦。

社会民主党人是作为反抗受压制的公正的斗士和经过痛苦考验的斗士，而不是作为执政当局的代表，经历了他们真正伟大的幸运感。

因此，当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不情愿地，进入政府的时候，往往就表现得非常束手无策。面对引以为自豪的苦难时期的伟大梦想，社会民主党参与的小联盟政府总是很平庸。无论社民党何时参与执政，其成果看起来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与其原本的要求相悖。因此，德国人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并不真正适于执政，他们总是经历着自己内部的争吵，令人惊奇地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诽谤自己的成就。

但是，社会民主党绝不因此就是国家主义的政党；相反，它长期回避国家。所以，社会民主党人也很少拥有改变国家的精确计划，他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经济转轨的具体方案。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太过执著于自身文化了。然而，这种闭关自守的文化的界限在社会民主党100年的自救运动中同样清晰可见。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令人钦佩的工人教育体系，但它却从来没有取代国家认可的高中毕业考试或者大学毕业考试。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公民社会，没有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解放，没有建立至少是对所有社会阶层平等的机遇前提。

不是工人教育体系，而是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推进的教育改革实现了社会的繁荣。“新中间”时代在这些年里开始了。或许这也意味着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从前那种专业工人最高等级的解放运动的终结。那主要是维利·勃兰特时代之前的社会民主党，即在德国以社会地位升迁为导向的专业工人的政党。100多年来，这个雄心勃勃的、有才干的阶层一直由于资产阶级教育特权而被禁止通过接受教育来摆脱他们的社会处境，凭借知识在社会里向上攀升。通过勃兰特总理和施密特总理时期的教育改革，专业工人的上层获得了其历史机遇。从此，这个以前由车工、矿工和印刷工人组成的政党日益成为由教师、管理职员、社会工作者和平等问题专员组成的“新中间”的政党。

从那时起，落在后面的其余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依然是孤单的。社会民主党从前领导人的地位升迁了，现在说着另一套话语，衣着更好更贵，喝着葡萄酒，而不是啤酒了，住房更加精致而且位于市中心，远离了从前的住处。因此，作为共同主体的其余的无产阶级和次无产阶级崩溃了。无组织的下层阶级和“新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断裂

了。其余的工人阶级失去了政治的家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哪一个其他社会阶层像他们那样易变,最终在选举弃权、投票给基民盟和支持新的"左翼党"之间逡巡;反之,社会民主党则和自己从前的主体脱离了,放弃了这些人或者任其留在党内。被抛弃了的主体因而宣布放弃对党的忠诚。在这个过程中,社民党自21世纪以来在一次次州议会选举中失败。

二

这样,社民党只在老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仍然担任州长。在共和国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地区,从德累斯顿到斯图加特,社会民主党人被困在一种近乎无望的少数派境地之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民党还可以利用莱茵和鲁尔之间的地区,以及黑森州、萨克森州或者汉堡的优势来均衡由于结构性的或历史的原因引发的在德国南部的劣势。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论述社民党的话,那么就等于是概括了一部失败的历史。流失的不仅仅是党员群众和有战斗力的干部群体,一同消失的还有恰恰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里数量众多的、往往有点古怪,但却始终形象生动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斐迪南·拉萨尔、埃德华·伯恩施坦、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可以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再随意举出50个具有理论原创力的人物的名字。再一次地,这一切都结束了。

而且,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会人士的生活世界完全脱离了。长期以来,这两个区域形成了一个组合,在其中,企业经验和政治能力结合在一起。然而,今天却没有一个工会领导人还属于社会民主党的联邦议会党团,地方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也不再同时是社民党地方支部副主席和社民党市议会党团成员。在历史上,工会人士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总是不断出现,但1999年之后发展起来的这种极度的疏远在历史上却是全新的——尤其是许多大工会中坚力量的重要部分很可能不仅仅是短期地背弃了社民党。社会民主党人从前安全的前沿阵地,现在似乎成了"左翼党"招募新人和培养干部的地方。无论如何,在100多年里,工会人士曾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支柱。在此处也是:这一切都结束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民主党人经常表现得不灵活,他们过度的派别

之争往往是令人紧张的，他们在权力政治诡计上的欠缺有时又是令人同情的。然而，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光环却围绕在这个100多年来尽人皆知的反对派政党周围：它是非特权阶层人民的、主张下层人民的解放和尊严的政党。这一切也都结束了。

从前，人们接受社民党的光环，是因为它的党员、干部和议员本身就来自较低的阶级，在政治上不属于具有社会影响的阶层。然而，这种状况也彻底改变了。这恰恰标志着社民党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至少在其干部和议员的圈子里，社会民主党是成功晋升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人在2007年的纲领性口号——教育、终身学习、机遇、成就——反映了德意志联邦福利国家时代社会民主党内社会地位升迁者的成功生平的经验。但它和失败者的新体验，和社会最低1/3阶层在多次被割裂的共同生活历史中由于教育失败而遭受的耻辱毫不相干。这两个世界彼此之间是完全陌生的。

三

在这个被社会民主党人抛弃的世界里，新的“左翼党”正在与20世纪90年代还是社民党领袖和总理候选人的奥斯卡·拉封丹一起嬉戏。在左翼党内，拉封丹在其转党之后牢牢掌握着统治权——和1997年非常相似。当时，他以强硬的手腕率领着社会民主党人，并以这种方式坚定而充满活力地把他们拉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2007年的奥斯卡·拉封丹的行为与辩论方式和1997年的奥斯卡·拉封丹完全一样。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今天的问题：他们的每一个指责——左翼党的行为是平民主义的，是蛊惑煽动的，是追寻虚幻目标的——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揭发了他们自己，至少是自己刚刚过去的，固有的政治口号。借助这些口号，他们在1998年成功地进入内阁。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完全陷入了窘境。作为掌权的政党，他们在政府任期核心时期的执政往往与从前纲领中的承诺完全不同。尽管如此，他们随后在选战期间还是能够令人信任而又令人惊异地打出社会福利这张牌，并招来冷酷的新自由主义的威胁，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集合起此前还深感失望的、有时已经放弃了选举的支持者。

然而，这种手法在未来几乎不可能再成功了。因为奥斯卡·拉封丹

现在作为一位政治家在政党世界登场了,他也精通,甚至更加精通这种表演;他也能够雄辩地在社会问题上炫耀,鼓动性地、强硬得多地要求社会公正,公开抨击"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阴谋诡计——这样就能够把选票引到新左翼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四

概括德国社民党目前的两难处境,其实就是成功导致了挫折和衰落。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至少对于其核心群体,即专业工人的精英,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群体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最终关心的物质富裕、教育和文化参与、参与公民社会和被认可。但社民党的这一传统核心群体因而也到达了公民社会的中间。他们发迹了,是德国新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肯定是更加合群的、更少偏见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群体不再站在与资产阶级社会敌对的反对派立场上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当然也不再是左翼的,甚至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曾是我行我素者和受亏待者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很多具有伟大才能和天赋的人,包括雄心勃勃的力量,这种力量催人向前向上,并向资产阶级表明将竭尽全力清除其生活道路上的障碍和封锁,必要的时候还将粉碎它;其中,蕴涵着社会主义解放运动的基本的力量,它同时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之火的燃料。从这些素材中培育出了权力意志、坚强不屈、果敢坚毅,有时还有社会民主党领袖——如奥古斯特·倍倍尔、赫伯特·魏纳、维利·勃兰特,是的,还有奥斯卡·拉封丹和格哈德·施罗德——在权力政治上绝对不可或缺的勇敢。所有这些人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忍受了其最初的社会力量的低下。他们将个人的挫折与抱负转化为政治参与,转化为社会民主党的解放的热情。

这些具有天赋的、执著向前向上钻营者中的倒数第二个人[①]和 1998 ~ 2005 年的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一道同行。社民党现任主席库特·贝克可以说是这种出身和(衣着)式样的最后一人。目前跟随社民党的、国会里的后备力量通常已经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缺乏被歧视和受屈辱的体验,因而也就缺乏通过批评令人烦恼的社会

① 指奥斯卡·拉封丹——译者注。

状况而独具特色的基本渴望，缺乏向处于社会优势的对手展示更多成就的基本渴望。新的一代不再像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那样，几十年都在考虑“反对现实”，而是——被他们教条地看做“别无选择”的——基本现实的极端热心的辩护者。他们组成的新社会民主党日益成为特氟隆政党——具有平滑的表面，但其实什么东西在它上面都呆不住。

社会民主党往往是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和萎缩时期，然而随后总是能够令人惊奇地再度恢复元气。作为雄心勃勃的受亏待者的反对派运动，它总会有通向活泼沸腾的再生的源泉。但是，一些人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民党不再是解放运动，而更多的是作为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政党处于其历史的秋天。作为新发迹者的利益群体，社民党在21世纪将发挥另一种作用。在这个世纪里被剥夺权利的人同样必须调整，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政党、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意志构成方式。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即21世纪新的被剥夺权利者随后将发现，20世纪工业社会工人精英的老政党是一个顽强的对手。

我非常高兴，我的这本书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谨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信息和知识。特别感谢张文红博士为忠实原文的翻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弗兰茨·瓦尔特

2007年夏于哥廷根

续写辉煌抑或雄风不再？

——译者序言

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也是唯一历经19世纪后半期以来德国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而生存至今的政党。“二战”之后，德国其他各种政治势力大都进行了党派重组，只有社民党延续了其历经“二战”仍未断裂的历史。迄今，它已经走过了140多年的风风雨雨，从一个受歧视、受迫害的边缘政党发展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长期在野的反对党变成了单独或联合治国理政的执政党。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德国社民党也逐步完成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从无产阶级向新中间的转变。自1998年以来，作为执政党的德国社民党面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始终挣扎于维持自身的传统价值抑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两难困境之中。能否实现新的突破与超越，将决定德国社民党是否能够在新世纪续写其辉煌的历史。

一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在莱比锡成立，斐迪南·拉萨尔当选为主席。联合会章程宣称，将代表“德国工人等级的社会利益”，追求消除“社会的阶级对立”，规定“任何德国工人，只要提出简单的入会声明，都可以成为享有完全平等表决权的联合会会员”。但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之后并未迅速发展壮

大,反而出现了内部的思想分歧。

1869 年 8 月 7 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爱森纳赫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这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工人政党。它的名称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其性质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并且是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的 28 个工人政党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一个。

1875 年 5 月,全德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合并之后,该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在 1876 ~ 1877 年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得票 49.3 万多张,成为最强大的反对党。德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成就给统治阶级造成很大威胁,以"铁血首相"俾斯麦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此深感不安,俟机进行镇压。1878 年 10 月,帝国议会借口年初发生的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关系的刺杀德皇事件,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状态。该党随后以成立诸如体育、音乐俱乐部等方式继续进行活动。

然而,专制国家的高压政策激起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烈反抗,工人运动依然迅猛发展。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的革命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1880 年 8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秘密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将以"一切手段"坚持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方面使德国党在理论上更激进;另一方面,却使该党在实践上向议会改良的道路发展。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议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开展工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利用议会合法讲坛展开活动,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也在不断攀升。

1890 年 9 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合法地位,并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最终不仅没有摧毁社会民主党,反而使其更加强大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890 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达 19.7%,共计 142 万票,比"非常法令"颁布之初多了 3 倍,为各党派得票之最。此后,该党持续发展壮大,1898 年的得票数突破了 200

万；1903 年突破了 300 万；1912 年增加到 425 万，占总票数的 34.8%，并赢得 110 个议席，成为最强大的议会党团。

随着合法地位的恢复和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改良主义开始在社民党内蔓延，革命与改良也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内部长期存在的两种矛盾倾向。该党于 1891 年 10 月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这部纲领包括理论和实际政策两个部分。理论部分论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实际政策部分则提出了普选制、言论集会结社自由、8 小时工作制等一系列改善现状的具体要求。也就是说，在理论部分指明对社会制度实行彻底变革的革命目标的同时，实际政策部分则肯定了争取改良的合法斗争的必要性。然而，这两个部分却缺乏衔接，是理论与实践、最终目标与现实政策的脱节。此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似乎是逐渐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暴力的阶级斗争，走向议会民主制。改良主义在理论上的突出代表就是伯恩施坦。从 1896 年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要求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民主党必须放弃过时的革命口号，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将社民党定位为“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他的言论引起了激烈的党内争论，以倍倍尔、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予以驳斥，但改良主义思潮仍在党内蔓延，而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党的实际状况也为其提供了条件。

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德意志帝国使用武力手段解决争端。与战前的反战原则相比，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巨大转变。因此，“一战”对德国社民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至党的分裂。

首先是社民党左翼代表人物卡尔·李卜克内西于 1914 年 12 月在帝国议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1915 年，20 名社民党议员跟随这一立场。1916 年，社民党议会党团以党的纪律为名，开除了这些党员。这些被开除的党员先是于 1916 年组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联盟，最后于 1917 年 4 月成立了“独立德国社会民主党（Unabhae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USPD）”。该党坚持左翼立场，其成员包括伯恩施坦、

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而社民党的其余部分则成为"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Mehrheitspartei, MSPD)",奉行与统治阶级合作甚至结盟的路线。

"一战"结束之后,斯巴达克团先是和其他激进左翼的代表于1918年12月组建了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并于1919年1月在柏林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斯巴达克团起义。而以艾伯特和谢德曼为代表倡导改良的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则于1919年2月13日与天主教中央党和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DDP)组成联合政府,艾伯特和谢德曼分别成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和总理。从1918年11月至1930年3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多次掌握政权;艾伯特直到去世一直担任魏玛共和国总统。社民党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参与制定了《魏玛共和国宪法》,推动了比例代表制、妇女选举权、8小时工作制等多项在劳工权利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以及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法规,使魏玛共和国进一步向社会福利国家迈进。

1920年秋,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决定加入共产主义国际,但独立议员、干部和党报编辑的主体却没有跟随多数派加入德国共产党。缩小后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由于双方在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分歧而渐行渐远。德国共产党谋求按照苏联的道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独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则试图放弃暴力斗争,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去改良资产阶级的国家和社会,这与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念相差无几。于是,独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22年9月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并,社会民主党在经历了5年的分裂之后重新统一了。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则永久地分裂了。

1921年9月18~24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格尔利茨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部新纲领。与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相比,这部纲领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新党纲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也许,这可以被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转变的最初构想;新党纲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证,并

倾向于伦理学的论证，认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道德的要求”，表明该党要争取那些虽然接受社会主义目标，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预示着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新党纲把魏玛共和国视为“自由的人民国家”，提出了“保卫共和国”的口号。

然而，“一战”后的德国，经济非常困难，每年向战胜国支付的巨额赔款，使国家处在难以摆脱的经济危机之中。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央党布吕宁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节约政策，更使失业率不断上升，民众生活日益艰难。人们为摆脱苦难而期盼救星，这就为希特勒极右翼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NSDAP），即纳粹党的上台铺平了道路。尽管希特勒后来把德国带入更深的灾难，但当时在人们眼中，他就是德意志的救星。希特勒充分利用民众希望摆脱苦难的心理，充分调动其狭隘的民族情绪，并巧妙地混淆了祖国、民族与国家概念的本质区别，把他自己及其掌握的权力装扮成德意志民族的化身，并于1933年1月登上总理的宝座。

希特勒上台之后，先是通过1933年2月的“国会纵火案”取缔了德国共产党，接着于6月取缔了德国社民党。社民党的活动从此转入地下，领导层也被迫流亡。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到了比“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更为残酷的迫害。一部分党员被迫流亡国外，留在国内的党员惨遭杀害或被监禁，少数幸存者转入地下开展抵抗运动。鉴于这种形势，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拾革命传统，甚至发出相当激进的革命号召。在此期间，德国社民党与德国共产党的抵抗组织有过接近，但是由于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最终也未合并。

三

“二战”结束之后，战败的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大柏林作为特区也分为相应的4个占领区。

苏联占领区于1945年6月10日允许在其区内建立党派、工会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在苏联占领者的支持下，德国共产党和苏占区的德国社民党于1946年4月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DDR）成立之后，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成为执政党，直到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

而在西部的美英法占区，德国社民党拒绝与德国共产党合并，并且延续了该党在纳粹统治之前的政治传统，其代表人物库尔特·舒马赫也在此时对党的未来走向施加了强烈影响。他认为，德国社民党必须扩展其社会基础，要向中间阶层推进；最终目的是议会民主制，党派多样化，国家只对经济实行适当的温和调控。

在1949年8月举行的战后西德第一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仅获得29.2%的选票，131个议席；而其竞争对手联盟党则获得31%的选票，139个议席，并掌握了组阁权。此后的几次大选中，联盟党的得票率不断攀升，在1957年甚至获得50.2%的绝对多数票。而社民党员人数也开始急剧下降，从1947年的87.5万人降到了1958年的62.4万人。德国社民党只能沦为“建设性的反对党”。

几次选举失败使社会民主党认识到，战后德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不及时调整党的纲领和政策，就难以重新执政。1957年选举失败之后，社民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重点是抛弃意识形态“包袱”，特别是清除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信仰；改变党的性质，使之向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开放，以适应战后社会结构的变化。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就是这场讨论的最终结果。它标志着德国社民党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决定性转变：抛弃了一切马克思主义的词语和论证，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社会民主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自由、公正、互助”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实现这项任务的途径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就彻底切断了世界观和理论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

《哥德斯堡纲领》奠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民党也真正成为全民党，并因而赢得了更多的选民支持，最终于1966年参加了大联合政府，并于1969年开始作为主角执政。1969年的联邦议

会选举之后，德国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组成联合政府，维利·勃兰特出任战后第一个社民党的联邦总理。他实行了突破性的“东方政策”，陆续与东欧国家包括民主德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包括承认民主德国的国际法地位和波兰西部边界的合法性等等。这使得联邦德国与东方阵营的外交正常化，为联邦德国赢得了更多的外交空间和国际声誉。

《哥德斯堡纲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个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政党变成一个体制内的政党。之后的几十年间，社民党不再一如既往地批判资本主义，而更多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寻求社会改良，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尤其是对党的组织扩大和上台执政起了重大作用。社民党党员人数在1960年达到65万人，1965年增至71万人，1973年达到近100万人；党员逐渐年轻化，1960年，40岁以下的人在新入党的党员中占55.3%，1969年占67.2%，1972年已达到75.2%；党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改变，1960～1969年，工人在新入党的党员中所占的比例从55.7%下降到39.6%，而职员和公职人员则从21.2%上升到33.6%，到1972年，工人在新吸收的党员中仅占27.6%，而职员和公务员则占34%，超过了工人；在大选中的得票率持续上升，从1957年的31.8%增加到1961年的36.2%，1965年的39.3%，1969年的42.7%，1972年达到45.8%。

四

1982年的议会选举之后，德国社民党再度沦为反对党，直到16年之后的1998年与绿党/90联盟一起赢得联邦议会选举。社民党人格哈德·施罗德出任联邦总理。2002年9月，德国社民党和绿党再次赢得联邦议会选举，施罗德连任总理。然而，施罗德和社民党政府面对的是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一是经济全球化及其给德国经济带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二是德国社会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基础难以为继。从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福利国家的困境已经开始显现，社会福利水平过高，是制约其经济发展，尤其是影响就业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使德国走出经济连年疲软的阴影，“红绿联盟”政府不得不下决心对福利制度进行彻底变革。

2003年3月14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国会宣布了题为“2010规划”

的改革方案,2003 年 12 月 19 日,联邦德国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了“红绿政府”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使“2010 规划”的核心要点得以通过。其目标是在中短期内加强德国的经济实力、创造就业岗位并使福利体制现代化。“2010 规划”的改革措施涉及了从减税到劳动力市场改革,直到社会保障体制等各个领域,涉及了德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堪称德国战后历史上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场改革。

应该说,社民党政府的此次改革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振德国经济实力的必要举措。然而,“2010 规划”的改革政策的实施却始终伴随着困难和阻力,社民党也因此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地方选举接连失败、民众支持率降至历史最低点、大量党员退党等等,尤其是使社民党内出现了分歧。社民党左派反对在佣工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认为这将损害广大工人的利益;作为社民党最重要合作伙伴的工会,也因这场改革而同社民党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工会反对降低社会福利的改革,认为“红绿联盟”政府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对社会下层尤其不公正,认为社民党背离了其传统价值,因而对这场改革持公开的拒绝态度。自“2010 规划”颁布以来,工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系列抗议、游行、示威活动。最终,这股抵抗改革的力量从政治层面开展活动,于 2005 年 1 月 22 日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左翼政党——“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Die Wahlalternative – Arbeit & Soziale Gerechtigkeit, WASG)。社民党前主席奥斯卡·拉封丹于 2005 年 6 月宣布退出社民党,加入“选举替代”党。2007 年 6 月 16 日,德国左翼党—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在柏林合并,成立了新的“左翼党”。拉封丹当选为左翼党的主席之一。

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民党目前的尴尬处境,是社民党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与全球化时代的冲突的表现。社民党面临着全球化、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出现、人口统计的变化、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以及公共财政预算危机等等问题,从前的传统政策已经难以应付这一切了。

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是社民党的传统基本价值观,而以往达到社会公正的手段就是进行财富再分配,使人人享有社会富裕成果和社会保障。社民党希望在坚持这些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对德国的福利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但改革所遭遇到的空前社会阻力证明,这一想法有些乐观了。社会福利国家改革使社民党遭受最多的批评就是背离了其传统的

核心价值，社民党实行的是有利于雇主的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改革政策，党的领导人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和社民党的基本理念。是维护传统价值还是实施新自由主义特色的改革始终困扰着社民党。社民党近年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是这一冲突的集中体现。

作为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社民党在过去 140 多年里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些成就却愈来愈成为它沉重的包袱。它所推行的社会福利改革政策触动了社民党基层党员及其支持者的敏感神经，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从工人阶级政党到新中间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传统选民基础的流失，新选民基础的动摇，不能不令社民党深刻反思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

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德国社民党力求通过纲领政策的更新来适应社会的新变化。该党在 1999 年 12 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决定修改党的纲领，并为此展开了关于新党纲的全党大讨论。未来纲领的核心在于如何令人信服地回答社会民主党的认同问题，即“我们来自何处”，以及在 21 世纪的今后几十年内“我们将走向何处”等问题。

社民党把纲领讨论的主题归纳为 13 个，包括：我们想要什么、我们的未来之路、国家和社会中的民主、团结互助社会中的人人平等、通过社会公正达到团结互助的社会、劳动和自由时间的未来、承担生态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共同安全下的和平、文化生活、欧洲、我们政策的基础、全球化、社会和经济数据等。

这场讨论被看做是提高社民党的吸引力的一种手段，也是统一思想、澄清认识的过程。社民党认为，讨论党的纲领的过程比最终出台的新纲领更加重要。而且党纲讨论的参加者不限于德国社民党党员，该党还邀请了非党人士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参加讨论。德国社民党原定于 2005 年 11 月份在卡尔斯鲁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新党纲。由于提前举行国会选举，新党纲的出台不得不推迟，将在 2007 年的汉堡党代表大会上予以通过。

执政这几年来艰难而痛苦的改革历程表明，社民党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它一方面不想放弃“社会公正”这一核心理念；但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又不得不牺牲民众的部分利益，因此被指责为背叛了社会

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观。社民党似乎没有成功地在理想与现实这对矛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使自己的新的“社会公正”的理念付诸实施，又能使广大民众理解并接受改革。

此外，德国社民党近年来一系列的调整和变革，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身份认同危机。比如，仅从一些政策主张上来看，社民党和保守的联盟党的界限日渐模糊，难以界定二者的区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民党的变化被党内的左翼人士和一些传统选民指责为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价值的背叛和对新自由主义的屈从。德国社民党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怎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适应当今的政治经济形势，推动现代化改革进程，又能适当地维护普通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至于为选民所抛弃。因此，如何凸现理论和政策的特色，以便在未来吸引党员、选民仍是社民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书作者德国哥廷根大学弗兰茨·瓦尔特教授应译者之邀，欣然为本书中文版作序，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黄国祯教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所给予的热情帮助。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荣起国，他在北京大学工学院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而分担了大量的家务，尤其是对幼子的照料。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所限，本书的翻译肯定不尽完美，不当之处欢迎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德文版拥有大量图片及相关文字说明，但由于图片版权问题目前尚未完全解决，所以此次本书中文版未能收录这些图片。为了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本书对于原图片的说明文字还是予以了保留。本书作者和我都衷心希望，待图片版权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呈现给读者一部完整的中文版，以弥补此次的缺憾。

目 录 Contents

总序 1
一段漫长解放历史的终结?! ——中文版作者序言 1
续写辉煌抑或雄风不再? ——译者序言 1

开端:从徒工反抗到工人运动 1
帝国时期:革命者的未来梦想和现实的对立世界 7
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祖国的爱国者 25
德国革命:分裂与迷惘 30
20 世纪 20 年代:在阶级环境和人民党之间 38
魏玛共和国结束:反对"共粹"和纳粹的斗争 47
纳粹时期:"人民联盟"的尝试 58
苏联占领区时期:环境的瓦解 68
阿登纳共和国:"再度靠边站" 77
过渡时期:告别传统队伍 91
20 世纪 60 年代:"所有时期最好的基民盟" 98
社民党—自民党时期:觉醒和失望 111
科尔时代:"孙子们"的舞蹈 132
结束语:在柏林共和国 161

时间简表 169
参考文献 175

开端：
从徒工反抗到工人运动

长期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仅只是一个政党，而且还是——在最初的时候甚至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运动。对于社会运动而言，始终很难准确地说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由于没有一个确切的成立日期，使得德国社民党一直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即如何在党史上确定其建立的年份。通常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始于斐迪南·拉萨尔及其于1863年建立的全德国工人联合会（ADAV），有时也会把施蒂凡·伯恩在1848年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工人兄弟会当作起点而庆祝。1875年——即早期工人运动中敌对的两翼在哥达实现组织上的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年份——有时也被作为真正的建党日期。对于更倾向于社会历史辩论的阐释者来说，所有这一切，从19世纪30年代，从早期社会主义的、在欧洲其他国家开展活动的行业协会就已经开始了。奥古斯特·倍倍尔、奥托·韦尔斯、库尔特·舒马赫、维利·勃兰特继承、发扬了这一事业。现在，格哈德·施罗德继续领导着这一事业。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当然完全有权利认为他们的政党拥有多个历史起始点，因而他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庆祝并自豪地谈论其丰富而悠久的历史。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确切成立日期的讨论事实上最终也没有定论，所以应当采用开放式的表述：在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某个时候，在德国出现了——作为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对于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依赖关系、缺乏保障和危机的反应——现代工人运动。

然而，即使是这种概括也随即又具有了局限性，因为工人运动在其初

始阶段只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的。即使是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也不是那么崭新的。社会运动也不会从零开始，它们总是——正因其成功和持久——能在过去找到根基和力量源泉。早期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实际上是没有根源和传统的：他们来自农业省，没有组织经验，也没有凝聚成为群体的指导思想。然而，那个年代的城市手工业徒工，如排版工人、磨剪工、旋工、制鞍具工或者木工等，却拥有这一切。他们不是现代工业工人，却成为新工人运动的先锋，并且直到20世纪都影响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因为他们拥有发起一种社会运动，并逐步赋予它以政党结构所需要的资源：组织能力、自信、教育、指导目标、沟通能力和灵活性。

数百年来，手工业徒工们在行业协会里积累了他们的组织能力。旧行业协会的结构中的不少内容——例如针对生病、致残和死亡等情形的补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都直接融入了现代工人运动。手工业徒工拥有很多传统的标志、仪式、旗帜和歌曲，这些内容在新工人运动中也起到了塑造身份的作用。此外，他们在旧社会里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流动性。在学徒期满之后，徒工们都必须外出游历，因此他们的组织和思想能够跨区域地连接起来。正是这一点，成为在德国出现全国性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前提条件。

手工业徒工具有突出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通常都追寻着成为师傅的目标。但是，这一切却在19世纪中期与新兴资本主义发生了冲突：工厂工作使得许多旧职业和旧荣誉感贬值，并且常常毁灭掉徒工们升迁的希望。传统的期望和新时代的失望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激发了手工业徒工的反抗潜力，结果是他们投身于早期的社会主义活动之中。所以，德国现代社会民主党要回溯到前现代的、前公民社会的、前资产阶级的和前无产阶级的社会。经常会看到这种境况：全部现代社会运动依赖于因旧的权利遭到破坏、传统观念被漠视、从前的安全感和确定感出现问题而激发的反抗潜力。

尽管新工人运动包含着大量向后的推动因素，但其整体上却是向前看，是面向未来的。在社会运动中，还经常可以看到这一点：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使得传统要求因得不到到满足而释放出来的能量不能够维持其幸免于难的组织结构，这种能量不仅导致怀旧的防御性斗争，同时还导致

了新的行动方式、新条件和新要求。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也是如此。它很快就不仅仅是被传承下来的行业协会的结构在文化和组织方面的延伸,而是真正工人的,并非徒工的新型社会运动。前现代时期的徒工反抗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着重于保护旧的权利。但工人运动很快就开始进攻,要求新的权利,要求更多的参与和共同发挥作用。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不同职业的徒工逐渐共同把自己看作是工人,因为他们——在生病、致残、年老等情况下以及在资本主义的繁荣周期里——承担同样的风险、遭遇同样的困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现代的社会民主党形成了。

不过,它最初还只是前卫运动,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工人阶级的先遣队。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不过几千人。斐迪南·拉萨尔在1863年建立联合会的时候还在十几万人面前说,要把他们迅速聚集起来。但令他极度失望的是,人们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来。

人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正是这个犹太知识分子、放荡不羁的艺术家、靠做律师赚钱的拉萨尔成了历史人物,许多人把他看做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开创者;尽管在上流社会里,他的名声有点不太好。他曾为哈茨菲尔德—特拉亨贝尔格的索菲伯爵夫人打了8年离婚和财产分割的官司,最后达成了和解,并从他的女当事人那里得到了足够多的酬金。到处都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关于他们两人关系的传闻,主要的谣传是关于拉萨尔的众多冒险经历。拉萨尔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局外人,一个不受人们欢迎的人。但他又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演讲家和才华横溢的随笔作家,而且他还拥有政治天才。与马克思不同,他几乎不关心社会的发展,不关心"客观的社会过程"。他把政治当作艺术,当做本能的认识和对机会的充分利用。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确定论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像他这种类型的人并不多。

[**原书第11页图片说明**]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大资本家的儿子,被看做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他拥有个人魅力和远大的政治计划。但他死得很早,39岁就死于决斗。1878年9月,帝国首相俾斯麦在议会的一次辩论中谈到了他:"拉萨尔是一个极其有野心的人,德意志帝国是否应该以霍恩措伦王朝或者拉萨尔王朝结束,恐怕他本人对

此也是怀疑的。”

当然，拉萨尔同时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神经质的人，非常激昂。他承受着对他作为犹太人和局外人的侮辱，但这也激发了他相当多的潜能，希望向所有人证明，他能够创造某些全新的东西，并获得荣誉。迫切地想得到认可是他的特点，这当然和大多数伟大的政治人物一样。当帝国首相俾斯麦1878年在帝国议会回忆他于19世纪60年代初和拉萨尔的谈话时，说拉萨尔是“极其有野心的”。拉萨尔也因此发现了工人。他对工人的社会命运并不真正感兴趣，几乎不关心下层民众具体的生活状况。他关心的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政治。因此，工人首先是拉萨尔的政治工具，是他自己成为领袖这一远大抱负的基础。

[**原书第13页图片说明**]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旗帜最初是属于布雷斯劳地区的党组织的。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使用它长达12年之久，即使是在纳粹时期，人们也能把它藏起来。战后，这面旗帜被卷进换洗衣物中偷运到西德。它至今仍为德国社民党所拥有。

在社会上更多地被边缘化，但政治上却有雄心的知识分子和努力争取接受更好教育的手工业徒工之间的互相协作是早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征。早在19世纪30年代，四处游历的徒工们就已经在巴黎、苏黎世和伦敦结识了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并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一些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思想。一直到1933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还经常能看到这类被边缘化的、被禁止从业的、被剥夺宗教和政治权利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寻求一个位置，而且常常是领导职位。这些“改变宗教信仰者”与自己的阶级出身相冲突，对那些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者和缺乏理想主义者感到愤怒，因此在工人阶级中发现了新的集体救世主。这一切往往大大地超越了旧约：那些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看做是拯救全人类的信息，他们很愿意把自己看作是被挑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引导人民走向没有阶级社会的完美国度的摩西。

拉萨尔也讲过许多宗教性质的比喻，他曾向工人疾呼：“你们是岩石，

今天的教堂将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他的听众们喜欢听这种话。他们崇拜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这么睿智地谈吐,为工人指明特殊的使命,展现解放的前景。就这样,具有独特魅力的拉萨尔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神话。1864 年 5 月,当他在莱茵兰地区为几个集会奔走的时候,虔诚的工人们总是用装饰着鲜花的马车去接他。对此,拉萨尔夸耀地写道:“我常常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一定是在新宗教的捐赠会上看到的情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这种神话也没有消失。魏玛共和国时期,在德国社民党的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还在唱:“道路,我们勇敢地跟随,领导我们的拉萨尔。”

斐迪南·拉萨尔像一个专制君主那样领导着全德工人联合会,许多人说,他像一个独裁者。尽管在位时间不长——1864 年,即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 15 个月之后,他在为争夺一位漂亮女人而举行的决斗中丧生了——拉萨尔却给社会民主党打上了他的烙印。他坚信普选权对于社会主义进步的有益作用,他的支持者也同样坚信这一点。这样一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因选举而有些被驯化了,与公民权和公民宪法捆绑在一起,喜欢被选举权、公开性和可计算性,因此他们从来都不是密谋的、破坏性的,甚至恐怖的坚持革命暴力的队伍。这虽然不完全是由于拉萨尔的缘故,但毕竟也和他有关。最后,他还是一位“组织”的鼓动者,这一点也长久地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长达几十年,甚至将近一百年之久,党组织的创建和扩建都处于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的思想和行动的核心。它证明自己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奋斗的心脏——如果不是目标本身的话。

对于那些手工业徒工来说,“联合”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魔语,这句话使他们团结在拉萨尔的周围并创建了早期的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童年时期的第二个魔语是“教育”,接下来还有第三个——“生产合作社”,不过它很快就丧失了作为指导思想的力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早就不像坚持“联合”或者“教育”那样,追求和坚持它了。总而言之,这种三位一体的早期社会主义的特征成为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的行为准则、团体道德,以及愿望、梦想和希望。这是一个组织良好、自我管理、没有剥削的工场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先驱们为之而奋斗。

那些没有技能的工人对此则不那么兴奋。事实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鸿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长期存在: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

就是有纪律的、有抱负的、希望升迁的那些工人的运动和政党;那些不具有这些美德和态度的工人常常与之背离,不属于党的忠诚支持者之列,而且在危机时刻很快就站到旁边去,或者加入其他政治阵营。

最后,同样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社会主义者内部的争论、派系斗争和分裂,这对于工人运动的历史来说是再典型不过了。当拉萨尔于1863年宣布成立自治的工人政党时,大多数工人联合会就没有参与,而是留在了自由的市民组织框架内,一直到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第二个独立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在爱森纳赫出现。该党的领导人是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中的第二支流派不像拉萨尔建立的那一支那么集中化,也不那么独裁。另外,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也互不相同:拉萨尔主义者支持普鲁士,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那一支则倾向于全德国方案。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年里,两个党的支持者之间相当粗鲁,互相破坏对方的活动,有时还互相谩骂和殴打。直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当这两个对手一同成为国家犯罪化和非法化的牺牲者时,这场小战争才停息下来。此外,1873年关于建党者之争结束后,经济危机到来了。国家当局的压力和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两种因素共同使得社会主义早期的两个对立阵营迅速接近,社会民主党统一了:1875年,在哥达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帝国时期：
革命者的未来梦想和现实的对立世界

当年，卡尔·马克思反对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这部纲领并大发脾气。他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剖析了《哥达纲领》中的矛盾、不一致和“拉萨尔主义的词句”。但是，当时流放于伦敦的这位社会主义思想巨匠的抨击性演说并没有真正左右德国。马克思的批判也没起什么作用，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想要最终解决自己阵营内部棘手的政党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几乎不会去考虑理论上的完美。事实上，马克思在1875年似乎完全不需要那么激动：反正“拉萨尔主义”时代在19世纪70年代就要结束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的数量反而在上升。在这个10年里，使工人运动得以统一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传播的土壤。

在此之前，德国的工人很少感觉阶级社会和阶级国家像19世纪70年代那样，是如此危险、如此冷酷和令人屈辱。在1873年建党者之争以后，紧接着是长期的经济危机。公司倒闭和解雇司空见惯，罢工始终都不成功，工会的对抗力量在不久之后也明显地被削弱了。在这个10年的末期，保守派和右翼自由派的联盟实施了保护关税政策，致使进口的谷物变贵了，这反过来又促使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因此，城市工人在经济和社会上日益陷入困境。

[**原书第16页图片说明**]1878年，受错误政治思想引导的两名男士马克斯·赫德尔和卡尔·诺比林袭击了皇帝。帝国首相俾斯麦利用这一机会，排挤其国内政治上最大的对立者，并使

帝国议会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社会民主党从此之后被禁止。1903 年,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回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段艰苦而又难忘的岁月时讲到:"打击密如冰雹,所有的一切都被破坏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失业了……我们就像长了疥疮的狗一样被赶出了家园。"

当然,工人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这种危机局面,仅仅是危机本身也不会使德国社民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结果离不开社会民主党人在 1878 ~ 1890 年所经历的政治权力被剥夺,即社会的诬蔑。这就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试图借用这部法律摧毁社会民主党。1878 年 5 月和 6 月,当两个精神有问题的人袭击了年迈的皇帝威廉一世时,俾斯麦立即抓住机会,强行使帝国议会通过《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①。这两个行凶者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其中一人是反犹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的支持者,另一个是民族自由派的同情者。然而,在开枪射击皇帝事件后所激起的歇斯底里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到处都是一种扼杀社会民主党的气氛。惧怕"颠覆性的政党"的俾斯麦冷静沉着地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因而在随后的 12 年中被禁止,工会也是如此;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必须停刊,党的大部分精英——宣传者、记者和组织者——受到起诉、被关进监狱、被驱逐或者被迫流亡国外②。他们被嘲笑地诬蔑为"没有祖国的家伙"。

在德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阶段像《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那样对社会民主党人影响深远。他们被歧视、被迫害和被欺凌;他们感到被侮辱了——而且这些歧视和迫害来自所有的社会力量。起初,只是民族自由派和保守派赞成俾斯麦的禁止政策和压迫政策,后来——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必须被延长的时候——中间派议员和左翼自由派也支持该法

① 国内通常把这一法令简称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或《非常法令》。该法令针对一切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的、共产主义的协会、集会和出版物;禁止他们"颠覆现存的国家和社会秩序"。该法令原定有效期两年半,但被一再延长,共实行了 12 年之久——译者注。

② 在实行《非常法令》期间,德国近 1 300 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被禁,332 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 多人被放逐,1 500 多人被判处入狱或监禁——译者注。

律。这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社会团体、政治团体打交道时的原始体验:从此之后,他们和资产阶级联盟伙伴相处艰难,原则上不信任德国自由派的性格坚强;从此之后,他们把社会严格地分为好的和坏的两部分,分为"我们和其他人"。

[**原书第18页图片说明**]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特别关心马克思的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在19世纪的后20年里,他是社会民主党的"首席理论家"。他为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提供决定性的关键理论词语,和伯恩施坦一起起草了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在世纪交替之后,他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衰退了;在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影响政治的一分子的时候,在他们必须谈判,甚至执政的时候,就不会再采用考茨基陈旧的确定论了。

从现在开始,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当然,并非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人都成为热衷并能够理解——众所周知,汗牛充栋的——马克思著作的读者;人们——也只是一小部分人——更喜欢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考茨基的大众化的版本。马克思的理论宝库中只有关键词和个别概念在当时风靡一时。拉萨尔仍然寄希望于国家,也寄希望于普鲁士和俾斯麦的国家,但是这一立场在当时丧失了一切支持。现在,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国家无疑是阶级国家。在马克思笔下,称自己为"无产阶级";其他的人——统治阶级——被称为"资产阶级"。人们认可了马克思的解释,即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肯定,无产阶级一定会成为阶级斗争历史上的胜利者。工人阶级将最终铲除资产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社会困境、警察压迫和巨大的工作压力都将不复存在。这个社会一定会到来——卡尔·马克思最后也这样预言了。在深受压迫的艰苦岁月中,无疑有愈来愈多的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自愿接受了这一学说。

这是宗教替代品和科学要求的混合,令当时社会民主党的专业工人中的精英们感到兴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脱离教会,却并未因此完全放弃对上帝的需要。不过,他们不是为已经放弃的虔诚去寻求一个纯

粹的精神替代品和一个形而上学的替代品;渴望学习的专业工人这个时候对自然科学更感兴趣,他们读各种各样的论文,尤其是还读查理·达尔文的著作。这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形式——基本上是党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兴趣相互补充。因为在考茨基的这些文章中,上帝的承诺和科学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了,既是基督千年王国的统治,同时也是自然规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不会简单地相信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他们知道,这一目标会到来,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结局和成果。对政治和社会的这种理解深深地植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在党内延续了整整80年。无论好坏,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在困难的时候走到了一起,因为他们确信最终幸福的"发展";不过,他们往往非常被动地、缺少创见地躲藏在这种"发展"的后面,尽管他们已经做出承诺,会对这种"发展"施加影响并进行塑造。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乐观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信仰无疑加强和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对未来的坚信带给社民党以安慰、力量和信心。有了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更轻松地承受政治压迫和社会困境,况且人们发现它是引人入胜、充满魅力的思想大厦。最终,俾斯麦还是失败了:他没有摧毁社会民主党,反而使其更强大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结束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选举候选人得到了比该法令颁布时多3倍的选票。这也深深地影响了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饱受苦难,人们排挤他们,孤立他们,但他们最终却胜利了。他们在几十年里处于——有时简直是有魅力的——被剥夺权利的状态。社会民主党人喜欢受难,喜欢被排挤、被剥夺法律保护和被贬谪的角色,以及与此相应的殉教者的、英雄的、正直正派的、不屈服于统治者压力的、战胜所有敌人的角色。社会民主党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压制下创造了自己的史诗、传说,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总是引用这些经历。奥托·韦尔斯在1933年反对纳粹的授权法时还引用了它们,他在克罗尔歌剧院英勇地高呼:"《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没有摧毁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会从新的迫害中汲取新的力量。"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力量把社会民主党推向孤立的境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却发现自己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孤立,而通过其独有的使命要求、通过其激进的阶级斗争言论

和革命则更加增强了这种感觉。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之后,社民党的支持者们甚至自愿把自己隔离开来,他们还脱离了那些——绝对不在少数的——"资产阶级"的业余活动团体和教育团体,而这些团体根本不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们通过众多的文化、体育和社交团体而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建立了自己的单独的生活环境。社会主义在德国变成了社会环境的社会主义和协会社会主义,严格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将工人运动——如果人们这样希望的话——推向对立的文化,工人运动强烈向左转,远离拉萨尔,走向马克思。另一方面,受压迫的岁月——自相矛盾地,当然也是偶然地——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培植出了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的基本流派。当时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环境的封闭世界没有使工人极端化,而是更加减弱了他们的行为主义、他们的战斗性以及他们革命的鲁莽。"环境的社会主义者"日益变成协会会员,对于人们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不满,并热衷于唱歌俱乐部、郊游俱乐部和体育俱乐部的活动。

这不是市侩作风,而是一种绝对重要的、自己的文化,是工人的一个伟大的组织成就,这种文化和成就也服务于解放事业。例如,在社会民主党的教育事业中,他们还要学习国立学校对他们所隐瞒的那些东西。但是这种环境不是训练场,不是革命行动的弹弓。它更多的是减轻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痛苦,以及他们对国家和统治者的愤怒。通过他们的环境,他们在帝国中找到了一个固定的位置,不是位于体制的中心,也不被中上层所认可,但是,总体说来——尤其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结束之后——还是受到保障和保护的。他们不必再过地下生活,不再担心来自上层的血腥恐怖。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协会会员不是蒙昧果敢的革命者。他们为自己建设了一个家园,使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夹缝适合于居住。这一切都使他们轻易不冒难以估量的革命风险。

[**原书第22页图片说明**]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1871~1890年的帝国总理。作为老练的外交家和冷静的现实政治家,他同他那个时代大规模的世界观运动及其信仰力量和幻想的目标——无论是天主教还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都格格不入。当他利用《非常法令》和警察工具使社会民主党饱受折磨的同时，也试图通过社会改革将工人与国家结合在一起。他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没有那么多人害怕它，就不会有我们在社会改革中已经取得的那些适度的进步。因此，就这方面而言，害怕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完全可以利用的因素。"

因此，即使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压制下，社会民主党人失去的也不仅仅是锁链。俾斯麦的12年压迫也不能和纳粹恐怖政权的12年压迫同日而语。在帝国时期，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个人并没有被完全剥夺权利；作为国家公民，他们完全可以享受法律和宪法的可靠保障，肉体上也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他们的党是被议会多数通过的决议所禁止的，但作为补偿，他们能够毫无问题地建立和维持他们的社交性团体。他们还拥有议员，因为在帝国时期人们选举的是个人，而不是党派。所以，社会民主党人能够以个人名义成为候选人、当选并最终在议会担任议员发挥作用。议员们在议会的演讲可以被印刷、散发。这样，社会民主党人的帝国议会党团就成了党的唯一的合法部门，其他部门都被禁止了。帝国议会党团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和领导机关。

这种经历长期影响了社会民主党人：选战、选举、议会工作、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这些因素在党内比革命的群众行动的思想，甚或是街垒斗争的空想具有更高的意义。议会党团的优势地位也同样有助于社会民主党的去极端化。根本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议员看做是热情的护民官的群体甚或是德国的"丹东形象"。当议员的人，必须要有经济收入，因为议员的津贴是世纪交替之后才出现的。因此，产业工人和真正的无产者是没有机会成为议员的，特别是当他们成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时候，企业方面就对其会进行解雇的威胁。故而进入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党团的都是党的作家，也有烟草商人和餐馆老板。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对此情景表示担心："在议会党团里都是小市民的代表，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加入进来！"

在开始进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打击之后，俾斯麦所进行的社会公德立法，即所谓俾斯麦的糖面包，也助长了改良主义的心态。当然，社

会民主党人最初是反对社会福利法的,但他们从第一时刻就开始利用新的社会保障行业的机会和机构。这也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行为特征:起初是彻底的反对派姿态,满怀激情地说"不";接着是在某个时候开始进行实用主义的接近;最后是保持沉默的"是"。

[**原书第24页图片说明**]在德累斯顿举行的1890年5月1日示威游行。1889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决议,"组织一次大型的国际宣言行动,而且确定,工人们同时在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城市,在一个确定的日子里,向社会权力提出要求,确定实行8小时工作日。"因此,许多国家在1890年举行了游行和罢工,对此,雇主们多数是采取了不许进厂的措施来应对。1919年,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也没有实现将5月1日定为法定节日的计划。直到纳粹统治时期的1933年,"五一"才成为休息日——"国际劳动节"。

俾斯麦想通过社会公德立法把工人从社会民主党身边拉走,但却没有成功。首先是医疗保险有助于——与俾斯麦的打算相反——社会民主党人的整合。数千名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进入了社会保障系统的职能部门,尤其是占据了地方保险公司的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和理事会的、往往是专职的职位。这就使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干部"这一类人,他们也存在于工会。这些人着眼于社会现实,想要改变目前的状况,事实上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和改善。这类干部生活在社会结构之中,他们已经部分地防御,但无论如何不再倾向于革命理想;他们不需要大胆的神圣许诺,也不寻求根本的变革。因此,他们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工会化和社会保险机构主导化。

然而,解放了的社会的乌托邦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依然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实用主义的手段日益得势,但它绝对不会导致改良主义的思想,不会导致自信的改良主义的伦理。这样,实践的改良主义很快到达了它的极限,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里根本没有社会改良的联盟伙伴,不仅在帝国政治层面上没有,而且在乡镇层面也没有。在帝国大多数州

的乡镇层面，严格实行着富豪统治的财产调查选举权[①]；在这些地方，资产阶级政党常常作为统一的整体、作为政党联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联邦共和国的头10年——站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对立面。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改良主义的纲领，正如爱德华·伯恩施坦在19世纪末起草的，就不是特别吸引人。在政治上，它缺乏符合宪法的前提条件和有意愿的合作伙伴；在社会上，社会民主党人还饱受歧视。他们始终感到被自己资产阶级阶层所轻视，只被当做二等公民来对待。

[**原书第27页图片说明**]1907年，罗莎·卢森堡（1870～1919年）在斯图加特的一次集会上，她是后来的斯巴达克团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伟大的演讲家，热情、奔放、睿智。她梦想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街垒斗争和国际性的群众罢工。在她的眼里，议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坐满"合法的夸夸其谈者"的"鸡舍"。罗莎·卢森堡是19世纪最后的、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之一；她既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集权主义的冷漠暴君，也区别于20世纪西方宪政体制中冷静的民主党人。

因此，社民党的官方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和党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马克思主义比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经验论更受欢迎。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未来社会的前景比专制国家里阻滞、停顿的改良过程看起来更具诱惑力。然而，威廉时期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还只是词句上的、星期天演讲中的、充满激情、振奋人心的极端主义，而不是军事行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内心安静地等待着——当然是合法的——社会的崩溃，而不需要为此在思想上和战略上做些什么。对于一种活跃的群众极端主义，如同罗莎·卢森堡所期盼的，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中还缺少明显的愤怒和公开的憎恨。因为在帝国时期，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最终绝没有恶化。相反，实际工资逐渐上升，工作时间自早期工业化以来大

① 财产调查选举权（Zensuswahlrecht）是这样一种选举制度，即预先设定了一种不平等的选举权，选民选票的权重取决于其财产或者纳税额度。这种选举权并不与社会阶层挂钩，因此，从理论上说，一个富裕的工人可能比一个贫穷的贵族拥有更多的选举权。但事实上，财产调查选举权剥夺了工人和妇女的选举权——译者注。

幅缩短,从每天大约 16 个小时缩减到每天 10 个小时;没有遭受到持久的、大规模失业的命运。

简而言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威廉时期受到了文化和政治上的诬蔑,但在社会和经济上却获得了相当的进步。因此,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胸膛内生长着两颗矛盾的心灵[①]:一颗是有一点极端的;另一颗是有一点改良主义的。1891 年通过的著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恰好反映了这种情况。在那部纲领中,有一个序言性的概论部分,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昏暗的危机场景,也提供了摆脱不可避免的苦难的根本途径: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转变。但是,接下来的一段里却包含了许多改善现状的具体要求。如果人们相信纲领开始时所描述的必然危机的场面,那么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纲领的这两个部分至少没有衔接,缺乏战略上的衔接点,而是在各说各话。这是一份分裂的党纲,它描述了两种真实性并指出了两种前景;工人运动的双重心灵、工人阶级的矛盾经验、工人们改良主义的日常生活和革命的未来希望被捆绑在一起。

这样,社会民主党看起来一路顺风——它在不断地向上走:在帝国初期,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议会选举中仅得到3.2%的选票;而在1912 年威廉时期的最后一次全国选举中,该党获得了 34.8% 的选票,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自由党人一共获得 25.9% 的选票,保守党得票 12.2%,天主教中央党得票 16.4%。饱受歧视的政党选票增加得最多,社会民主党人由此获得了很多自信。不必成为统治者,可以处于边缘但却依然成功。这在很长时间里曾经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也导致了某些错误。

[**原书第 28 页图片说明**]1891 年《爱尔福特纲领》摘录。卡尔·考茨基撰写了理论部分,更有具体实践性内容的段落则出自爱德华·伯恩施坦。后来,这两个人在所谓的修正主义争论中成为对手;考茨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伯恩施坦则想

① 其实,这句话应译作"在德国工人运动的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但是作者在后面的相关论述中又多次使用"心灵"、"躯体"等形象的表述。为了保持前后一致,译文中统一译作"心灵"——译者注。

要修正这些原理。早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就能清楚地看出这种紧张关系：一部分期望从革命中得到一切好处，而另一部分则许诺许多改良的好处。然而，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时期的态度：些许革命的，些许改良主义的。

在世纪交替之后，党员的发展情况也是令人兴奋的。在1990年左右，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不超过20万人，1914年时，这一数字已经接近100万了。1900～1914年的这几年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是至关重要的。直到这时，它才从选举团体转变成为有战斗力的群众政党：文化组织和外围组织的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党的机关也已经着手扩充。社民党拥有了自己的——1906年在柏林开办的——中央党校，出版了大约70份报纸。此外，党的管理层也在进行着关键的代际交替：1870年出生，升迁到高层的艾伯特所代表的类型逐渐比19世纪40年代士兵出身的倍倍尔所代表的类型更为重要。组织者和书记替代了鼓动者和护民官。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社会民主党成长时代和英雄时代的人物，德国工人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壮大起来。他2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工人教育运动的最重要人物之一；27岁时，成为帝国议会的议员。当时，青年工人在本阶级的组织里快速升迁还很容易。当然，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就是殉道：驱逐和牢狱。但是逮捕也给他们带来荣誉。倍倍尔的一生在监狱中度过了大约57个月，而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不幸。在监狱里，这位体质虚弱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能够从政治的辛劳中很好地休养恢复过来，更主要的是能够阅读大量的书籍。剥夺自由对他而言肯定是一种侮辱和负担，但同时也意味着再生和教育。监狱使倍倍尔成为殉道者和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巩固了他在社会民主党内的领导地位。

[**原书第31页图片说明**]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和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于1872年3月在莱比锡法庭接受叛国罪审判。这两名被告因为反对德法战争而被判处两年监禁。倍倍尔的一生不得不在监狱中度过了总共57个月。他也因此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的殉道者和英雄。

他利用被监禁的时间大量阅读,所以他也称监狱是“工人的大学”。倍倍尔去世前不久在漫长的演讲途中筋疲力尽,这个瘦弱的人坦承:“如果你们不经常在适当的时候把我监禁起来的话,我将死亡。”

倍倍尔拥有卓越政治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演讲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尚处于鼓动性的阶段时,鼓动家比组织者更重要。而倍倍尔就是一位具有独特魅力的演讲者,充满热情和影响力。他的讲话是绝对专断的、不容争辩的,不容忍有任何矛盾。但这并没有使工人反感;他们爱戴他,正因为他排除了怀疑——当他讲到社会主义必胜的时候。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倍倍尔是类似于救世主一类的人,至少是新的、解放了的社会的预言人。在19世纪后1/3的时间里,在萨克森工人的家里,很多人将路德的画像换成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的画像。后来,倍倍尔的肖像甚至被装饰到啤酒杯和小刀上,他还经常被称作“德国工人的皇帝”。

在这个时候,工人运动还有点像宗教,还是进行礼拜和幻想的地方。倍倍尔虽然不是工人运动中的博学之人,但却是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宣言人和宣传人,他能够令人振奋地叙述并用最美的色彩去描绘未来国家,他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就是这样。到他1913年去世之前,这本书总共出版了53次。社会主义的其他著作都没有像这本书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工人。人们从这本书中可以读到,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是如何像天堂一样:人们每天工作不超过3小时;没有犯罪,也没有警察;国家运行一切良好。倍倍尔撰写的书籍长期都是畅销书,这使他成为一个富有的人。这位工人领袖甚至能在瑞士买得起一幢大别墅,而工人们对此并不生气,没有给他贴上“党棍”的标签。

这是因为倍倍尔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相信他所说的话。他是真心渴望革命,而且他在日常生活中更是一个务实的人,非常能干,在政治事务上的策略也非常灵活,绝对不是教条主义者和墨守成规的人。然而,在革命的千年至福和务实的灵活性之间却缺乏内在联系:他没有中期的改革计划,没有社会结构转变的计划;对于他来说,只有“立刻”和“遥远的革命未来”。在1910年庆祝70岁生日的时候,倍倍尔向客人和祝寿者们流露了自己内心的愿望:“我希望还能活到为你们高举革命战旗前进的那一

天。”在欢庆的时候讲这些话实属不易。倍倍尔是真的盼望这一切。当他3年之后去世的时候，和他的生命一起结束的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救世主时代。

［**原书第32页图片说明**］倍倍尔身材矮小，但却拥有过人的精力，并因此变得暴怒而独断。他渴望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家，是狡黠而实用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像崇敬皇帝一样崇敬他，把他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住处。他的话对于很多人就如同是预言一样。他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1883年）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他的长于经商没有被轻视——和其他的收入来源一道，使他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接下来是组织、机构和书记的时代，简而言之就是艾伯特的时代。艾伯特的升迁已经不像倍倍尔的升迁那么快了。现在，谁想要在社会民主党内升迁，就必须走完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演讲能力的要求比较少了，而对行政管理经验的要求则比较多了。当艾伯特1905年被德国社民党的理事会任命为书记，8年之后——作为去世的倍倍尔的接班人——升任为党主席的时候，就拥有这些经验。艾伯特不能通过著作吸引工人或者通过演讲鼓动工人，他不能唤起革命的希望，也不能吸引他的听众。工人们不崇拜他，但却信任他，至少一直到1914年时都是这样。

艾伯特是一种新的类型的干部，稳健、勤奋、可靠、高效、在专业问题上精确而内行。他以在不来梅当工人书记为业，为同志们在医疗保险、事故保险、伤残保险和退休保险等问题上提供咨询。此外，他还是一个多元化的干部，这对他的升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内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在工人运动团体中拥有过那么多的职位，这就保证了他的影响力和组织力。此外，他还参与了工人运动中的新部门和分级机构的创建工作，比如参与了青年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他超脱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之外，与右翼修正主义者和左翼极端主义者保持同样的距离。倍倍尔是社会主义的具有独特魅力和幻想的宣言人，艾伯特的行为则像是党及其机构的冷静的、实用主义的管理者。他对左翼知

识分子总是持怀疑态度。库尔特·图克尔斯基在艾伯特去世4年之后还写道:“艾伯特是一名时时在场的党棍。他是你们都熟悉的那类人:参加任何会议都不迟到;在每一次发工资的时候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表格总是井井有条。”

图克尔斯基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蔑视地评价艾伯特的。在关于工人运动历史的文献中,也常常把从倍倍尔到艾伯特,从运动到组织的过渡称为寡头化和官僚化,有时甚至称为党的权贵化。但是这种争论从根本上说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公正,因为即使到了帝国末期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构里需要支付全额工资的书记和雇员还不超过150~200名。

主要的固定职位,有1 000多个,来自党的新闻出版业。成为党的记者——在帝国时期,也包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许多有上进心的、想升迁的青年专业工人都抱有这种梦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次解放的机会,是一条在工人运动内部的职业道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条道路在无产阶级的组织世界之外,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内是不存在的。但是不能将这些岗位想象成舒适的“理想工作”。在那个年代,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常常同时也是党的书记、演讲者和手册的贩卖者。

[**原书第34页图片说明**]从左至右: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1~1925年)、菲利普·谢德曼(1865~1939年)和胡戈·哈泽(1863~1919年)在1913年1月,他们在倍倍尔去世之后领导着社民党。艾伯特是组织者,机关的代表;谢德曼是演讲者,滔滔不绝、诙谐而冲动;哈塞是受教育公民阶层的代表,一位博识的记者。但他们当中无人拥有拉萨尔或者倍倍尔的魅力。

社会民主党的干部绝不是后来被人们用漫画讽刺的、有点庸俗的、肥胖的、用党的钱过着舒适生活的那种官僚。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文化机构里,专职的“公务员”——直到1933年之前都这样称呼领取全额工资的人员——一个人同时担任主席、业务领导、出纳员、鼓动者和寄货主管等职务,是什么活都干的人。一般说来,他们的住所也是协会的书记处和仓库。正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文化组织和业余活动组织中,干部们在其岗位上呆不长,许多人在几年之后就因精疲力竭而放弃了。

从来都是这样，住在本地的干部是重要的，他们对于工人运动的生存也许是决定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全体成员，年轻的手工业工人，在帝国时期的流动性特别大。有些行业在 5 ~ 10 年之内的波动率达到 90% ~ 100%。只有那些常住的、固定的干部能够在这里保持连续性，他们保证了组织的持续再生，保证了迁入的和新产生的工人的社会化。社会民主党不是在诸多社会运动中快速消失的一种不定型的社会运动，而是成为完好无损地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停顿、体制转换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性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党的干部。当然，干部结构也使得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去极端化。组织、机构和官僚对于维持生存感兴趣，它们不会自己去冒险，不相信无法估计后果的试验；它们倾向于连续性，而不是突破。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柏林、汉萨城市[①]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萨克森和东图林根、纽伦堡、曼海姆和法兰克福等地区最为强大。一直到帝国时期结束，社会民主党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政党，将近 2/3 的党员年龄不超过 40 岁。党员们主要在中小企业工作，许多人是泥瓦匠和木匠；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业于金属加工工业和机械制造行业。自从工人运动的初始阶段起，这种局面就没有太多的改变：大部分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是具有高度技能的工人精英和手工业精英，尽管某些特定的、薪水高于平均水平的专业工人贵族的职业团体——诸如平板印刷工人、雕刻师和书籍印刷工人——对政党政治更倾向于持保留态度，仅局限参加于工会组织和活动。

[**原书第 37 页图片说明**]从一开始，教育就是重要的，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专业工人运动而言更是核心。教育是决定性的解放工具，是从无产阶级状态向上提升的杠杆。但是，一直到阿登纳时代，想接受教育的工人通往高等学校和大学的道路都是被

① 汉萨城市是德国北部的不来梅、汉堡、吕贝克、维斯马、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和格赖弗斯瓦尔德等 7 个城市之一的通称。汉萨同盟是德意志北部城市于 11 ~ 13 世纪逐渐形成的一个自由而松散商业、政治联盟，14 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加盟城市最多达到 160 个，分布在今天的德国、波兰、荷兰、丹麦、瑞典、拉脱维亚等国。1367 年成立了以吕贝克城为首的领导机构，参加者包括汉堡、科隆、不来梅等城市的富商和贵族，并拥有武装和金库。同盟在欧洲各主要港口派驻办公机构，控制了欧洲近 30% 的贸易。15 世纪晚期，同盟开始式微，并于 1669 年解体——译者注。

堵死的。教育必须由自己的阶级和政党来自治地组织。1906年,社会民主党在柏林为他们的干部精英成立了中央党校。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和老师——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908年。

无论如何,德国拥有世界上组织得最好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明星,他们为此而深感自豪。然而,在帝国的最后几年里显露出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卓越的组织能力与他们的无权力状态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史无前例地组织了大批党员,赢得了选举,编织起了由联合会、协会和俱乐部构成的引人注目的网络。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拉萨尔主义的宗派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政党。然而,社民党并没有使这个群众党更接近政权。他们对国家和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一直很小,他们除了希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之外,想不到其他的什么。社民党是一个处于等待状态中的巨人。

当时,也许没有谁像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改良主义者让·饶勒斯那样尖锐地指出了这种两难困境。在1904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者阿姆斯特丹大会上,饶勒斯在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对决辩论中曾这样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豪的1903年帝国议会选举的胜利者:"在你们表面的政治权力——就像你们年复一年地用你们日益增长的得票率和议员席位所表达出来的——和影响国家的实际权力之间存在着对立,你们的选举力量愈增加,这种对立就愈强烈。是的,在1903年7月那次选举之后,也就是你们获得了300万张选票的日子之后,这一切都清楚了,即你们拥有极好的宣传、广告和纪律的力量。但是,无论是你们的无产阶级传统还是你们的宪法机制都不允许你们将这个表面看起来巨大的300万张选票的权力转换成行动。为什么?因为你们缺乏两个本质的条件,两个无产阶级行动的本质工具——你们既没有革命行动也没有议会行动。"

在第二国际,人们也笑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革命的数学家"。他们喜欢计算,什么时候应该开始革命、开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剧烈争吵",但他们却不采取任何行动去推动这些事情。从根本上讲,他们既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坚定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不相信要求社会民主化的大规模罢工——这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他们不想知道任何要求社

会民主化的改良主义者联盟——这对他们来说太微不足道了。于是,他们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仅仅局限于组织和鼓动工作。社会民主党在某种谨慎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法化公式下僵化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即几乎没有政治活动的空间,消沉可能转变成放弃的时候,这种马克思主义还具有重要的安慰作用,它许诺拯救,因而减轻了目前的痛苦。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之后,它却阻碍了工人运动有目标地使用力量、从中去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在19世纪80年代用来坚持渡过难关的思想到1910年却只起着僵化的作用。

[**原书第38页图片说明**]1913年9月中旬,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党代表大会。从外表上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不像革命者了。奥古斯特·倍倍尔已经非常严格地重视整齐的服装。德国社民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一个静止的党:组织有力、纪律严明、选举成绩斐然——但却缺乏行动方案。后来,普鲁士州议会议员黑德维希·瓦亨海姆以她的条理这样描述这些年:"有社会民主党的长处,但也有短处。没有积极主动性,不是领导人把它藏起来了,而是群众自己要求秩序、顺从、纪律。"

社会民主党人依然是伟大的选举斗士和组织艺术家,但他们不深入真实的政治。在鼓动、组织和社会福利保险的利益代表的那一边,他们缺少深刻的政治理念:不去努力争取权力政治的回旋余地,不去寻求结盟伙伴,提不出明智的妥协建议,没有能力精心设计策略转变;在议会范围内运作的——尤其是倍倍尔那一代人——几乎所有内容都只是伟大的口号、激情、信仰和热烈的呼吁。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了寻找改革途径,以使自身走出边缘、使专制国家逐渐议会化的迫切性。对于系统地改变现有局面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同样不认为它具有战略意义。社会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是未来,是某种崭新的,不能从旧事务的改革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但这种新事物应该是怎样的,应该如何运作,为此需要哪些机构、规则和程序?对此,他们显然考虑很少,或者——比如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没有考虑。对于所有这一切,他们缺少一部纲领,他们只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宫廷牧师们几十年来所宣称的符合规律的"发展"。

人们保持着观望态度和淡泊的对未来的信仰,因此,奥古斯特·倍倍尔这样回答他的——1904 年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的——批评者让·饶勒斯:"饶勒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有 300 万张选票却没有政治权力。那么,他究竟期望我们在取得 300 万张选票的胜利之后做什么呢?或许我们应该动员这 300 万人并把他们拉到王宫前面去推翻国王?我在这个并不令我惊讶的胜利之后曾当即表示,暂时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对于我们来说,300 万还不够。不过请您容许我们有 700 万或 800 万,那么,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几年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高空飞行陷入了停滞,包括组织方面,也就是说在该党毫无疑问的最强的领域。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中心位于德国中部工业区和德国北部的汉萨城市;在德国东部、西部和南部的边境地区,他们却几乎没有支持者;在巴伐利亚、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波兹南、莱茵兰、威斯特法伦以及萨尔州的力量也都很薄弱。他们没有真正接近天主教工人,在重工业领域,如在采矿和冶炼等无产阶级那里也得不到共鸣;他们未能成功地将纺织工厂的女工组织起来,也没有同农民接触;公共领域的职员不允许加入,中间阶层也和他们保持着距离;在新的增长领域,如化工领域,他们同样收效甚微。从那时起,社民党就难以和没有技能的工人建立联系,这种情况始终如此。

[**原书第 41 页图片说明**]卡尔·马克思(1818 ~ 1883 年)的学说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最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萧条和政治压迫的岁月里,他的思想带来了安慰,提供了信心。通过马克思,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相信了资本主义的瓦解,相信了一个和谐的、没有剥削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

简而言之,并非全体工人阶级都兴奋地与社会民主党人同行。很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无产阶级 = 工人运动 = 社会民主党"这一等式还不明朗。那时,不存在(不由意志的)自动发展,在经济地位和政党政治立场之间没有理所当然的联系。宗教特征、乡村农业的心态、种族归属、地区的独特传统经常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以及工人阶级相左。此

外，有产阶级的态度在威廉时代的最后几个和平的年份里变得更加粗暴了：在罢工时，企业主坚决解雇工人；工会的失败也接二连三。尽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总的来说遇到了明显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把它当做问题——至少他们没有对此做好政治准备。

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社会主义：拥有许多能干的组织者、无数忠诚的党员、无畏的干部、积极投入的选举斗士、勤奋的鼓动者、几个引人注目的演讲者、众多有才华的成人教育家。所有这些人都没有被迫害和报复所吓倒，并创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立世界，为“没有祖国的家伙”在帝国里提供了一个家园。然而，这只是一个边缘地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夹缝，他们在其中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未能拥有到达社会领导中心的途径，而且他们也缺少相应的计划和理论。甚至可以认为，社民党几乎还没有感觉到跻身于政治心脏地区的迫切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
没有祖国的爱国者

工人运动虽然没有果断地定位于国家领导权，但在某些领域，他们还是成为威廉社会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正如他们自己所保证的那样。这种情况在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表现得最明显。1914年7月，社会民主党还在许多大城市里带领数十万人开展街头反战游行。8月4日，帝国议会党团却一致投票通过战争拨款，包括议员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一点常常被遗忘。不过，李卜克内西——和议会党团内他的几个同事一样——只是遵从了自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来发过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党的纪律。

与李卜克内西相反，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的。在他们的眼里，德国工人运动当时失去的远不仅仅是其锁链，现在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绝对不是“没有祖国的”。此外，他们预感到了迫使政府让步的机会：通过同意战争拨款，非常法和其他报复措施才第一次被避开——否则，它们将毫无疑问地威胁到社会民主党。党的干部们不必再担心组织的生存了，不必谈论自己的社会生存了；相反，作为这种“爱国行为”的回报，他们现在也获准在自己的党内设立国家公务员职位，甚至允许在兵营里散发社会民主党的文件。

［**原书第45页图片说明**］预备兵在其孩子们的陪伴下走向兵营。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一半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被应征入伍。在1914年7月底的时候，他们中的数十万人还参加了反对迫在眉睫的战争的游行；在战争爆发后，他们失去了力量，被击

> 败了。当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批准战争拨款和从西线传来最初的胜利消息的时候，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的气氛才发生转变。与此相反，资产阶级那里从8月初就是过度热情的、欢呼的爱国主义占了上风。

同意战争拨款也是社民党的帝国议会党团自从世纪之交以来工会化的结果。1912年当选的社民党议会党团中，将近1/3的人是专职工会干部。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团体，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民代表中的作家和报业人士相比，有着不同的日常生活经验、心态和利益。后者倾向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抒情诗；前者则为他们在社会政策方面艰苦的具体工作的成就而自豪。工会对事务能够发挥比政党更加有效的影响：工会干部在乡镇机构里参与工作，是社会保险领域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员，到1914年为止，他们一直为1/3的会员谈判达成劳资协议。他们不再对威廉社会、皇家殖民地政策和海军政策持激烈的根本反对立场。因为上述政策为造船业提供了就业岗位，是有利于工人的。所以，工会圈子里的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说到底，这也是为了殖民地和销售市场，也就是为了出口工业的工作岗位。至少是历史学家君特·麦这样认为，在1914年就存在一个由工会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组成的“新工业中间派”，他们主要追求对英国的竞争力优势。

这些论断可能有些片面。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工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社会民主党人8月4日的决定作好了前期准备。因为各工会联合会的理事会于此前两天就作出决定，在战争期间同企业主和政府保持“城堡和平”①。他们结束了所有悬而未决的工作斗争，取而代之的是非常爱国地、自愿地参加收割庄稼。工会不想和统治者发生冲突，他们在1914年8月就已经知道，自己将属于战争的胜利者。他们知道，军队和企业主已经奉命把工会组织看做是守秩序的要素，因而预期获得资本和国家的认可。事实恰好如此：工会不久就成为战争的重要机构；国家和管理机关接受其作为行动伙伴；工会干部的队伍没有受到损害，甚至还扩大了。当然，这

① 城堡和平通常是指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降反动政府的决定——译者注。

里有着最阴暗、最压抑的一面：工会总是粗暴地反对大规模罢工的口号，并且不无道理地指出这些行动的风险；然而为了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却不加思考地就接受了无比可怕的、导致无数牺牲者的战争。这是——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一种狭隘的、目光短浅的社会政治的组织中心主义的结果。

德国社会民主党到1914年还没有完全工会化。在党内，始终有这样的议员、干部和党员：他们并未美化君主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固执地坚持着反对普鲁士的态度，不信任任何军队，而且还热烈鼓吹大变革，梦想着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是，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在1914年8月时却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没有具体的行动战略。这是他们队伍中的英雄奥古斯特·倍倍尔留下的不幸的遗产：倍倍尔能够比所有的人都更好地描画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但他不是战略家，没有指出前进路线，没有指出连接日常生活和乌托邦的道路。

即使是在战争问题上，这位1913年去世的党的领导人也妨碍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紧要关头，至少是在思想上，拥有一条清楚的路线和一种明确的手段。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国际社会主义者已经就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过争论。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和爱德华·瓦扬带来了一份决议案。为了避免战争，这份决议案要求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进行议会干预之外，还应举行大规模罢工，甚至政治"起义"。倍倍尔立即高声予以拒绝，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绝对"不能讨论"的建议。鉴于德国工会敌对行动的立场，他的强硬反应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然而接下来就是此前经常发生在倍倍尔身上的事了：他提出了一份充满了崇高的空洞言辞和公式的替代决议案。该决议案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也没有提供详细的步骤，一切都是流于模糊和开放式的。在斯图加特社会主义者聚会7年之后，当紧要关头最终到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者们茫然了，心不在焉了，甚至瘫痪了。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最后，先进的欧洲国家的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在1914年8月都站到了民族政府一边，以表明自己是爱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可悲地失灵了。虽然社会主义者后来还唱《国际歌》，但是这首歌听起来已经不再特别令人信服了。对于迄今为止一直是乐观的、坚信未来的社

会主义来说,1914 年是一个结束。道德要求、超越民族的团结的和普遍性的言论、坚持统一的工人阶级利益——所有这一切突然都显得空洞了,突然变得不可信了。

[**原书第 46 页图片说明**]1904 年 3 月 7 日,社民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帝国议会宣布,他将在俄国入侵德国的时候扛起火枪。同时代的漫画家认为这是虚张声势的欺骗。然而,倍倍尔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是认真的,在他们看来,沙皇是欧洲反革命的后院,必须要加以防卫,必要时也要动用军事力量。当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员于 1914 年及之后同意战争拨款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提到了倍倍尔的这段言论。

这样,1914 年 8 月 4 日未必标志着与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突然决裂,社民党毕竟不是原则上的和平主义。在其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就明确假定了"国防教育"。此外,在 1914 年夏天,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是真的相信德意志帝国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反抗沙皇俄国的防卫战争。帝国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就是这样出色地策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这样被牢牢地拉入了祖国的——爱国的阵线。因为这些人都是明确的、狂热的反沙皇主义者——可靠地从马克思延续到倍倍尔。对于马克思来说,俄国的沙皇统治是欧洲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后院、自由和进步的敌人。倍倍尔也于 1904 年在帝国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如果俄国进攻的话,他——74 岁,确实不是年轻小伙子了——将再次扛起火枪。赞成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 1914 年 8 月喜欢回忆倍倍尔的这段话。不过,在这些完全有理由的反沙皇主义中,也常常流露出对俄国的深刻仇恨,比如,我们不难从社民党司库、后来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布劳恩写于 8 月初的一封信件中摘录一段:"能让半亚细亚的、酗酒的哥萨克人踏烂德国的农田,折磨德国的妇女和儿童,践踏德国的文化吗?"

反沙皇主义最终使社会民主党人同意战争拨款。这个理由不仅适用于这些人——他们将战争看做是一个机会,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社民党从长久的反对派政党改变成最终能够担任部长职务的、全国性的人民党;而且也适合于那些人——他们不希望战争,拒绝城堡和平,完全不相信政

治和军事领导人。反军国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在8月4日都遵守了纪律,同议会党团多数派一起投了票。战争和战争拨款的坚定反对者,社民党主席胡戈·哈泽甚至在帝国议会阐述了正式的理由:“我们真的做了这件事”。这个可怜的人必须违背自己的信念说,“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不允许在危险的时刻抛弃自己的祖国。”

但这种做法不是防御,而是侵略。当这一切在战争的进程中日益明显时,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党团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带头人,他在1914年12月就开始拒绝战争拨款了。一年之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说“不”的人数已经上升到20%了。社民党对此作出了独裁反应,开除了这些少数派。被开除的这些人先是于1916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工人联盟,并最终在1917年4月组成了新党: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

德国革命：
分裂与迷惘

随着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德国工人运动长期分裂了。这首先是战争的结果，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毕竟在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内就已经存在两个基本派别，即改良派和革命派。即使是经历了关于修正主义的激烈争论那样的严峻考验，这种两重本性从来都没有导致分裂，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真地辩论过退党的问题。直到1917年，借助战争的推动，德国工人运动的两颗心灵才开始寻找不同的政治躯体——尽管不能简单地将独立社会民主党看做是战前党内左派的组织上的延续。起初，独立社会民主党只是社会民主党内的和平主义者和反兼并主义者的上层组织，因而老的核心人物、理论教皇卡尔·考茨基和他的右翼对手爱德华·伯恩施坦都参加进来。

随着战争在1918年11月的结束，其实已经没有理由继续维持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了。一个由战争批评者与和平主义者组成的政党在德意志帝国领导人投降之后似乎是多余的了。爱德华·伯恩施坦基本上就是这样认为的，并且还重新加入了原来的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SPD）。但是很多人没有跟随他。独立社会民主党没有解散，相反，它发展得很快，成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群众性政党。这也要归因于战争，因为战争触动了社会进程并且使无产阶级中出现了新的抗议形式，这使得最初看起来只是短暂的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加深并最终巩固了。从现在起，一条裂痕贯穿了工人阶级，它按照生活状况、经验、代际、对未来的期望和技能把人们无情地分开了。从此之后，这种分裂不仅是取决于政治的，而且是取决于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发展——1917～1920年的这段时间对这一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3年里，德国工人运动发生了比以

往50年更显著、更剧烈的变化;在这3年里,首先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巨大转变。1920年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和1917年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已不再有什么共同之处了。

[**原书第50页图片说明**]1918~1919年的革命发生在恶劣的天气里,发生在灰色的秋天和寒冷的冬天。这场革命也许因此而缺少了明朗、陶醉和兴奋的激情。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他们必须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执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陷入了日益极端化的右翼和左翼对手的钳形运动。在1914年之前所热切盼望的这个"人民国家"开始时,他们肯定没有想象到这些。

到最后,独立社会民主党不太像是一个政党,而更像是一个另类的、激发情绪的、相当混乱的、主要由青年工人组成的抗议运动。这些青年无产者的反抗地点和行动中心主要位于军火工业的辖区,这些军火工业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凭空冒出来的,特别是在哈雷和梅泽堡周围的地区。这些青年人大多没有经过培训,从农村的内地被召来做劳工。到了军火工厂和新居住区,他们必须经历剧痛的转变。他们的基本感受是失去了依靠:旧的联系被斩断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组织和文化在这些突然出现的军事中心还不存在。因此,年轻的军火工人根本不了解连续性的组织成就、耐心地期望未来和繁重的日常实践的心态。当战争接近结束时,工资下降和供给条件恶化使其被疏远的感受骤然演变成为极端的好战。切身的生活感受促使他们采取行动、采取措施、进行造反和颠覆。他们迫切希望立即彻底改变可恶的现状。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和权威的理性辩论法,他们不能开始做任何事情;相反,他们把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蔑视为胆小鬼的党和叛徒,因为后者没有夺取资本家的金钱和工厂,也因为后者的自称为"猎狗"的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允许向罢工者和反抗者开枪。

青年无产者的反抗运动汇集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在1919年,该党的党员人数以德国工人运动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上升,3~11月间,党员数量从30万人增加到75万人。在这个过程中,战前左派中有经

验的、审慎的干部，如卡尔·考茨基、胡戈·哈泽或者鲁道夫·希法亭似乎被青年无产阶级抗议团体的潮流卷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明显地极端化了，也日益同倍倍尔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决裂了。他们不再重视普选权、议会主义、三权分立和民主宪法——他们把这一切蔑视为资产阶级的骗术。新无产阶级左派热衷于委员会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并在1919年3月将这一立场写入党纲。他们对俄国革命、苏维埃制度、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感到兴奋。1920年秋，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决定加入共产主义国际。老的、战前社会民主党人的绝大部分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对斗争，独立议员、干部和党报编辑的主体没有跟随党代会的决定加入德国共产党。缩小后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仍继续坚持了两年，直到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并。这样，虽然工人运动的分裂最终根深蒂固了，但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在经历了5年的分裂之后重新统一了。

也许，必须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极左翼也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和历史的一部分。从社会范畴来看，独立社会民主党甚至比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更多地继承了战前左派的传统；毕竟它的力量优势是在城市工业区，特别是在德国中部、柏林及其周围，在下莱因、柯尼斯堡、不伦瑞克和汉堡。当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派由不具有传统的青年工人组成，这些人主要来自哈雷地区，而反对参加共产党的人则大部分来自莱比锡，那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是对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继承。此外，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坚定地植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欧文化之中，不追求少数派专政，而是追求通过普选获得合法多数；不寻求内战，而是寻求在文明和法律的框架内所能解决的冲突。与此同时，德国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救世主主义（弥赛亚主义），它通过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信仰，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拯救世界的目标。这一信仰毫无疑问地具有绝对的、反对多元的混合特征。因此，极端左派的战略家们可以合法地利用这些信仰，它和1917～1920年的军事反抗运动混合起来，导致完全加入德国共产党。此外，德国共产党内的早期独立派人士并没有怎么反对后来的斯大林化。这绝不是大多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1919～1920年作为目标追求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原书第52页图片说明**]1918年11月，古斯塔夫·诺斯克

(1868～1946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讲。诺斯克是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人士,军事政策于他至关重要。在1918年底的"人民代表"革命委员会中,他也负责"军队和海军"。不久,他担任了共和国的第一任帝国国防部长。诺斯克是"猎狗",他动用民团和军队去对付反叛的工人和极左翼的暴动者。诺斯克部队经常性的血腥过激行为极大地加剧了社会主义的分裂和众多产业工人的极端化。在1920年的暴乱之后,诺斯克不得不辞职。"诺斯克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一直是骂人的话。

不过,要理解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极端化,不能不考虑到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过失。不仅仅是不成熟的、没有技能的来自德国中部洛依纳(Leuna)工厂的年轻人出于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愤怒而日益"左"倾;有经验的和具有熟练技能的钢铁工人——起初,他们绝不属于极端左翼——也对于帝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总理菲利普·谢德曼的行为,更对于自己的被抛弃表现出强烈的失望。毫无疑问,大多数产业工人更多地是得到了革命的承诺。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家和党报的记者们解释说,社会化是通向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途径。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从1918年11月9日起终于拥有政权了,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阶级在革命的那几个星期里没有看到社会情况的根本改变,没有看到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深刻干预以及对可恶的专制国家精英的坚决撤换。这种情况推动了部分下层人士走向极端化,促使他们最终倒向共产党人。

历史学家中时常有人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中的畏缩和延误。特别是指责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充分利用从君主制度崩溃到国民议会选举之间的这段时间,去一次性铲除旧专制国家的反民主力量;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包括东部的贵族地产占有者的财产;同样迫切的还有管理机构的民主化和军队的共和国化。所有这一切都能为魏玛共和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基础。

[**原书第54页图片说明**]在1918年11月革命开始时,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年)在柏林胜利大街举行的斯巴达克团支持者大会上。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的教子,是德国工人

运动中的极左派。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其实是个人主义者和伦理社会主义者，受情感的支配。他愤怒地攻击军国主义和专制国家的法律制度。他是第一个——在1914年12月——对战争拨款投反对票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使他成为德国社会主义青年的偶像。相反，民族主义右翼憎恨这位斯巴达克团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并且迫害他。1919年1月15日，他被自由民团杀害。

当然，这些论断有些道理，但却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而且对于被过分要求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公平。因为从君主制度结束到国民议会选举之间毕竟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内行、高效地接收德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完全更新国家的高层职员并解除军队的领导——时间并不富余。即使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府做到了这一切，下一届或者再下一届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派还是会再度还原回去。这是极有可能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全国选举中从未获得过绝对多数，而且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其实也很少参与执政，全部左派几乎也没有获得过一次超过2/5的选票。许多人认为，帝国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多数派会立即恢复旧有的所有制和权力关系。同样多的人认为，当时被排挤和被侮辱的旧精英随后就会对社会主义者实施形形色色的野蛮的报复狂欢。那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共和国通过强硬的革命措施没有获得强有力的保护，反而早早地被毁掉了。

[**原书第57页图片说明**]王宫公园里的经济学课程。从1919年起，德国社民党把有才华的后备力量送到格拉的亭茨宫去学习，该宫殿已经被改造成党和工会的中央学校。每次有50名学员参加为期5个月的课程，将学习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同时，他们还练习实际的生活改革。在这些课程中，主要讲授左翼社会主义的内容，因此，党内的许多人以怀疑的态度观察这些“亭茨人”，王宫学校的那些毕业生则经常以“超级理论家”自居。

只有一个专制的革命政府才能保证长期干预旧的权力结构;立刻进行普选并接受自己在议会的少数派地位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他们在居民当中不占有结构性多数,所以必须寻求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以便在充分广泛一致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共和国。然而,这也意味着放弃对资产阶级秩序的革命进攻。这正是民主社会主义于1918~1919年在德国的两难困境:当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在魏玛共和国诞生之际,面对资产阶级保守的社会多数派则能够认识到民主的道路时,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却要求更多,期待更多,在半个多世纪里也得到了更多的承诺。

社会民主党作为共和国的创建党,几乎未能取得任何成功,这已被证明是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的巨大历史不幸。基督教民主党人在30年后的情况就相当简单了。尤其是基民盟因此长期作为当然的执政党,社民党则是臭名昭著的反对党。尽管采取了温和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1919年间仍从一开始就遭到实力集团的反对。这些人感受到君主逃亡、战争失败、特权丧失和接受以前帝国敌人的统治的威胁。从第一天起,他们就是共和国明显而激烈的敌人,并在整个魏玛时期都为1918年11月的"耻辱"而报复。另一方面,在新共和国的最初几个月,工人的队伍已经开始壮大了,对于他们来说,民主的宪法国家同样不意味着他们通过起义和内战所谋求的社会主义的阶级专政。

所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主义在所有的领域都遭到了拒绝。此外,在魏玛共和国刚成立的不幸的几个月里,始终感受到战争带来的偿还能力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哪一个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责任,但它却必须在巨大的压力下解决所有的问题。例如,政府必须把士兵带回德国,解除他们的兵役并使其融入到工作生活中;必须参与使经济从战争生产重新转入和平生产的工作;必须设法使城市居民也有足够的粮食;必须注意不要让边境地区的分离主义派别威胁到帝国的统一。简而言之,不是完全不可理解,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害怕: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社会化首创精神将使这种局势继续激化。

[**原书第58页图片说明**] 1919年8月,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左)和帝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特拉弗明

得附近的哈夫克鲁克。资产阶级对这张照片的反应是愤怒的，他们看到自己的信念的确被证实了：来自工人的“红色人士”不具有领导和代表一个国家的个人前提条件。

此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自己作为革命政府和第一个共和国内阁的政党所遇到的这种局面都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虽然一直都在讲革命和社会的崩溃，但是显然没有预料到这将是一个没有秩序、混乱和血腥冲突的时刻。他们有着一幅相当和谐的、田园牧歌似的、非常天真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画面：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曾这样设想——将像纸房子般地坍塌，然后，人们直接进入解放了的、到处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国家。奥古斯特·倍倍尔曾经无数次地这样讲述，社会民主党人是真心相信这些话。因此，他们从来也没有特别仔细地考虑过社会主义经济在复杂、先进的工业社会里的细节问题。他们只在帝国时期自己曾经工作过的领域里有特长，即社会政策领域。在这个领域，他们在1918年11月9日之后是有能力的，并且果断地实现了其非常具体的想法。无论如何，工人们不必长时间地等待8小时工作日的到来了。

除此之外，社民党却完全没有章法。最糟糕的是第一位社会民主党政府首脑本人，菲利普·谢德曼。谢德曼其实还是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位演说家和鼓动家，但却不是政治家。作为一个出色的、富有进攻性和应变自如的演说家，他最后经常在帝国议会的重要辩论中代替生病的奥古斯特·倍倍尔。1918年11月9日，当他站在帝国议会的阳台上郑重宣布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他行事迅速且本能地自信。他特别受工人的喜爱，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赏识他。尽管他是一个聪明人，但却有必要学习历史的教训。他不按部就班地勤奋工作，不关心细节，也不持续地追寻某一政治诉求。1919年，这位社会民主党总理看起来似乎被政治版图搞得晕头转向了，由于自己缺乏能力，他不久就依赖于其官员们的建议了。

谢德曼的失败同时也揭示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普遍问题。在国家管理上，他们普遍很没有把握。但他们该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专业人士，以重新占据公共行政部门的领导岗位？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在诸如后来的业余大学那样的自治工人教育机构中，教学

内容是非常折中的,这里学一点自然科学,那里学一点历史,再点缀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这一切都很好,对个人肯定也有收获,但是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得不到真正的专业技能。因此,威廉专制国家的许多高级公务员在制度变更后还仍然继续占据着其官职和地位。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同他们打交道时非常困难;他们大多是专家,只具备有限的业余大学知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面前感到处于劣势——包括在专业知识上、语言上以及社交礼节上。尽管旧的官职人员只能通过令人尊敬的严厉和果断的人事政策去约束,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却举止胆怯而谦卑。他们摆脱不掉自己的劣势感觉——在魏玛共和国没有摆脱掉,在波恩共和国的很长时间里也没有摆脱掉。

[**原书第61页图片说明**]1919~1925年间的共和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几乎没有热情的支持者。对于保守派和上层资产阶级而言,由于他贫寒的出身,他太"普通了"。由于他在1918年1月是金属工人罢工委员会成员,人们在这个圈子里称他为"叛国者"。艾伯特在相当长的过程中为此辩护并因而损害了他的健康。然而,极左翼也把他看做敌人,因为他的政策以社会民主为目标,即针对温和的、改良主义的工人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联盟。

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政策和权力政策的全部悲剧清楚地体现在各州议会职位的分配上。在德国,人们传统上希望州议会成员接受过法学教育。但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中却从来没有足够数量的法学家,因此就把早先的"工人公务员",主要是前帝国议会的议员,派到州议会担任职务。但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社会民主党的州议会议员们大都提心吊胆地、毫无把握地履行职责。职务低于他们的专业管理人员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使得这些领导人——这些专业人员早就因社民党领导人的贫寒出身而蔑视他们了——搁浅。大多数新的州议会议员迅速投降了。从2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全面提名州议会人选。社会民主党也就自愿放弃了一部分重要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在这个领域不能胜任——这也是威廉时代社会民主党及其政治禁欲的致命遗产。

20世纪20年代：
在阶级环境和人民党之间

20世纪20年代中期，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从直接的政治竞技场退回到有其独特烙印的、封闭的特殊文化的氛围之中。社会民主党人筋疲力尽且深感沮丧——共和国没有像他们所期盼的那样发展。他们的党现在是反对党——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着柏林，1920年以来，他们不得不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过度的通货膨胀使工人运动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的库存现金迅速贬值，尤其使工会变得没有战斗力；此外，社会民主党的人一如既往地认为自己和旧的有教育特权者，和现存所有的阶级司法，和高度卡特尔化的企业经济权力、政治权力都是相冲突的。8小时工作日——在君主政体倒台后的革命岁月里所取得的改良成果的核心象征——实际上又成为过去了。现在受挫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国，那是不够的"，他们重新梦想一个完全不同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他们从恶劣的魏玛共和国的现实逃离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之中，重新在（那种社会）环境中安顿自己，在那里试验性地组织策划社会主义的虚渺世界。社会民主党人自己把自己孤立了，离开了社会的中心，他们在1926年的行为就像是还生活在1890年一样。

因此，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束之后，社会民主党仍然有着两颗心灵。原本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政党的无数党员渴望与资产阶级制度断然决裂，渴望一个新的、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渴望成为社会民主党文化的核心，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环境的特征，其首要任务已经不是在共和国的机构内开展议会工作和冷静的改革政策，而是加强自己的对立世界，这一世界应该成为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王国的前奏。社会民主党的环境将自己封闭在未来拯救的希望里，而不再对共和国的现状抱有太多的期望了。人

们逃往超越现实的世界里。

脱离社会现实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魏玛共和国后半期非常隆重地举行的众多开幕式、节日和纪念活动。这些欢聚的中心内容经常是表演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信念艺术的朗诵和表演唱。多年来都是一个相似的模式:共同的舞台英雄是一位工业无产者,舞台的背景是一个工厂,一个阴暗的后院或者一个破败的居民区。这些不幸的、革命的演出把党纲中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同旧约中的预言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民主党庄严出现的第一幕里,可以看到无产者正在苦难的道路上,处于困境和受压迫之中,舞台上全是"黑暗的夜晚—沉闷的强制劳动—疲劳的折磨"。在这些巨大的痛苦之后,是工人阶级突然的呐喊,出现了集会、游行,战斗的决心取得了优势。最后,演出以无产阶级的幸福结局、胜利、社会主义未来社会的解放和拯救而结束:"清晨—大白天—新时代"。

在现实世界的失败愈惨烈,无产者在社会主义的节日演出中取得的胜利就愈伟大。他们的这种礼拜仪式会给聚集在一起的居民们以安慰,在一定程度上是 20 年代没有保障的社会主义民众的鸦片——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此外,人们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形。它意味着抛弃政治干预,放弃了平日不断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努力。社会民主党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严格(与他人)分离的交流空间,他们坚持这样做并且绝对主张:只有无产阶级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只有工人阶级具有解放的品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世界。对于其他阶层、心性和信念而言,这里没有空间。因此,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这种文化不是真正自由和多元的,它具有太多的千年至福的、乌托邦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的社会主义几乎没有为一种真实的共和国文化作出贡献,而这种文化正是魏玛共和国当年能够在意识形态的绝对要求和尖锐的两极分化中间生存下来所迫切需要的。

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难以克服在帝国时期学到的隔离居住区的心态,妨碍了他们与魏玛共和国保持理性、冷静的关系。但是这毕竟只是消极的一面。因为这种环境不仅起到孤立的作用,而且也起到团结的作用,是积聚力量和试验的地方。它有助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失败之后不放弃,并把他们聚集、团结起来,促成新思想,是无数实际

事物的“训练场”。其要求是渗透到现代工人的全部生活领域中去并把他们相互连接起来。出现了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组织，垂钓者、弓箭手和私人市郊小果园主的组织，歌手、业余演员和艺术爱好者组织，素食者、裸体者和自然疗法者的组织——这些组织扩展到了所有可能的领域，尽管重点是体育、教育和福利。

1926～1929 年，这个组织世界经历了它的繁盛时期：在这些年里出现了无数的协会、体育馆、足球场地、日光浴和空气浴、儿童之家和疗养院。具有显著社会主义环境特征的那些乡镇因而在财政上减轻了负担，因为工人通过自己的主动性创造了原本必须由乡镇承担的那些东西。作为环境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恰恰是自救运动，而不是依附于国家的；环境调节他们的事务，动员工人，赋予他们义务，却不委托责任。全面照料的、家长式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时代到来得要晚，是在这种环境之后。

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这种社会）环境稳定了；它愈是环境政党，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它的损害就愈小。但是，社民党并非在全德国都是这种环境政党，它从来没有在全部工业区和工人区成为环境的政党。在以家庭作业为主的地区，诸如埃尔茨山脉、弗科特兰特或者图林根的森林地区，就没有建立起这种稳固的环境。在帝国时期，社会民主党在这些地区作为一种比较松散的反对统治者的抗议运动，曾取得了良好的选举结果。但是，当它自己在魏玛共和国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就必须要对倒退负责，由于不能实现承诺，社民党在上述那些地方迅速垮掉。工人们集体离开，先是形成抗议运动，最后也有不少人加入了纳粹党的阵营。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是环境党的地方都证明了自己极具危机抵抗力。通过其周围环境中的那些组织，社民党也触及到了不太关心政治的那些工人，并深入地扎根于他们的私人生活之中。如果它是一个纯粹政治的政党，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工人的主体对《海德堡纲领》或者《爱尔福特纲领》，对方向问题和派别争论，对议会辩论的细节和社会民主党地方支部的集会都不感兴趣。大多数工人对体育活动、徒步旅行、自行车运动或者类似的活动感兴趣。社会主义环境对业余活动领域的组织和占领愈多，工人和社民党的联系就愈紧密。对于失业者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主义环境中的组织给他们提供了家园，规划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这种社会环境是社会民主党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纽

带;它帮助人们更好地渡过难关。

[**原书第66页图片说明**]1931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工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德国参赛者步入体育馆。工人体育运动是社会民主党的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社民党的先驱者们希望不同于资产阶级运动员,拒绝了能力竞赛和比赛,他们把这一类东西看做是不团结的,因而也就是非社会主义的。然而,他们的这种观点却不能被普遍接受,因为社民党的工人也希望较量,希望比赛和获胜。所以工人体育运动日益同资产阶级体育相适应,仿效阶级敌人所规定的东西——也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

但是,环境的作用仍然是矛盾的:它一方面凝聚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是能量中心和力量中心,是一个安慰之所,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最不幸的时期里巨大的忠诚保险库;而另一方面,它却促进了社会民主党自我隔绝的要求,脱离政治,取而代之的是让未来的梦想引导自己。社会环境的优点必然伴随着它的缺点。虽然可以在回忆的时候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想象一个务实的、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但是那样的一个政党在共和国危机的时候很可能在选举中惨败,并在1933年以前就会被毁掉了,因为他们在基层缺乏乌托邦式的盈余和属于亚文化群的激情。拥有了这一切,他们才能渡过困难时期。

不过,在这种环境中,社会民主党的人类学的错误也显露出来了。他们这样希望:在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面文化中,出现一种具有非工业社会伦理的、新的、社会主义的人类。在他们这里,合作和团结是决定性的关键词,因此,文化社会主义的干部们曾长期激烈地反对在工人联合会范围内接纳竞技体育。他们尤其坚决地拒绝足球——因为足球运动与团结无关,人们在足球比赛中互相争斗,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

[**原书第68页图片说明**]只有少数工人业余活动协会的会员人数超过当时与其相对的"资产阶级"组织,工人自行车联盟"团结"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组织在20年代末拥有31.4万名会

员。会员们能够得到协会自己在奥芬巴赫的工厂生产的价格便宜的自行车。星期天时，他们骑车远足；在选举期间，则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宣传活动。他们把自己看做是“阶级斗争的红色轻骑兵”。

在20世纪后半期，文化社会主义的圣殿守护者们日益陷入防御。年轻人不再跟随他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想踢一次足球，较量、对抗、获胜，迫使别人屈服。由于担心失去支持者，文化干部们在工人运动中最终不情愿地接受了工人足球协会。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不报道比赛情况，不公布比赛结果，不写是谁射进了最漂亮的球，是谁最有力地阻止了一次失败。这种做法激怒了不少人。积极分子们转到了“资产阶级的”俱乐部，读者们不再订工人的报刊而改订“一般性广告”。这些人——他们在竞技体育时代和正在到来的闲暇工业时代里展现自己——不同于新人类的维护者所喜欢看到的。

这一切尤其使“社会主义的工人青年”(SAJ)苦恼。在青年组织里弥漫着清教徒式的风气，成员不许饮酒，不许吸烟，不许结对跳舞，既不准读卡尔·迈的书，也不准看西方的电影。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的破烂”。然而，与“社会主义的青年工人”严格的品德理想和教育理想相比，大多数年轻人肯定更喜欢这些“垃圾”。“社会主义的工人青年”在20年代末只能组织起全德国0.72%的青年人就毫不奇怪了。最糟糕的是在业余活动极其丰富的大城市，“社会主义的工人青年”的成员在这些地方不断流失。这一切都已经揭示了世界观的社会主义的危机，揭示了一种全面文化要求的失败。

[**原书第71页图片说明**]青年社会主义者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里就是这样游行穿过大街小巷的。队伍是封闭的，服装是统一的：蓝色衬衣、腰带、红领巾。人们对共和国不再抱有太多期望了；人们更想要的是——社会主义。这在魏玛共和国初期还是完全不同的：青年社会主义者的穿着五颜六色——民

间的、生动改良的——按照“漂鸟运动”①的方式,和资产阶级团体与宗教团体组成共和国的政治联盟。在 1923 年之后,青年运动变得日益好斗和教条主义。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快乐的共和国的“凉鞋社会主义”②彻底结束了。

当然,不应该将这一切太过于尖锐化;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不把自己作为专业工人的纯粹的环境政党,而且也根本不作为完全教条化的文化社会主义运动。它也一再尝试超越环境、向其他社会阶层和文化开放。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当时已经开始追求用人民党代替阶级党,但基层却没有跟随他们。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忽略,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下降,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宣称的那样在上升。在 20 年代中期,只有 45.1% 的就业者属于工人阶级,在工业大企业就业的工人比例则恰好是 1:5。纯粹从计算的角度说,仅仅通过产业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在其著作和纪念会上非常喜欢将其神化并定性为集体的拯救者——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实现了。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工人不是选择社民党,而是选择天主教中央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以及德国民族党,后来不少人还选择了纳粹党。为了能够成为多数派,社民党必须要超越它的核心选民,即产业专业工人;要接触工人的其他部分和中间阶层的新团体。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此不抱幻想。他们现在首先开始争取农民,后者的特殊财产利益在社民党 1927 年的基尔党代表大会上得到明确承认。在 1929 年的马格德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试图通过保证容忍宗教的方式吸引天主教工人。因此,社民党自 20 年代中期以来所呈现的景象是完全矛盾的:在下层,社会民主党基层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自我隔绝;在上层,党的领导层则开启了一些窗和门。

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社会民主党人在职员那里是多么成功。在德

① 漂鸟运动(Wandervogel)起源于 19 世纪末的德国。青年人提倡学习候鸟精神,走进大自然,磨炼生活能力,创造属于青年自己的新文化。因此,当时的德国青年都乐于踏上冒险旅程,一如候鸟般浪迹天涯——译者注。

②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青年人的流行穿着短裤、凉鞋以及女孩的简单罩衫等改良服装,便于参加远足等户外活动——译者注。

意志帝国之初，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精英还主要来自于木材行业；世纪交替之后，也有很多人来自钢铁行业。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干部高层岗位的后备力量多数已经是在办公室，而不再是在手工业车间或者工厂厂房进行职业培训了。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青年”和“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全国主席全都接受过商业培训。其实，这根本不奇怪——与帝国时期不同，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职员阶层愈来愈多地录用了上升型的专业工人家庭，即典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孩子。

在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内部，职员也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作用。在1932年7月的德意志帝国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在职员那里获得的结果甚至比在工人那里的结果还好。前者中的24%选了社民党，后者则是22%。在魏玛共和国即将结束的时候，社民党早已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1932年，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在工人当中获得的选票一样多；1924年之后，这两个左翼政党加起来也从来没有在其所追求的和被称作属于社会主义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那里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德国从来都没有代表过多数人口，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代表自己阶级的多数。

除了职员阶层以外，社民党领导人发出的人民党的信号几乎没有得到反应。他们处在魏玛共和国的那段时间对于清除环境的界限、摆脱恐惧和克服偏见来说太短了。在农民和天主教徒那里，对社会主义的憎恨是如此之深，这种憎恨不会仅仅因为善意的纲领决议或者党代表大会的讲话而消除；更因为在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相反地，始终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反对教会和反对农民的情绪。

[**原书第73页图片说明**]1927年，莱茵兰—普法尔茨的一个冶金车间高炉旁的工人。这个工业区在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包括在阿登纳时代之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堡垒。在这里，中央党、共产党，有时甚至工团主义者的力量很强大，即使是民族自由主义者也能在工人中得到响应。相反，社民党却感到很困难，自由工会也难于在鲁尔的大企业扎根。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的——自由工会的运动几乎一直是以有技能的手工业专业工人为主，其组织中心主要是位于德国的北部和中

部地区。

此外,天主教徒同样拥有细密的文化组织和业余活动组织的网络。农民是稳定地扎根于乡村生活的传统的,而乡村生活在意识形态上大都是由地主和牧师主导的,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是通过战争协会和护卫协会、农民联盟和乡村联盟、教会少年联合会和青年妇女联合会而组织起来的。这是一个坚定保守的、在 20 年代经常选举德国民族党人的、反犹的,以及在共和国末期受纳粹党精心塑造的生活世界。城市的社会民主党鼓动家几乎找不到和他们建立联系的途径——这些鼓动家们不熟悉乡村的生活习惯,不能熟练掌握当地人的语言,即德国土话;他们往往不知道母猪是如何饲养的,牛是如何生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种土豆,什么时候收割谷物。但是德国农村在魏玛时期还是一个决定性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将近 1/3 的从业人员当时在农业领域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几个姊妹党不同——在农民那里找不到联盟伙伴,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没落和最终破产,因为农村成了纳粹党人集结和攻击共和国的地区。

[**原书第 74 页图片说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将近 1/3 的从业人员在农业领域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很难赢得农业工人或者农民选民。作为大城市产业工人的阶级党,他们太不熟悉乡村的心态、语言和习惯。只是在 1919 年,相当多的农业工人选举了社会民主党人。此后"乡村无产者"的多数再次站到了民族的右翼立场上了。

社会民主党人其实只在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工人那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尤其是 1919 年初,在这个选民团体,也包括中小城市的工人当中,社民党获得了历史上非同寻常的选票增长。然而在 1920 ~ 1924 年之间,刚刚赢得的工人阶层又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旗帜,更确切地说是转向右翼,到德意志民族党人那里去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社民党在 30 年代早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把将近 1/5 的选民输给了纳粹党。与此并行的是在同一时期里,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工业核心团体的一部分向左转,先是转

向独立社会民主党，然后转向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陷入了一种钳形运动之中：它的政策对于不少工人来说太左了；相反，其他人则认为这些政策过于改良主义了，太忠于国家和适合于国家了。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它还能作为反对派从政治上集合下层民众的各种抗议运动；当它在魏玛共和国作为一段时期内的执政党时则相反，它引发了自己方面反对自己的抗议，这种反抗即使是在它自己处于反对派时期也不能缓和。从此，这种政治“劈叉”的艰难动作一直折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

魏玛共和国结束：
反对“共粹”和纳粹的斗争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使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政党政治的一个替代选择。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共产党人在议会选举中几乎赶上了社民党：1932 年 11 月，德国共产党获得了 16.9% 的选票，社民党则获得 20.4%。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起，这两个政党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充满仇恨的争吵。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共产党人主要是激进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是没有经验的假革命家、无依无靠的流氓无产者，是受外来控制的莫斯科人；在 30 年代早期，社民党人经常只简称其为“共粹”。共产党人那一方对社会民主党对手也毫不客气，喜欢称之为“诺斯克分子”、“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的傀儡”或者“党棍”，后来就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了。

“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并非产生于德国，而似乎是作为共产国际的口授术语从莫斯科进口来的。但这一进口的词汇被德国共产党人所采纳，并且还被日常的和鼓动的政治语言自愿地接受。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在 1918 ~ 1919 年革命之后，一部分工人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是多么的疏远。在魏玛共和国的后半期，共产党支持者的核心，尤其是其出生年份为 1895 年到 1905 年的人，受到内战时期，往往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经历的影响。通过这一代人——他们把暴力看做是生活当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斗争尖锐化了。

[**原书第 78 页图片说明**] 从 20 年代末起，共产党人把社会民主党看做是“法西斯主义的开路先锋”，如果不是其“危险的

变种”的话。“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来自莫斯科，但共产党的工人却在德国完全接受了这一理论并开始利用它来进攻。社会主义的分裂加深了。图为1930年4月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反对布吕宁新政府的示威游行。

当共产党的工人在20年代末失去了工作或者根本还没有进入到生产过程的时候，这种情况的程度加深了。从此，不再是企业，而是“街道”成了这些人冒险活动的空间，吸引他们直接参加富有表现力的示威游行、精心策划的抗议姿态、好战的行进游行和充满暴力的骚乱。前线的共产党人和内战那一代的共产党人看起来似乎要把他们在1914～1923年——魏玛共和国最后1/3的时期，也是失业率日益攀升时期——所积累的暴力经验转换成好战的和爆发的街头行动。这一切与他们一再经历挫折和危机的生活感受和生活经历相吻合；而以改良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连续的、有耐心的以及温和的政治工作逐步改善社会地位，则与他们的观点不协调。对于一个在1932年失业的年轻共产主义者来说，改良主义的信条是完全不恰当的，他们肯定憎恨它并与之作斗争，因为改良主义的信条以熟练的技能和自信心为前提条件，而这一切是一般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当时还不具备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是讲一个工人运动，而是讲两个工人运动事实上是有道理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不仅被不同的政治理解所分开，而且被其支持者之间的社会文化鸿沟所分开。在产业工人当中存在两种文化，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愈长，工人们分开得就愈远。共产党人平均比社会民主党人年轻得多，经常是失业的；从职业上看，在采矿行业和家庭化工行业就业的——就像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比在钢铁行业就业的多；政治上的联系也不紧密，他们在党内往往只停留很少的几个月，然后就转到新的方向去了。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人对自己的政党非常忠诚，他们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职业上更加稳定，在选择政治工具和工会工具时，比他们的“兄弟党”成员更加谨慎。

但共产党仍然作为“兄弟党”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密切联系。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同根同源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日常生活中，在居住区，尤其是在业余活动协会的环境中也长期存在交叉。一直到

20年代末,工人协会都不是明显地以社会民主党为主,而是在社会主义内部均衡的。这个环境是全体社会主义者的,而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德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在这个环境里,双方还是一个整体,还能感受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团结与统一。

无论如何,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28年。直到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还一起做操、郊游、唱歌。之后,转向极"左"的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协会网络。即使是在此之后,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系也还没有最后切断;双方在政治和文化上虽然各自行动并且毫不信任对方,但却仍然唱着——尽管不是在一起——同样的歌曲,同样庆祝"五一",在游行时举着同样的红旗,谈话时还互称"同志"。对于工人运动的这两种文化而言,无产阶级依然是令历史转变的社会形象,社会主义依然是所有阶级斗争的终点。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因此就是模糊的:多数社民党人和这个极左翼的政党划清了界限,但有些人仍和他们有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民主党愈是环境政党,和共产党人之间就存在愈多的共性;反之,他们愈是坚定地作为共和国的政党出现,工人运动的这两个派别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愈明显。

到3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几乎是唯一真正支撑共和国的政党。他们在该党最后一届帝国总理赫尔曼·米勒倒台之后,容忍了1930年9月成立的海因里希·布吕宁内阁,近乎不顾一切地试图挽救脆弱的魏玛共和国。为此,他们向其支持者提出了大量苛刻的要求,因为布吕宁政府严厉紧缩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社会福利网络,导致失业人数急剧上升。1932年,当布吕宁上台时,超过550万人没有工作。这位中央党总理的通货紧缩政策使中间阶层和工人进一步极端化了,而且由于社民党沦为反对党,许多选民流向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这就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解体时期的两难困境:他们想要拯救共和国,但为此执行的却是——也许是别无选择的——使共和国的对手在选举中更强大、更有威力的一种政策。

[**原书第80页图片说明**]1930年,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宫前举行的"五一"集会。这个极左翼政党不是小宗派——它吸引了大量群众。在魏玛共和国即将结束时,将近17%的德国选民

把票投给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党几乎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对于一个支持共和国的改良主义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期。

不过，这种政策并不是，就像通常所断言的，机会主义。最后，这种容忍政策无疑是不受欢迎的，而且使社民党损失了选票；许多被称为“党棍”的人丧失了他们在国家、各州和乡镇的议员席位。此外，社民党在1931年秋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党内危机。在几个反对容忍政策的国会议员退党或者不得不退党时，这一危机达到了顶点。他们建立了位于社民党左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AP），相当数量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该党，其中包括吕贝克的高中生赫伯特·弗拉姆。但在13年之后，他以维利·勃兰特的名字重新回归“母党”；又过了20年之后，他担任社民党的主席长达将近1/4个世纪。

尽管存在这一切抵抗，社民党多数派在1930～1932年还是坚定地继续着自己的政治路线，因为他们——与广泛流传的偏见不同——对纳粹主义的本质绝对不抱任何幻想。早在20年代，许多明智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就非常详细地研究了意大利的情况，并从中得出适合德国的结论。在30年代早期的社会民主党期刊上，登载了大量关于现代右翼独裁问题的有洞察力的分析。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明白，纳粹党人参与执政必然会对工人运动进行暴力的清洗，必然会破坏法制国家并取消议会和政党。正因为对这一点如此准确的了解，他们确立的全部议会策略就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使纳粹党人远离执政权力。因此，社会民主党容忍了布吕宁，尽管党的部分支持者为此在政治上几乎无所适从。

[原书第82页图片说明] 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1875～1952年）正在进行一次演讲，黑—红—黄帝国国旗队队员护卫着讲台。帝国国旗队建立于1924年，是共和主义者的保卫和战斗联合会。它形式上是超党派的，但其成员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当泽韦林在1932年7月20日——“普鲁士政变”的那一天——没有号召积极防御的时候，这些人的失望是巨大的。此后，他们的自信被打破了。

当然,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想危害他们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普鲁士政府。在社会民主党1927年的基尔代表大会上,党的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还在代表们的热烈欢呼中颂扬社会民主党的州长奥托·布劳恩政府是"对整个欧洲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在30年代初期吸引到的支持者比他们退出帝国政府时还要多。实际上,普鲁士是重要的,它包含了德意志帝国大约3/5的领土和同样比例的人口;谁拥有了普鲁士的管理机构和警察机构,谁就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在1919~1932年之间,与帝国其他地方不同,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里——同民主党人和中央党人一起,有时也和右翼自由党人一起——几乎从未间断地组成内阁。在共和国的其他部分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普鲁士是一个"堡垒"。这个"堡垒"不能被拿去冒险。社会民主党人也因而必须在帝国议会容忍布吕宁。如果他们推翻了这位中央党的总理,那么后者的天主教党友在普鲁士州议会肯定也会迫使奥托·布劳恩辞职。

然而,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讲,问题还不仅仅是普鲁士。首先是要阻止纳粹党人夺取政权。他们希望通过容忍政策赢得时间,并把纳粹党的迅速崛起主要归因于1930年之后蔓延开来的、剧烈的经济危机。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希望,萧条的结束同时也将是希特勒政党的结束。这样,他们至少就排除了纳粹党——一个极其杂乱的抗议团体的集合党——在没有取得具体成果的情况下长期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最后,纳粹党人缺少类似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使其在危机时期也能坚持下去的成熟的、稳定的环境。社会民主党人因而期望,纳粹党的运动早晚会因其自己的矛盾而失败。

这并不是一个完全荒谬的期望。在1932年底时,看起来确实是这样,纳粹党人似乎停止了前进。纳粹党内危机严重,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丧失了200多万张选票,得票率从37.3%下降到33.1%。在几周之后的乡镇选举中,这种跌势继续发展,纳粹党的不少积极分子似乎已经听天由命了。希特勒的反对者在欢呼,而纳粹党的宣传主管,约瑟夫·戈培尔则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1932年是连续不断的倒霉时刻,……未来是阴暗而浑浊的;所有的出路和希望全都消失了。"

[**原书第84页图片说明**]奥托·布劳恩(1872～1955年)、奥托·韦尔斯(1873～1939年)和卡尔·泽韦林(从左至右),普鲁士州长、党的领导人和普鲁士内政部长——这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赫尔曼·米勒去世之后,社会民主党在魏玛时期的3个核心人物。他们未能拯救共和国。布劳恩在政治上筋疲力尽了;韦尔斯没有足够的兴趣执政;泽韦林在需要强有力地打击民主国家的敌人时,则太不果断了。

众所周知,戈培尔的悲观主义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而且,社会民主党的容忍政策早在1933年1月30日以前就失败了。1932年5月,海因里希·布吕宁不得不辞职。在此之前5周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在奥托·布劳恩普鲁士政府中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只是由于州议会的新多数派没有能力组成自己的政府,使老内阁得以继续履行职责。但是到1932年7月20日,布劳恩看守政府的时期也结束了,因为它被新的帝国总理弗兰茨·冯·巴本——借助兴登堡的总统授权,他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议会,而利用其"寡头内阁"来执政——通过紧急法令和破绽百出的理由给解除了。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普鲁士政变"。保守派精英没有耗费太大的力气、没有遇到抵抗就摧毁了著名的"普鲁士堡垒"。从这时起,社会民主党人的自信心破碎了;从这时起,他们在柏林的权力中心对政治没有任何影响力了。社民党在1932年时处于一个他们在1913年时已经经历过的时刻。然而,众所周知,一切还将变得更加糟糕。

[**原书第87页图片说明**]1931年,冲锋队[①]在不伦瑞克的聚会。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恩斯特·勒姆领导下的冲锋队拥有将近50万名成员。它在工人中间取得了绝对成功。年轻的、失业的工人经常在冲锋队和共产主义的红色先锋战士联盟之间摇摆。许多农业工人和专业工人也是冲锋队队员。纳粹主义不是

① 冲锋队是希特勒于1921年8月创建的德国纳粹党的半军事组织,因队员穿褐色制服,又称"褐衫队",简称SA。冲锋队最初主要从事破坏革命运动、冲击其他党派群众集会及进行街头殴斗等活动。1934年6月之后,冲锋队为党卫军所取代——译者注。

> 一个简单的"资产阶级"运动。正是它的群众特征,它的充满活力的、跨阶级的凝聚力,使得它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和共和国的危险敌人。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人们一再地讨论这个问题,即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最晚应在巴本政变的时候——必须放弃合法的议会策略,取而代之以议会外的行动,实行罢工,甚或是武装起义,至少应该和德国共产党统一行动。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做这一切,但他们对此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

和德国共产党人统一行动——如果考虑到德国共产党无情的反民主的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这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值得去想的——将不会大幅提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的战斗力。最后,1932 年时,德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只有 10% 多一点的人是有生活保障的。因此,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共产党人完全不再是罢工的要素了。1932 ~ 1933 年,在拥有将近 600 万失业者的情况下,罢工不再具有真正的威胁了。这也和作为榜样推荐的卡普—吕特维茨政变期间的工作抵制有区别。德国在 1920 年几乎是充分就业;而且,帝国总统、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还站在罢工者一边。1932 年则是他的继任者、保守的陆军元帅兴登堡站在街垒的另一侧,他们形成了广泛的反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帝国政府、普鲁士国家警察、司法机构、军队、警察和钢盔团[①]的街道部队、冲锋队、党卫队结成了富有战斗力的精锐部队。假如发生一场内战,社会民主党人将会毫无希望地被击败。工人将被遣入血腥的屠杀和可怕的失败之中,作出完全无谓的牺牲。这一切说明了社民党领导人责任感,他们被吓倒了。

不过,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一点行动都没有。1932 年,他们在还掌握执政权的地方,如巴登、黑森和汉堡,以警察行动和开业禁令等手段有力地打击了纳粹党人。在反法西斯游行时,他们还不断地在大街上广播他们的"钢铁前线",在民众中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就像社会民主党所

---

① 钢盔团是德国军国主义者弗兰茨·赛尔特和西奥多·杜斯特堡于 1918 年 12 月以志愿兵团形式建立的组织。钢盔团是特别保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组织。1933 年 5 月中旬,冲锋队和国防军缔结了一项协议,冲锋队、党卫队以及钢盔团均隶属国防部领导。1934 年钢盔团解散,并入冲锋队——译者注。

说的，试图解释纳粹主义的“本质”。这些工作肯定不算少——但这也就是全部工作了。这无论如何不足以阻止共和国大规模向右转的发展趋势，不足以使纳粹党人止步。恰恰是社民党的青年党员异常气馁了。社会民主党又一次出现了徒然拥有庞大的组织却力量尽失的情况，出现了沮丧和停顿。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30年代初期曾夸下海口，宣布采取暴力的群众行动，甚至威胁在反革命攻击宪法国家的时候将实行社会民主党的专政，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却停止了，没有进攻，没有号召防卫。这完全符合力量对比关系，因此是具有责任感的，但是它却消耗了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太多的力量、信心和自信。

民主的社会主义失去了青年人，这些青年人在帝国时期还称赞民主社会主义及其幼稚的乐观主义。在德国社民党的最高领导层，几乎只剩下长期工作的“工人公务员”和令人尊敬、头发花白的干部们还在终生任职。他们当中无人能再口若悬河了。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间，不再有人民的护民官了，不再有独具魅力的人，也不再有提出新概念和新目标的幻想者。他们的言论仿佛还停留在威廉皇帝和奥古斯特·倍倍尔时期，还在宣传“人民国家”，但这一切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已经不能引起任何人的兴趣了。

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领域没有想象力。在经济领域，他们提不出宿命论以外的任何东西。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将危机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是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在30年代初期，当工会的团体表示支持国家积极的繁荣政策和依靠贷款支撑的投资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权威鲁道夫·希法亭嘲笑地对这些计划置之不理，党的主席奥托·韦尔斯还给予他必要的支持。因此，纳粹党能够在1932年7月选举之前表明自己是创造工作岗位的政党——社民党不想成为这样的政党——随后赢得大量的选票。社会民主党人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又一次远离积极的政策并窒息了新的思想。

党的领袖奥托·韦尔斯和思想家鲁道夫·希法亭在某种程度上是魏玛时期社会民主党全部懦弱和全部不幸的化身。毫无疑问，韦尔斯是一个非常好的干部，稳健、勤奋而精明；但是作为政治家，他缺乏远见和魅力。他只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人物，被自己的组织世界所俘虏。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熟悉这种环境了——社会民主党人定期在他父

母的餐馆里聚会。他学会了裱糊匠的手艺,参加了旅游协会,在其联合会里成为工会干部,后来在勃兰登堡省得到党的书记职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他接替升任帝国总统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担任党的主席时,已经升迁到了多数派社民党的顶层。

[**原书第88页图片说明**]魏玛共和国末期时,社会民主党在选战中反对法西斯的宣传画:精力衰竭的、被绑在纳粹标志"卐"字上的无产者。

和艾伯特一样,韦尔斯完全是党的人。他掌控着党,因为他掌控着组织的技术和工具。他作风独断、易怒,粗暴地对待党内的反对者;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人们称他是"独裁的韦尔斯"。然而,他只是在自己的党内拥有这种作用,外界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他的辩才也只在其自己的环境内有影响,他的讲话中充满严厉的措辞,他的发言枯燥、缺乏变化、没有节奏。后来《前进报》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回忆说,韦尔斯"只有在他感到跟在家里一样的地方,即在党内,在工人圈子里——在他们当中,他是一个人物——才觉得自己强大"。韦尔斯体现了环境、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内部文化。他还把党置于严格遵守理事会指令的帝国议会党团之下。

和众多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韦尔斯对经济政策知之甚少。在经济问题上,他完全信任——就像奥古斯特·倍倍尔信任卡尔·考茨基一样——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与考茨基相比,希法亭也许是一个更富有创见和创造性的人。他的主要著作《金融资本论》受到普遍好评,一段时间内甚至被当做马克思《资本论》的续篇而赞扬。考茨基——更多地是一个刻板的人而不是有创造力的人——没有得到同样的赞誉。在经济方面,希法亭也只是自学者,虽然采用了与倍倍尔和韦尔斯不同的方式。他生长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并在维也纳学习医学,然后当了一名儿科医生。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不是职业。此外,他喜欢咖啡馆,在维也纳和——搬家后——在柏林都是这样。在约斯提(Josty)咖啡馆与其他知识分子的谈话令他满意的同时,与工人交谈却令他——大约是他在党的多次大会上作过报告之后——感到困

难。当然,工人阶级对于希法亭也是——并且恰好是——社会主义的主体,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他却尽可能地远离与这个主体的直接接触。因此,他在党内没有基础,只是在奥托·韦尔斯的强烈干预下,他才在一次次的选举中拥有社会民主党人的帝国名单中的一席之地。

[**原书第91页图片说明**]30年代初期,共和国的多个劳动局门前看起来都像柏林这样。队伍很长,排队的人们非常绝望。内阁一再削减失业金和福利金。1932年,在600万正式登记的失业者中,有将近1/4的人不再能够得到福利金。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福利国家瓦解了。这使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选票。

当然,社民党需要希法亭。无论如何,他们相信这一点,因为希法亭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少数几个熟悉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人物之一。社民党分别于1923年和1928~1929年两次推举他担任财政部长,但他都可悲地失败了。他不是具有实践天赋的政治家,也许还是社民党领导层最不善于实践的人物之一。虽然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分析社会政治形势,并为之找到相应的漂亮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但要排除阻力去推行政策,在自己管辖的部门里维持秩序,约束倔犟的公务员却是他做不到的。如同许多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理论家一样——他们错误地信仰了社会主义——希法亭是忧郁的人,是一个宿命论者。通过才华横溢的论证,他使社会民主党人的消极性及其发展决定论合法化了。卡尔·冯·奥西茨基就曾经批评了这一点——无疑有些尖锐,但却并非是错误的:"他的讲话是那些只忙于伟大路线,而不关心小事的人的讲话。他始终是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体制,数学精确,但却不具备领袖人物的本质,没有思想火花,缺乏感知事物背后的不合理性的嗅觉。"

然而,在30年代初期,既不是韦尔斯的组织性固定,也不是希法亭的脱离实践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关键问题,关键性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中间派不断向右倾斜。最后,纳粹党成了社会中间阶层的政党。中间阶层在魏玛时期是右翼的,最后是极右的。紧接着,共和国崩溃了。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指责只能是,他们在这个时期没有能够坚实地深入社会的中心。他们在保卫魏玛国家的时候缺乏可靠的联盟伙伴。当其他人摧毁共和国

时,他们寂寞而孤独地——就像在他们的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站在那里。

[**原书第92页图片说明**]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年)在魏玛时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家。与倍倍尔时代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不同,他还作为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参与政治实践。然而,希法亭作为政治家不够幸运,作为理论家则一直是严重的宿命论者——最后他在这两个领域都失败了。

纳粹时期：
“人民联盟”的尝试

社会民主党人在魏玛共和国失败了，但他们不属于将纳粹党人推上台的那些人之列。在1933年1月30日之后，即政权被移交给希特勒的时候，他们拒绝为帝国新总理建立其棕色独裁提供表面上合法的手段。这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孤立了社会民主党人，但这也使他们很自豪。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为其在1933年3月23日的行为而自豪，他们也有权利自豪。在这一天，在违背宪法和没有得到立法机关同意的情况下，希特勒让国会议员们授权他颁布法律。帝国议会由此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基础。毫无例外，所有的资产阶级议员都投票同意授权给希特勒；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而且是一致反对。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理解和历史意义而言，这是自然的：人们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迫害他们，然后在希特勒时期，再度并且更加残酷地迫害他们。然而，他们也进行更加勇敢的抵抗，从未屈服，与此同时，德国资产阶级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机会主义地站到了压迫者的一边。

不幸而自豪——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历史上是紧密共生的。3月23日是最不幸、最悲惨、最压抑的一天，但是历史上也许不存在第二个令他们为之如此自豪、如此自信、近乎得意扬扬地回顾的日子。他们最终反抗了所有的压迫和暴政，没有因为在3月23日的前一周里有几个社民党议员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而气馁。即使是克罗尔（Kroll）歌剧院——里面正举行着国会会议——入口前搭建的狂喊乱叫的冲锋队棚子，也未能将他们吓倒。他们的党主席奥托·韦尔斯在认真、庄严而坚定地论述自己的议会党团反对授权法案的意见时，根本不理睬纳粹党议员持续不断的恶毒、威胁的喊叫。这是一个不幸政党的最后一次伟大而崇高的姿

态。没有人比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更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切,关于奥托·韦尔斯的讲话,他写道:“他沙哑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严肃。态度激昂、充满道义上的辩解和呼吁。这是在可以想象得到的困难时刻的一场演讲——坚定、勇敢,甚至是在抑制形式下具有进攻性的。人们发现了目前侵害这个善意却又不幸的政党的全部悲惨境况。”

当然,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人也屈服了。那些大的组织想尽可能地使自己保存下来,它们不会只为理想主义的原则而牺牲自己。尽管他们通常喜欢一成不变,然而一旦关系到自己的生存时,就反应迅速而灵活了,并且寄希望于协商而不是冲突。在工人运动内部,这种情况在工会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纳粹党统治初期,工会曾希望和新的掌权者达成谅解。在匆忙的顺从中,他们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了距离,宣称自己是非常爱国的并于1933年4月中旬支持棕色政府将五月一日定为国家的“民族统一节日”的计划。工会的办公楼挂上了黑—白—红的旗帜,干部们参加了国家命令的“五一集会”。然而,工会第二天就明白了,事情不再是发生在1890年,也不是1914年;不是俾斯麦或者贝特曼·霍尔韦格,而是阿道夫·希特勒当总理的时候了:1933年5月2日,冲锋队和党卫军占领了全德工会联盟(ADGB)的办公楼、编辑部和银行,逮捕了工会领导人。所有这些艰难的讨好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工会被纳粹党人击溃了。

[**原书第96页图片说明**]1933年8月,社会民主党的被捕者在奥拉宁堡集中营“集合”时,其中包括库尔特·马格努斯、汉斯·弗拉施、赫尔曼·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恩斯特·海尔曼。海尔曼,一直到1933年都担任普鲁士州议会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是布劳恩—泽韦林政府的重要支柱。纳粹党人早已因此而憎恨他。另外,他还是犹太人。1933年6月,盖世太保在他常去的柏林约斯提咖啡馆逮捕了他;接踵而至的是充满了侮辱和折磨的异乎寻常的苦难史,以及辗转于多个集中营的漫长历程。1940年4月,海尔曼在布森瓦尔德被谋杀。

两周半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党团主体也体验到了,新

的掌权者不会因善意的行为而有所收敛。社民党议会党团——它的最重要的人物在此期间已经移居国外——在5月17日投票同意了希特勒的和平决议。在一个短暂的瞬间,很多事情看起来和1914年8月4日那天一样。当帝国议会一致同意纳粹独裁者的提案时,室内人员全体起立鼓掌并一致唱起德国国歌。但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毫无帮助,第二天,迫害该党积极分子的血腥行动仍毫无减弱地继续进行。1933年6月2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德国被禁止了。

从这时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激进的要求、和所有资产阶级阶层彻底划清界限的要求、和资本主义社会断然决裂的要求,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重新占了上风。1934年1月,流亡到布拉格的该党理事会,即所谓的SOPADE,提出了一份新的纲领,这份纲领仿佛是对自己改良主义的过去——尤其是自1918~1919年以来——的一次总清算。所有的一切现在都要改变;社会民主党人又希望做坚决的革命者了,并且向资产阶级敌人宣布了激烈的抵抗。党纲的措辞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激情和华而不实,而是更激烈、更刚性、更坚决。"在反对纳粹党人独裁的斗争中",宣言是这样开始的,"不存在妥协,也没有改良主义的合法性的空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只能通过下述目标来确定,即攫取国家政权、稳固国家政权,而且这个国家政权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为了打倒独裁,这一策略采用服务于实现这一目的的所有手段。革命的斗争需要有革命的组织。旧的形式、旧的机构已经不复存在了,尝试使之复活是不适应新的斗争条件的。"这个纲领以下面的号召作为结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主义万岁!"

[**原书第98页图片说明**]1933年6月2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纳粹党的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禁止。这一禁令持续了12年——和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一样长,直到社会民主党人能够重新合法地聚集在一起。另外,帝国时期的压迫和纳粹主义的压迫还有区别。在1878~1890年之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仍然能够留在议会里;在1933~1945年之间,他们则在集中营里或者必须移居国外。1993年之后,绝对不再有法制国家的保护了。

因此,在非法的和移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当中,“革命者”现在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口号。但是,这个词写起来容易,在现实中为其添加内容却很难。毕竟社会民主党人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革命者。关于革命,虽然他们谈论了很多,并且陶醉于这一概念及其承载的魔力,但是受到重视的始终是他们所处的合法有序的宪法国家的基础、权利和法律。他们的全部组织都是专门用于聚会、集会、游行、学校教育、宣传行动等,简而言之:用于公众。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文化也一直是公众文化。该党从来没有考虑和使用过密谋手段,即使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这一事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尽管在布拉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他们的宣言中写上革命的准则,但他们却不能成为革命组织。他们没有这种组织和经验,也没有必要的人员,肯定也没有赌徒般的无所顾忌——这一切对于颠覆性的军事行动也许是必要的。无论如何,传统上倾向于群众民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会转向革命的地下活动。

[**原书第 101 页图片说明**]很多社会民主党人——在 1933 ~ 1945 年之间,他们未能积极地抵抗纳粹党——在小圈子里聚会,保持他们的传统并希望不受伤害地度过独裁时期。在聚会时携带一面红旗——如同这里所展示的前马格德堡青年社会主义者在易北河岸举办的一次五一节秘密庆祝——已经需要勇气了。

最初还有一些小的、精英干部的团体在这方面有能力,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他们自称为“红色战士”、“新的开始”或者“国际社会主义战斗联盟”。早在总统制内阁时期[①],他们就已经开始准备非法行动,有时甚至是非常密谋的。当然,曾

① 1930 年 3 月 27 日,魏玛共和国在最后一届联合内阁,即米勒内阁垮台之后,议会民主制出现了严重危机,国会无力组成一个有决断能力的内阁,其组阁权力临时转移到总统手中。德国从此由议会制内阁进入“不受国会严格约束”的“总统制内阁”时期。此后,历届内阁总理均由总统亲自任命。直到希特勒于 1933 年 3 月 23 日迫使国会通过新的授权法令,开始了纳粹的独裁统治——译者注。

经上演了大量的革命浪漫主义，但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圈子在1933年1月30日以后至少还拥有人们所需要的组织结构，以便能够在独裁统治下走出地下活动并作出反应。他们的积极分子大都是年轻人，在这个年龄，必须要敢于做事、敢于冒险，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没有必须要为之负责并需要照料的家庭。准备积极抵抗也恰恰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和个人生活状况的问题。

然而，即使在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干部团体内部也不是特别的革命，他们不是一个坚决的颠覆组织，在这里，没有打算进行攻击活动或者约定怠工行动。这些青年左翼社会主义者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多地是社会民主党的，他们不是寄希望于炸药和武器，而是寄希望于小册子和传单。在纳粹统治的前两年里，左翼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抵抗是语言和文章的抵抗。社会民主党人矢志不渝地相信宣传教育和充分论证的力量，而不是相信暴力。

在这个意义上说，纵使有布拉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宣言的革命要求，社会民主党的抵抗仍然是传统的、魏玛式的。这种抵抗只是被迫更向内部集中了，因为大多数小册子只在可靠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内部流传——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大约有20万人。它首先面向自己的队伍，应该保证他们的凝聚力并增强他们的士气。这已经够危险的了。此时，可不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了，俾斯麦当时还极其尊重通信秘密；而现在是盖世太保时期了，他们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追踪、发现并摧毁社会民主党的传递员小组。此后，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再度尝试有组织地在全国内传播文件，领导干部们的活动也只局限于在当地和老朋友及老同志郊游、小范围社交活动或家庭聚会的谨慎接触。他们互相帮助，随时了解最新情况，但却放弃了议会外的全部活动；他们在等待希特勒的失败。1935年之后，社会民主党人悬挂批评政府的宣传画或者在工厂烟囱上写口号等这类活动无论如何是过时的了。

［**原书第103页图片说明**］1934年被分配去建设帝国高速公路的很多工人不喜欢行希特勒礼。但是政府努力争取工人，他们试图用津贴和奖金使工人同制度和解。当军火生产带来经济繁荣时——1937年达到了充分就业——，几乎就没有抵抗活

动了。在1937～1941年之间,工人的主体对纳粹制度没有什么不满。社会主义的信仰破灭了。

不过,这不仅仅是因为害怕盖世太保。处于非法状态的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积极分子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细致准备并相互精确地约定他们的行动——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30年代中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早期针对纳粹主义统治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抵抗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众多的青年失业者,他们不满意并有充足的时间。然而,1935～1936年的失业率迅速下降;1938年,德国军火工业甚至抱怨缺乏专业工人了。这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抽空了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的基础。

从1930年起,即当纳粹党人的选票从2.6%上升到18.3%并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二大党团时,社会民主党人就宣称,希特勒政府对工人意味着剥削、奴役和征服。但是到1936年时,恐怕只有极少数工人认为自己的状况比1930年——当时社会民主党还在参与执政,还存在工会——更加恶劣。这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抵抗工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恰恰是在20年代后期结束学徒的青年工人不愿意回忆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境况:大多数人常年找不到工作,所有的一切在当时看起来都毫无希望,社会陷入四分五裂。与此相反,在1936年,对许多人来说是重新恢复了正常状态,长期失业的青年人突然找到了工作,他们的生活也回到了平静、稳定的状态。他们第一次能够筹划自己的未来,能够结婚、养育孩子并建造住房。此前不敢想象这一切的几十万青年人现在看到了自己的新希望。毫无疑问,在军火工业繁荣时,即在1936～1939年之间,德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重新获得了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所失去的生活的勇气。

在纳粹主义时期,愈来愈多的年轻人远离了旧工人运动的经验世界。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工会被禁止,而且也因为第三帝国向工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工资形式在更大强度上个性化了,而且是根据效益来支付的;额外工作、特殊倒班、加班及特殊技能都能得到奖金,还参与盈利分配或者得到其他报酬;谁勤奋,谁就能挣得多,这是青年工人根深蒂固的印象。30年代中期纳粹德国提出的口号“让有才能的人自由发展”很受他们的欢迎。在德国,工人从来没有像1939年战争

之前的几个月那样，带回家这么多钱；以前，青年人很少有这样的希望，即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职业晋升。

在这一背景下，经典的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的准则褪色了；这已经是第一次告别旧的社民党和旧的魏玛阶级社会了。这时开始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又在年轻的联邦共和国的“经济繁荣”中得以继续；是的，这些事情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即在所谓的魏玛共和国的“黄金岁月”就开始了，但是随后就被1929年的经济危机窒息了。它涉及到的是文化转变，这种转变在1924～1929年之间就已经显现出来，在1936～1939年之间再度强劲复活，最终从50年代中期起实现突破：远离集体环境文化和政治环境文化，向个人闲暇社会和消费社会转变。

[**原书第104页图片说明**]那不勒斯的居民欢迎德国度假者，后者于1937年10月通过纳粹旅游组织“欢乐的力量”(KdE)游览意大利。KdE的旅游便宜而受欢迎，对工人来说也是如此：1938年，1/3的工人接受了它的服务。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中等阶层的人士才能够负担得起长途旅行和航海旅行，但是工人也已经能够支付得起到东海和北海沙滩或者图林根森林旅行的费用。这也使工人同政府和解。人们习惯于度假和旅游：闲暇社会出现了。

对于闲暇社会来说，重要的是度假。纳粹党人实施了最低限度的度假方案：在30年代后半期，平均假期为9天。纳粹党人还通过建立“欢乐的力量”(KdE)这一组织的方式来大力资助旅游。1939年，至少有1 030万人接受了它的服务；1/3的工人当时参加了“欢乐的力量”的旅游，虽然不是到马德拉群岛，但也到了德国中等高度的山脉或者北海和东海的沙滩。这对于德国工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体验。普通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发生了很多改变。大城市的人们愈来愈经常地去电影院、咖啡馆，或者晚上到舞厅去消遣。在周末，郊外游览地饭店的用餐人数达到最高记录。当然，这常常也是逃离纳粹党令人心烦的宣传的一种方式。然而德国人，尤其是工人就这样完全习惯了这种个人消费式的、娱乐的和非政治社交

的新文化。与过去几十年中往往是严肃的,即使在业余时间也致力于工作和教育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文化相比,这种文化显得更简单、更轻松。

从这时起,收音机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魏玛时代就已经有无线电收音机了,但是当时只有中等阶层的成员才能负担得起这种昂贵的仪器,而且并不是在全德国都能接收到广播。1933 年之后,“大众收音机”的成批产品第一次使媒体走入工人家庭。它极大地改变了工人的业余生活方式:许多人开始在家庭圈子里度过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与妻儿一起坐在厨房里听收音机。在常去的酒馆里和企业同事聚会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与魏玛时代的工人文化相比,这是巨大的转变:不是街道、邻居、酒馆、人民之家和工人协会,而是自己的居室、自己的家庭构成了业余活动的中心。在 30 年代中期,工人生活变得更加个人化了,起居室越来越多地取代了过去的“环境”。

[**原书第 106 页图片说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收音机主要流行于大城市和中等阶层中,农村居民和工人几乎没有收音机。1933 年“大众收音机”的成批产品——纳粹党人出于宣传目的而资助的——改变了这一切。1939 年,大约 2/3 的德国家庭拥有收音机,这个比例在战争期间更高。通过收音机,工人业余时间的活动不断变化。他们现在更多地是和家庭成员一起在家里、在收音机前度过夜晚,而很少去同事的圈子、酒馆或者协会。收音机瓦解了工人的环境。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在战争发生转折之后,在炸弹也落到德国的城市之后,这种退回到个人生活的趋势更强烈了。不过,这一次往往是从纳粹党人的社会退出,因为工人以前对希特勒和全部棕色流氓的那种不信任又回来了。许多人相信,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希特勒将带来战争和死亡的不幸预言是正确的。但是,逃回私人生活在本质上同时也是逃离集体、逃离伟大的政治要求和群众呼吁。

在第三帝国末期,社会主义的环境肯定从核心被毁坏了。纳粹党人破坏了社会民主党精英和通常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的工人之间的连接纽带:联合会体制。联合会对于工人运动的文化和政治发展是决定性的资

源。随着工人联合会被禁止，社会民主党的环境也丧失了它的基础，它的心脏，特别是精英和基层之间的联系松懈了。

[**原书第109页图片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人们经常跳舞。大家都很高兴——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沉闷岁月过去了。人们高兴：不再是只能立正、齐步走或者听宣传演讲。跳舞是一个阀门。它可以是"漂鸟运动"式的，如同这幅画中所示的；也可以是豪华的，几乎是"美国式"的。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酒吧和舞场在30年代后期剧增。

在体验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与许多工人把战前时期当做一个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的时期的体验不同，社会民主党从前的干部和领导人在纳粹时期经受了无与伦比的社会衰退——他们被侮辱、被迫害、被威吓。他们失去了自己作为编辑、国会议员、市议员或者合作社管理者的专职岗位，现在他们通常不得不靠做挨家挨户兜售东西的小贩或辅助帮工来艰难度日，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盖世太保会突然出现在门前，将他们带走、讥讽、折磨，甚或杀死他们。对于党的从前的那些积极分子来说，这是悲惨的岁月，他们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恨在1933年之后不断加深。持续的外来压力已经使他们彻底成为阶级环境中的社会主义者。

与此相反，在从前环境中的"小人物"那里，事情则向另一个方向发展。1933年之后，经济和社会状况没有继续恶化。相反，对于许多工人来说，战前那几年是物质稳定的几年，他们的经济状况甚至往往是更好了。显然，政权将社会民主党的前精英排斥在"民族共同体"之外，同时却在竭力追求产业工人群众的认同。

首先，体育被证明是一个促进融合的工具。虽然工人运动员迄今为止的组织在1933年春季被禁止了，但现在那些想踢足球、想从事田径运动、体操运动或者游泳的人，在短暂的迟疑之后就投入到所谓的资产阶级协会。然而，这些协会往往也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在这里——特别是在足球协会DFB里——主要也是工人或者职员，不过，他们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在这些协会里，人们欢迎工人运动员，特别是当他们带来

好成绩的时候。来自前社会民主党环境的工人逐渐习惯了新协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把它看成了一个新的家园,从前的阶级、环境和世界观的界限逐渐模糊了。在老环境的基层,反资产阶级的情绪日益减弱了。

这对于青年人肯定比对于年长者更适合。对于30岁以上的人来说,加入长期与之斗争的阶级敌人的协会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只是在极其个别的情况下这样做了。而且,这些人也不是特别受欢迎,因为他们作为参赛运动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大体上说,年长者的确更多地依靠从前的组织,比青年人更可靠、更忠诚。

产业工人中的全体青年人这时还根本没有真正认识社会民主党环境的文化和组织本质。那些于1918年、1919年或者1920年出生的人在1932年时还太年轻,还没有参加过诸如工人教育之类的活动。相反,这个年龄段的人受到了纳粹主义的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在第三帝国初期完成了学徒期,此后十几年中,他们陷于男人结成的士兵共同体。起初,他们必须为帝国义务工作;然后,必须在1936年重新实施普遍兵役制之后服兵役,从1939年起,他们在各个战场战斗;最后,1945年之后,往往是坐牢。当这一代人在大约30岁时回到德国的时候,他们厌倦了、筋疲力尽了。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生活的安宁和富裕,而不是新的思想或者政治的两极分化。在这一代人——海尔穆特·施密特的士兵们——之中,最不应该恢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旧环境社会主义,他们成了基民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长期执政的支柱。

苏联占领区时期：
环境的瓦解

环境社会主义一向是在萨克森、图林根和马格德堡地区最为强大。直到1933年，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协会都在这些地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业余活动组织在这里拥有其大约70%的财产。在莱比锡、大奥特斯莱本和开姆尼茨，有工人体操运动员、工人运动员以及工人急救员的大型联邦学校和联邦之家；在格拉附近的亭茨宫，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工会对他们的后备力量进行培训。简而言之，德国中部在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是社会主义工人文化的中心。在马格德堡、德累斯顿和耶拿之间的地区，社会民主党比在帝国所有其他地区都更深地植根于环境之中，这就使得德国中部的社民党一直到1933年都是全国范围内的精锐。

但在1945年之后，首先就是这种环境推动了社会民主党在苏联占领区（SBZ）的毁灭。因为，如前所述，这种环境不是纯粹社会民主党的，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环境，既包含了德国共产党的支持者，也包含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它在日常生活中架起了一座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桥梁。此外，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分歧。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乐于在德累斯顿的州议会上互相指责对方为“无赖”或者“叛徒”，但在萨克森州的乡镇层面，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却在同一个协会踢足球，在工人合唱团里一起高唱阶级斗争的歌曲、朗诵同样的口号而且彼此之间以“同志”相称。和资产阶级及其文化的距离也使这两个团体统一起来；他们固执于自己的阶级和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尽管存在所有的政治冲突，协会体制无论如何也在某种程度上把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支持者维系在一起。1945～1946年，苏占区统一政

党的建设者们恰好是以此为起点的。

社会民主党人也属于这些建设者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在德国中部的工业区明确地宣扬“工人阶级的统一”——甚至比最初倾向于克制的德国共产党人更加热情。在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州府城市,社会民主党人最初根本不是想重建旧党,而是要立即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德国共产党人没有对此不买账。在德累斯顿,德国社民党之所以单独成立,只是因为共产党人敦促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在社民党于1945年10月在东部地区举行的各州党代表大会上,所有呼吁同德国共产党人结成“兄弟协议”的演讲人都赢得了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不是俄国军队强迫他们这样做的;直到1945年初秋,这一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在自愿地追求左翼政党的统一。

[**原书第113页图片说明**]1945年9月,苏占区的工人和农民游行,要求瓜分贵族的地产。土地改革的要求把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威廉·皮克利用了这一共同点来组建德国统一社会党。东部社民党的发言人奥托·格罗提渥于1945年解释道:“土地改革的政治方面是铲除容克地主对德国命运的有害影响。几百年来,大地主们是反革命的代表。无数军官、公务员、部长和朝臣来自于他们中间。他们是德国一切自由发展的敌人。”当时,西部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大概也同意这一观点。

德国共产党人主要是以其抵抗纳粹独裁的方式、方法在德国中部的社会民主党人那里赢得尊重的。社会民主党人基本上放弃了积极的抵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想不受伤害地经受住独裁统治,并在最小范围内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是现实而简单地经历这一切的,期望通过在烟囱上刷标语而使独裁政权垮台,而且这种做法在民众中间得到很大支持。德国共产党人,大多数比社会民主党人年轻得多,却敢于冒生命危险——他们当中的数万人在集中营被谋杀。这种勇气给社会民主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33年以前,他们往往不是特别认真地对待德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口头极端主义、口号政治和自吹自擂的空话感到紧张。但是,德

国共产党人在纳粹的独裁统治下却证明了自己不仅能够慷慨陈词，而且一旦需要，就会付诸行动。1945 年春天，当筋疲力尽的德国共产党人从集中营回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略带歉疚地接受了从前的“异己分子”重新返回社会主义家庭。他们现在不再是“共粹”，而是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好同志和兄弟。这也是统一的政党的土壤。

在 1945 年夏天表态支持工人运动中统一政党的德国中部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当然没有预见到德国统一社会党后来的黑暗独裁事实。他们更多地是出于向后看的、情感的动机，希望回到帝国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当时工人运动在政党政治上还是统一而充满乐观的。魏玛国家和工人运动的分裂应该被挽回，因为这段时间代表着严重的失败，尤其是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 1918 年之后遭受了比德国其他地区的党内同志更为严重的挫折。新的社会主义的统一政党——1945 年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应该是奥古斯特·倍倍尔的那个老党，而绝不是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党。

但是，在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那里，1945 年秋天的气氛发生了逆转。年终的时候，对于一个统一的政党最初的兴奋突然消失了。在社民党的地方联合会和各州领导层，对于共产党人和苏联军队做法的抱怨增加了；社会民主党人原有的对德国共产党及其宣传鼓动伎俩的不信任再度回来了。很明显，事情发展得不公正，因为苏联占领者给德国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不同——配备了非常专职的党的机构。德国社民党缺少拿工资的干部，而德国共产党却能把它的职业革命者派遣到最遥远的乡村；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足够的纸张去印刷宣传品，而共产党却已经拥有了；特别是不允许社民党重建从前的附属组织，这些组织在 1933 年被纳粹党人没收的可观的财产也没有归还回来。这一切使得德国中部的社会民主党人很痛苦，此外，还有苏联人的瓦解政策。

[**原书第 114 页图片说明**] 为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而作的宣传画。

然而，现在，即 1946 年初，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突然竭尽全力地、迫

切地转向要求建立统一的政党了。当时,他们已经充分巩固了共产党,确定了他们在战略上的做法,而且通知到了最后一名干部。共产党人开始施加压力了——在上层通过指挥官,在下层通过企业。在他们的迫切要求下,到1945年底,社会民主党在企业里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的企业组织,一个对于社民党的传统非常陌生的组织元素。企业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刚刚参加社民党,共产党人和这些政治新手打交道胜券在握。在1946年的最初几周里,他们给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带来了准备好的关于"工人阶级统一"的决议;这些小组或者愿意同他们一起对外公布这个决议,或者已经在企业层面开始合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干部反对这件事。与共产党人对抗,他们太没有经验了,而且他们在不少时候反正是同情"统一的想法"的。

与此相反,一些社会民主党的老工人对这件事情感到愤怒。1946年1~2月,这份决议被企业大会强迫通过的方式令他们不满。很明显,一切都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当笨拙的发言人单调地念完准备好的稿子——有时甚至是磕磕绊绊地照着稿子念的——紧接着就表决。然而,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做法——在他们的党内尽管有纪律,但却始终有公开辩论、反对意见和反对派存在的空间。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拒绝与德国共产党合并的工人和那些有同样想法的党的领导人没有聚集到一起。基层反对统一的人士在上层反对统一的人士当中找不到代言人;否则,就可能强化不满,甚至可能导致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理事会中怀疑者的两难问题:在小圈子里,他们承认其对德国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厌恶,并相互保证忠诚于社会民主党的老目标;在稍大一点的相互熟悉的同志范围内,他们有时敢于公开表达意见;但是,在党员大会或者群众集会等公开场合,他们必须表明自己是统一的支持者。他们也许能够有所节制地宣讲统一的口号,也允许对合并的方法和速度提出一些谨慎的问题,但却没有更多的余地了。如果他们公开反对这些计划,肯定就会被指挥官撤职,甚至也许会被捕。在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身上就发生这种事情了。统一的反对者不能将他们的抵抗组织起来,不能建立机构,以公开宣讲自己的立场。因此,社民党党员主体并不知道他们党的很多领导人现在对德国共产党是多么怀疑。

然而，绝对不是苏占区社会民主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持有这种怀疑态度。大多数州的党主席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与德国共产党的合并。他们在党内拥有不少支持者。特别是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党主席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奥托·布赫维茨，似乎希望作为“工人阶级统一”的奠基人而被写进历史教科书。他们也是推动奥托·格罗提渥周围最初还迟疑的柏林中央部门走向与共产党合并的人。他们也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社会民主党人在苏占区的党代表大会上一致表决赞成德国统一社会党。从1946年春天起，他们在德国东部静悄悄地、完全默默无闻地告别政治舞台长达40余年。他们的支持者开始时还完全赞同这个决定：1946年秋天，当苏占区仍举行半自由的乡镇、县议会和州议会选举的时候，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选民结构基本上与魏玛共和国末期的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一致。

为什么，人们自问，社会民主党人在最后没有拒绝与德国共产党的合并？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为什么能让统一的决议通过，为什么社民党的基本选民最初也把选票投给统一社会党？这里也许汇集了多种因素。一是传统的“党的纪律”，它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是一种崇高的、近乎是道德责任的价值。一个不断受到国家和强权迫害的政党必须紧密团结，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疯狂行为。从某一特定的点开始，一致听从党的领导层的指令，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定信仰。在这种情况下，苏占区党的领导于1946年2月呼吁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顺利合并时，党员们——在表决时——就撇开了他们的顾虑和担忧。党的理智比个人的怀疑更重要。

另一个因素是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新的统一社会党内能够赢得超过共产党的优势，德国社民党毕竟拥有比共产党多得多的党员。和很多德国人一样，他们预计被分成4个区域的国家在政治上会很快重新合并在一起。之后，失去苏联占领势力的保护的共产党人很快就会失去影响力。铁幕的降落和这个国家在几十年中被分裂，统一社会党在一个分裂了的国家里发展成为极权政党——所有这一切对于1946年的人来说是绝对不可预见的。对于他们来说，局势和政治的回旋余地都显得很明确。

[**原书第119页图片说明**]威廉·皮克(1876～1960年)和

奥托·格罗提渥(1894~1964年)在1946年4月21日举行的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的党代表大会上握手。德国东部社民党的命运由此确定了:他们加入了统一社会党。从1925~1933年任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的格罗提渥成为统一社会党的共同主席,并于1949年10月担任东德总理。

1946年4月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最初并不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擎天巨石。起初,社会民主党人看起来在党内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从地方支部以上,所有的理事会职位都是两个党对等平分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最初的组织章程也是既考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又考虑共产党的观点。反正这两个党在一些政策问题上的答案相似:双方都致力于全面的土地改革;希望清除前纳粹政权的司法、国家机构和学校;推动卫生事业的根本改革,并且非常重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

根本分歧同样也是存在的。直到1946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处于最左翼的德国中部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低估了这一点。对苏联占领区内旧工业区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来自产业工人的共同社会出身以及与"社会主义"的共同联系。在这个意义上,1945~1946年所犯的错误也说明了在帝国时期出现的,经过魏玛共和国和纳粹主义传承下来的、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观历史性失败的一些原因。因为在这个世界观中,共和的国家制度、宽容的自由权利、公民的美德、个人的自治、多元主义和自由企业主的创新都不重要。它误导产业工人阶级走入歧途,预先设定、预先解码了历史的自然规律性,并断言已经认识了解决所有社会冲突的途径。这一切导致了教条主义和盲目性,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也是这样。

社会环境和世界观毕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似乎并非不可能进入新的统一的政党。老的社会主义工人环境的标志和语言使得共产党人在1946年易于把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点置于显著地位。阶级斗争的演讲、群众集会、红旗、革命歌曲——所有这一切都在新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促成了一种历史连续性的感觉,令许多人想起了1933年以前的时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平静了,并且适应了乌布利希的国家。

在随后的时间里，老的社会民党的环境在从前的德国中部工业区死亡了，即正是在从前环境高度发达的地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年代不允许保留这种环境。继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条件甚至比在纳粹时期还要恶劣。希特勒上台时，社会民主党的干部精英已能想象自己作为整体被排斥在社会和政治之外。在那种完全是同类的群体中几乎不存在间谍和反叛者，在家庭或者亲朋好友的范围内还能公开讨论新的当权者。人们很团结，而且——由于持续不断的外在压力——比较容易保持组织的身份认同。

[**原书第120页图片说明**]1990年6月，社民党在还处于东德的时候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东部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西部的区别是：他们更年轻，并且多数是从事自然科学的职业。牧师建立了这个党，但是工程师和技术员却在党内占优势。如同当时德国东部社民党所自嘲的，他们一起组成了“物理学家和形而上学者的联盟”。

东部地区的情况就不同了。从50年代初开始，老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可能在这里采取团结一致的抵制行为了。因为这一群体在政治上不再是同类的了，自己的队伍里现在有间谍了，可能——非常可能——就是自己的兄弟。1935年，当一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家庭举办大型生日庆祝时，人们可以认定，所有的在场者都对政权持有类似的看法，人们能够坦率地表达对政权的批评。1951年，同一家庭的一个忠于党的老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不能再这么做了：侄子想成为一个热情的，甚至是盲从的德意志自由青年同盟（FDJ）的干部，他“警惕地”侦察着“社会民主主义”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痕迹；兄弟也许曾在统一社会党发誓，也许担任党的书记并表明完全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连襟那里得知，他和国家秘密警察有着某种联系。因此，如果老社会民主党人聪明一点的话，那么，他即使是在朋友和家庭范围内也不再表达其在魏玛时代的政治信仰，至少是要非常小心地去表达。这一切听起来也许是阴森森的：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传统的传承来说，纳粹党时期的情况比德国统一社会党时期要好得多——这绝不仅仅和东德的长期存在有关。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国家里,不同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元素和表达方式也很难取得抵抗的成果,因为它们往往——诸如红旗或同志崇拜——同样也是统一社会党的自身形象。忠诚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简单地用他从前所属政党的老的、标明自身特征的象征符号与他所憎恨的统治者划清界限,因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最终也追溯到同样的象征符号,并且因此与社会民主党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共同语言。老社会民主党的文化习惯和统一社会党的太相似了,以至于不能作为替代发展方向的起点并在红色独裁条件下继续存在。

不过,数量可观的前社民党的支持者反正也没有想要拒绝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虽然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呵护这些历史性的象征符号,并对忠于制度的联盟政党感到愤怒,但这也并不完全正确。自从40年代后期起,资产阶级政党的多数成员使自己在联盟中逐步适应了;1946年之后,大部分老社会民主党人在统一社会党内也是这么做的。即使是反对统一社会党向共产党的干部党转变,也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民主党的阵线。当然,老社会民主党的几个人组成了秘密讨论小组,和西德社民党的东部办公室保持联系,他们为此要冒着被捕、流放或者是死亡的威胁。但他们的人数不是特别多,更多的人则肯定是过着"心灵流亡"的生活。

很大一部分人也安于现状,即利用社会升迁的机会,这是在苏占区和前东德给工人提供的历史上唯一的方式。在几个月之内,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专业工人中,就有人成了车间主任、教师、检察官、法官、部门领导、工程师和党的书记。始终作为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干部主体来源的这一社会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快速的社会升迁所瓦解。这种职业解放使许多前社会民主党人融入东德社会;他们绝大部分不处于党和国家的高层,可能也不是特别热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们却属于这个制度。

1989年,当社会民主党在东德再度建立的时候,已经不存在它可以续接的传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前在德国中部工业区建立起来的强大基础不复存在了:包括自由工会组织起来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人民之家和工人联合会、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教育设施。因此,不是回到1946年,甚至是1932年。社民党在东部必须是一个新党,它不能在工人环境中重建。这样,从前一直尖锐批评教会的社会民主党在教士住宅重

新出现了。教士住宅成了社民党在维斯马[①]和松纳贝格之间、齐陶[②]和爱森纳赫之间的地区历史性新开端的象征。

① 维斯马: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城市。
② 齐陶:德国萨克森城市。

阿登纳共和国：
“再度靠边站”

在西部，众所周知，历史选择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进程。在这里，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以同样的程度植根于环境之中，党的最高层领导绝对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在战后的最初几周内，虽然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有时一起在所谓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但他们在那里主要是解决废墟城市中的众多日常问题。此外，社会民主党人在西部与共产党的占领国无关：他们既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诱惑，也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压力。在后来联邦共和国的地区，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政党没有成为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在这里，环境和传统未能使社会民主党人走向灾难，但反思旧的准则，考虑新的发展，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挺进，并由此赢得更多的选民阶层——这一切对于他们还是很困难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传统往往能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们，但在新社会的多机遇时期却成为负担。当然，社会民主党人在1945年春天根本不可能全新开始。他们必须动用战前的结构、旧的干部群体和从前的党员。因为在12年的纳粹独裁统治之后，在人员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对于这样一种新开始，深受纳粹主义影响的一代青年人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根本没有这个意愿。在1945年之后，他们对任何政治都怀疑，很难争取他们投身于政党活动。

与此相反，魏玛一代则在1945年5月就立刻到位。他们以其1933年1月停止的地方为起点。在战后几天之内，老社会民主党的出纳员就开始再度敲开党内老同志的家门，收集党费并在浅红色的党证上加盖一个印章，党证上还可以看到1925年《海德堡纲领》的文字。时间仿佛静止

了。社会民主党人取出藏起来的红旗,在居住地的地方支部和老同志聚会,动情地唱起熟悉的歌曲。和以往一样,最主要的是组织问题。几个月之后,组织机构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党的结构重新恢复并且精确地统计了党员人数:1946 年末,社会民主党在西部德国地区共有 70 万名党员,比这一地区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时的人数增加了将近 1/5。在党的重建过程中,经受了组织考验的 20 年代的那些干部担任了所有级别的领导职务。在党的理事会——最初是在汉诺威,然后是在波恩——任职的也是 20 年前在魏玛时期的社民党中央、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积累了他们最重要的政治经验的那些人:党的司库阿尔弗雷德·诺伊、妇女事务负责人赫塔·戈特黑尔夫、新闻发言人弗里茨·海涅,以及党的副主席埃里希·奥伦豪尔。

因此,当社会民主党人在 1945 年重新开展政治活动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新开始。但不久之后,人们在他们中间还是看到了几张新面孔,包括从经历到外表和举止都根本不太适合无产阶级传统队伍的党员。他们在联邦德国的社民党内异常迅速地找到位置,得到重要的职务并开始了引人注目的职业生涯。这里需要提到卡尔洛·施密德,阿道夫·阿恩特,当然还有卡尔·席勒。赫伯特·魏纳——他同样也不是在改良主义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而是作为暴露的共产党干部,在经历了许多歧途之后才找到社民党的——不久就在党的等级制度中晋升上来。最后,许多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往往是义愤填膺地与社民党划清界限——在 1945 年之后归党,其中就包括维利·勃兰特、维利·艾希勒和瓦尔德马·冯·克内林根。

[**原书第 124 页图片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还是倾向于卡尔·马克思的。然而,随着 1959 年向《哥德斯堡纲领》的转折,他们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似乎只是"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文主义和古典哲学"。人们成功地驱散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直到 60 年代后期,青年团反叛者重新发现了它——虽然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新中间阶层已经在此等候着了。

因此,在社民党内不仅有旧机构的干部,而且有其最激烈的批评者,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末期曾激烈而徒劳地反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想象力贫乏与僵化。1945 年之后,他们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继续推行其政策;他们希望把社民党从组织迟钝的状况中拉出来,促使它进入政治活动,进入坚决夺取政权的斗争。党内这一派别的时机虽然直到很晚才到来,但他们的存在仍然表明,在魏玛传统队伍的恢复阶段,已经酝酿着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趋势。

[**原书第 127 页图片说明**] 魏玛时期的老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在 1948 年杜塞尔多夫的社民党代表大会上。从左至右分别是:奥托·布劳恩、卡尔·泽韦林、威廉·佐尔曼(1881 ~ 1951 年)和保罗·勒贝(1875 ~ 1967 年)。他们在这里不再特别受欢迎,库尔特·舒马赫把他们主要看做是社会民主党失败和落魄的代表人物。

不过,直到 1957 年,老社民党仍以其习惯性的反映占据着主导地位,在遭到挫折之后生闷气,接着更加自认为是比较好的人的政党,并同社会的其余部分进行争吵。在 1949 年第一次德意志联邦议会选举之后,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发生了。社民党在选举中的失败绝不是毁灭性的——拥有 29.2% 的得票率,他们取得了和 1928 年差不多的结果,那是一个对于该党来说特别好的年份。基民盟只比他们高出 1.8 个百分点,这肯定还不是一个长期的、无可争议的基民盟国家的托管地。但社会民主党人却表现得十分失望。他们根本没有尝试参与随后的联盟谈判,而是抱怨无知的选民,特别是众多没有投票给社民党的那些工人;他们的行为因此而违背了其“最切身的社会利益”,社民党理事会在 50 年代早期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解释的。社会民主党人退却了,宿命论地等待着艾哈德市场经济大危机的到来。

[**原书第 126 页图片说明**] 自行车、剪裁合适的纸板、绳子和字母“S”、“P”、“D”,这一切对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后几年里的选战就足够了。人们没有预料到舆论导向了媒体顾问、营销公司、

政治顾问、事件和负面的竞选活动。这对党员、积极分子和干部们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都是重要的，有自己的任务和——显而易见的——巨大乐趣。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原书第 129 页图片说明**]库尔特·舒马赫(1895～1952年)在法兰克福大教堂。舒马赫领导了反抗纳粹党的抵抗运动；他始终没有从所遭受的虐待中康复过来。战后，他从自己的苦难经历中为自己及其政党得出道德领导的要求。他令许多人兴奋不已；而他攻击性的演讲及其经常是独断的行为又使同样多的人感到害怕。

总而言之，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态度证明了他们对现实的高度拒绝。1948 年之后，德国历史上空前的经济繁荣开始了。经济增长率连年平均都达到 9%，实际工资在以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方式增长，工人的境况也日益改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承认这一切，他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国家里。经济奇迹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所谓的”；他们看到的是穷人日益陷入极度贫困之中，认为即将到来的灾难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直到 1952 年，他们仍锲而不舍地要求关键工业的社会化。1953 年，即在第二次联邦选举那一年，他们的新闻宣传上升为一种恐怖的歇斯底里。如果某个人只从社民党的报纸获取信息的话，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反革命的国家政权针对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场新的迫害浪潮和恐怖浪潮已经迫在眉睫了。1953 年 3 月，社民党宣传主管弗里茨·海涅在一篇报刊文章中甚至竟敢断言，如果基民盟在下一次选举中再次赢得胜利，并继续执政 4 年的话，“消灭并根除”自由的工人运动就是可以预见的。

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再一次自己把自己从现实政治中分离出去并与社会隔绝了。这种做法并未使德国社民党更具吸引力。在 1948～1954 年之间，该党丧失了 30 多万名党员，留在党内的其余党员则面临着老龄化的威胁：根据统计调查，在社民党党员当中，当时只有 3% 的人年龄在 25 岁以下，只有 1/3 的人不超过 45 岁。社会民主党人缺乏活力、想象力以及对政治的兴趣；在联邦政治层面上，他们的政党孤单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同行者。

对于社民党的又一次政治孤立,库尔特·舒马赫尤其要负责任。他在战后立即提出了自己的领导要求,决定性地推进了党的重组;1946 年 5 月,他正式当选为党的主席。在拉萨尔之后,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鲜明地、近乎粗暴地主导着工人运动并确定政策。在纳粹主义结束前夕,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一点,即偏偏是舒马赫在独裁统治结束之后取得了这样的领导角色。当时,他还仅仅属于党的第二,甚至是第三梯队。他是社民党在斯图加特的地方报纸《施瓦尔本早报》的编辑,也就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外省——几乎不是一个合适的、通向出色领导人的跳板。

和拉萨尔一样,舒马赫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天才的作家和迷人的演讲家。他和特奥多尔·豪巴赫、卡洛·米伦多夫都属于 1895 年左右出生的社会民主党的学者小群体。他们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前线的经历的影响,因而发展了另一种不同于威廉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理念。舒马赫那一代人不是论证经济决定论,而是行动主义、军事主义和非常权威主义的。20 世纪 20 年代时,他们在社民党内还没有得到行动起来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没有跻身于最高领导层。直到 30 年代早期,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当中的几个人才进入帝国议会,在那里,他们大多必须坐在后排耐心等待。舒马赫也是其中之一,他在议会全体大会上只发表过一次讲话,但这次讲话却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他在对戈培尔的一次回答中完全蔑视地谴责纳粹的政治宣传是"对人们内心卑劣想法的不断呼吁"。

除此之外,舒马赫在帝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不是特别引人注意。然而在 1945 年之后的 7 年里,他成为无可争辩的、令许多党员近乎狂热崇拜的社民党领袖。如何解释这一切呢?首先就是轮到他那一代人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柏林党中央和帝国议会的老领导,如奥托·韦尔斯、汉斯·福格尔和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等人大部分都不在世了。其他的人,如卡尔·泽韦林,则没有威信了,因为他们在 1932 ~ 1933 年没有坚决同政治右翼势力作斗争。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青年组织的后备领导力量在 1945 年时还太年轻。因此,只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前线战士那一代人。从魏玛时代的角度来观察,这一代人当中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如特奥多尔·豪巴赫、卡洛·米伦多夫,显然超过了库尔特·舒马赫:他们在 1933 年之前已经具有引人注目的、良好的跨地区联系,在党内是著名的,比在纳粹时代之前还放荡不羁的舒马赫更具有吸引力。但是,米伦多夫于 1943 年在一次轰炸

中丧生,豪巴赫于1945年1月被纳粹党人处决了。

[**原书第131页图片说明**]1946年秋,在柏林新克尔恩区举行的有库尔特·舒马赫参加的一次集会。活动人满为患,几千人无法入场。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几个崇拜者还是做到了,通过房顶的一个洞来聆听他的讲话。

不过,舒马赫在战后完全不再是第二人选了。从一开始,他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拥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者。他的魅力来源于苦难。在纳粹统治时期,他有将近10年之久是在监狱和集中营中受难。那一时期的全部殉难给他留下了印记:他的身体看起来只剩下皮包骨;当他讲话的时候,他的面部肌肉在抽搐;1948年,他必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已经失去了一只胳膊——截去一条腿。以其残缺的身体和充满力量的讲话,可以说舒马赫象征着社会民主党的不因恐怖和迫害而屈服的使命感。尽管遭受了所有的痛苦和侮辱,但他在1933~1945年之间却并未屈服。因而,他现在提出要求,不仅要领导社民党,而且要领导整个民族。社民党党员通过无条件地把自己与这一光辉形象视为一体,他们自己仿佛也成为更好的人,成为不屈不挠的抵抗战士,成为抵抗黑暗政权的光明承载者。因此,首先是纳粹时期一直没有遭受打扰和没有接受调查的那些人不会反对他。

[**原书第133页图片说明**]汉堡市长马克斯·布劳尔(1887~1973年)和不来梅市长威廉·凯森(1887~1979年)在谈话。这两个人都在执政,因此,他们必须务实地处理事务并顾及联盟伙伴,反对派的抵抗令他们难以承受。这使他们不断地同社会民主党中央,主要是同库尔特·舒马赫,当然也和埃里希·奥伦豪尔及其联邦议会党团发生冲突。布劳尔、凯森和恩斯特·罗伊特、格奥尔格·奥古斯特·齐恩、欣里希·威廉·考普夫以及维利·勃兰特等人是社民党在波恩共和国早期不仅仅满足于反对派的角色,而且在各州层面上全面有力地推行执政政策的榜样。

现在的情况是,在1945年之后,由一个独具魅力的人担任领袖对社会民主党人很可能是有利的。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该党最后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即:在领导层的官僚太多,而有影响力、有辩论热情的人太少。舒马赫早就指出了这一缺陷。他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政治宿命论者,也不是正统的组织崇拜者。他不想恢复魏玛时代的社会民主党,而是要建立一个真正崭新的、活跃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应该大大超越旧的环境并发展成为一个人民党。他也清楚,中间阶层对社会民主党人是多么重要,他对被奉为圭臬世界观的最终理由不以为然,鼓励十分顽固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和新修正主义者写出对党内改革的建议。与奥托·韦尔斯和赫尔曼·米勒——该党在魏玛时期的两个更正直的领导人——完全不同,舒马赫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在讨论中,他通过严厉的讥诮和苛刻的讽刺来训诫对手:他是魏玛时代社民党所缺少的丹东式的人物。他关心令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感到害怕的权力。

但这已经是全部的权力。舒马赫只看到这些。他以毫不妥协的态度操纵着社民党,使其在联邦德国几乎完全越位了。他不仅在这一点上像倍倍尔,后者也总是想要所有的东西——全部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改良主义的蝇头小利——,但最后所得甚少。他们两人都是具有独特魅力的领袖和伟大的演讲家,都喜欢黑白分明,彻底分清好和坏:这里是民主的工人运动,那里是教士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这样,他们就激怒了中间阶层,而后者至少是舒马赫本来想争取的。没有加入社民党的人更多地是被他们过分的热情所吓退,并希望摆脱这种令人紧张的热情。这样,舒马赫甚至还超过了倍倍尔:他用尖叫的声音鼓动听众。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的流亡者,如维利·勃兰特,在1933年之后已经了解了抑制和容忍的政治文化,在1945年之后也很难接受他讲话时的这种音调、军人的措辞和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舒马赫错过了时代的旋律,而他的对手康纳德·阿登纳则目标明确地找到了这种旋律,他令人尊敬地给疲惫的德国人减负,让他们回归家庭,不问政治。而与此同时,舒马赫却想动员筋疲力尽的人民再次开展政治斗争。阿登纳使多数人满意,于是,这些人就投他的票;而舒马赫和社民党此时则日益固执地、不明智而顽固地坚持少数派立场。

只有少数的社会民主党人敢于阻拦舒马赫，并劝告他进行政治调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议员维尔纳·雅克比，于1949年联邦议会选举之后在他的党主席那里尖刻地抱怨道："亲爱的库尔特，除了我之外，大概还有几个同志认为，你在选战中的讲话使我们损失了至少15个议席。"这些批评没有对舒马赫产生影响。他对此的反应——正好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只是表现得更加暴躁和独断。有这样的说法，政治人物都会有一种命运。舒马赫也许必须承受一种太过沉重的命运，它使他强硬，特别是不可变通，因此，他领导社民党在联邦政策上完全走进死胡同，违背了自己关于党的革新的要求。社民党周围没有联盟伙伴。舒马赫基本上把所有的道岔都搬错了。

[**原书第134页图片说明**]埃里希·奥伦豪尔(1901～1963年)在社民党1959年的哥德斯堡代表大会上。奥伦豪尔的讲话是不吸引人的，他缺少舒马赫的热情。但社会民主党的战士们却信任"埃里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和奥伦豪尔一样，在魏玛时期曾穿着社会主义劳动青年的蓝色上衣。奥伦豪尔的政治功绩在于，当改革者在社民党内占了上风时，他将传统主义者留在了队伍里。

1952年舒马赫去世之后，埃里希·奥伦豪尔作为继任者担任党的主席。如果说舒马赫与奥古斯特·倍倍尔相似的话，那么，埃里希·奥伦豪尔则令人联想到奥托·韦尔斯。党的书记的类型再次取代了人民护民官的类型。但社民党并未因此与战后第一任主席的灾难性的政治遗产分开，因为奥伦豪尔始终把自己看做是舒马赫忠诚的助手，并从组织上实施舒马赫的政治计划。当然，可以想象的是，他们两人的性格不同：奥伦豪尔以其调解的、和缓的方式重新填平了暴躁的舒马赫以其雄辩的极端化挖开的壕沟；奥伦豪尔是一个伟大的协调者，包括在他自己的党内。

然而，他在政治上是舒马赫的追随者。他没有走自己的路，而且避免对其前任路线的任何偏离。奥伦豪尔崇拜舒马赫，舒马赫拥有他所缺少的一切：热情、使命感和激情。奥伦豪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领袖，而仅仅是党的最高层干部。党、党的组织及其基本纲领——这就是他的世

界。他在其中成长,他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个世界。奥伦豪尔代表着经典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价值,在他的领导下,50 年代初期,社民党比上一次的魏玛时代更少是联邦德国的。

奥伦豪尔,成长于社会民主党的堡垒马格德堡市的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家庭中,其职业生涯始于在地方党报《人民之声》作实习生。20 岁时,他搬到柏林,并作为特别勤奋的青年干部得到了社会主义劳动青年中央理事会专职编辑的职位。之后的 1928 年,他晋升为社民党后备力量联合会的全国主席。在那里,他以出色的组织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在奥托·韦尔斯周围,人们注意到他,因为他总是忠诚地支持党在当时的路线,不为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团内部的反对派倾向留下太多的空间。对于奥伦豪尔来说,正是这一点是极有特色的:他没有任何极端流派的思想,没有政治激情,也没有乌托邦式的向往。他同 20 年代早期广泛流传的感动青年人的浪漫主义,同 30 年代早期在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蔓延的军事化的阶级斗争口号都保持着同样的远距离。他坚持可靠的传统和经过数十年考验的工人运动的结构,及其有约束力的世界观和高效的组织、党的可靠的干部和有纪律的党员。

在这个世界上,奥伦豪尔——没有伟大的或者是热切的功名愿望——一步一步地到达上层。10 年多来,他完全理所当然地担任着这一传统组织的主席,虽然他在社民党之外几乎不能发挥作用。他在 50 年代的领导地位是基于组织的内在力量。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党的结构、精神、程序和教义,尤其是他的确比任何人都更熟悉党的干部。自从担任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团的领导以来,他在培训班、在全国大会、地区会议、在帐篷营以及全国青年会议上和干部们接触并成为一生的朋友。

50 年代的社民党书记们和他们的党主席有着共同的身世和同样的心态。党的书记们赞叹、尊敬,但也害怕舒马赫。在奥伦豪尔时代,党的中层干部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那种距离不复存在了,社会民主党的干部们和党的主席重新处在一个平面上。这就保证了奥伦豪尔——尽管存在诸多嘲笑,在公众中关于他缺乏影响力的嘲笑声很大——直到去世都担任着社民党的主席。

[**原书第 136 页图片说明**]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被证明

是基民盟历史上最强的黏合剂：只有通过这些内容，基民盟才能够在50年代成为资产阶级阶层和宗教阶层的聚集党。阿登纳为了保证其最初绝非无可争议的德国政策获得多数支持，有目的地利用了西德资产阶级对“红色危险”的恐惧。两极分化是这位第一任联邦总理的一个关键的领导技巧，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反对这一点。只要反社会主义在社会里还有共鸣，社民党在政治上就一直处于防御地位。

同时，组织的基层和组织的领导层之间的这种接近妨碍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要进行政治领导，就必须能够事先感知并把握住发展的趋势，必须带领自己的政党并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奥伦豪尔不具备这一点，他希望在其具有独特魅力的前任去世之后继续保持党的团结并忠诚地掌管前任的遗产。因此，在自己的环境之外，社民党是静止的。与此同时，阿登纳在50年代把他的联盟党从天主教环境党转变成资产阶级阵营的聚集党，把社会民主党越来越远地甩在后面。这就切实要求社会民主党人敢于从自己的立场走出来，也向新的社会、文化领域挺进。他们必须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最终抛弃魏玛共和国，以便进入新的联邦共和国。然而，奥伦豪尔不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他的行为更像是社会主义人民教育事业中的一个才能平平的讲师。简而言之，奥伦豪尔是个不利索的人。此外，他缺乏攻击的兴趣，缺乏不假思索地追赶、讥讽、告发和毁谤政治对手的能力。因此，阿登纳在这一点上已经毫无顾忌地远远胜过了他。奥伦豪尔不相信，德国人民在等他。毫无疑问，他也是对的。但基于同样的理由，作为政治领袖，他只是平平常常的，他使社民党在50年代中期静止了，没有从30%的政党的窠臼里走出来。

[**原书第139页图片说明**]库尔特·舒马赫和“办事处”领薪的党的理事会成员：埃贡·弗兰克(1913～1995年)，负责组织工作；埃里希·奥伦豪尔(1901～1963年)，副主席；弗里茨·海涅(1904年生)，新闻和宣传主管；阿尔弗雷德·瑙(1906～1983年)，财务和管理部门领导人(从左至右)。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党就是他们的生命。

在奥伦豪尔领导的年代,社民党过于关注自己内部的事务,而不开展政治活动。夸张一点地说,它在这个时期太多地把党组织当做目标本身,太少地是选民协会。在其顶层是行政事务理事会,即当时所称的“办事处”,除了党的主席和副主席拥有国会议员席位之外,这个理事会的成员只是为党的组织利益服务的。他们集中全力于党内生活,时刻与自己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保持联系,日益忘记了波恩“棚屋”[①]的狭小空间之外的选民。“办事处”强硬地要求拥有党内的最高地位,对联邦议会党团也是如此,要求议会党团必须服从党的理事会的命令。作为总理选举协会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此时的竞争则主要是面向居民手中的选票,并在一次次的选举中扩大了同社会民主党的差距。1953 年,联盟党取得了绝对多数的议会席位,1957 年也同样如此,而同期的社民党却无论如何也没有超过 30% 的界限。

从这些失败中还是产生了社会民主党革新的动力,这些失败至少推动了关于党的战略的激烈讨论。在 1953 年联邦议会选举之后,这场讨论随即开始了。社会民主党失去了 0.4% 的选票,联盟党则庆祝其得票率 14.2% 的大幅度提升——此后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过类似的得票率升幅。在这样一次失败之后,社民党不能仅仅耸耸肩膀就回到日常工作中,并继续淡泊地相信社会主义的进步。显然有什么东西错了,必须就此开展讨论。

[**原书第 141 页图片说明**]从 1947 ~ 1953 年期间,担任柏林市长的恩斯特·罗伊特(1889 ~ 1953 年)和库尔特·舒马赫互不喜欢对方。舒马赫轻蔑地称罗伊特是“柏林的行政长官”。罗伊特比舒马赫更加“西方化”,他必须这样,因为柏林的非共产主义部分依赖于西方势力的保护。罗伊特的一生丰富多彩。年轻时,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魏玛共和国末期时,他是社会民

① 20 世纪 50 年代初,社民党总部搬入波恩的一处外表看来类似于棚屋的临时建筑。因此,人们常常以“棚屋”来指代社民党中央总部。1975 年,这个临时建筑被拆除并重建,但人们依然使用“棚屋”一词来称呼社民党中央总部。1999 年,社民党中央迁往柏林的维利·勃兰特大厦。此后,“棚屋”陆续被其他企业和机构占用——译者注。

主党当时少数几个在大城市——马格德堡——执政的市长之一。纳粹党人将他送进了集中营。1935 年,他逃往土耳其并在那里担任地方政治学教授。1946 年,他重返德国,回到柏林。

这样,社会民主党地方层面的——特别是那些来自汉萨城市和柏林的——政治家请求发言了,例如,在不来梅执政的市长威廉·凯森,尤其是恩斯特·罗伊特。自 1945 年以来,地方层面的政治家承担着实际的责任,日复一日地被迫达成妥协,他们常常处于艰难的联盟之中。在舒马赫领导下的那种绝对的原教旨主义和僵硬的反对派路线令他们感到很困难。此外,罗伊特和舒马赫互相不喜欢对方。不过,在奥伦豪尔的极度传统主义路线下,罗伊特也很难做得太多。他希望从传统队伍的"窠臼"里走出来,希望引导新的选民阶层和党员阶层进入社民党,使党距离政权更近一些。

几个资产阶级出身的新社会民主党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说,工人运动从来不曾是家园,从来不曾是最终的生活意义。因此,社会主义文化的许多内容对于他们是陌生的,多余的,就像是不合时宜的民间创作。他们感觉到那些老的、经过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工人运动象征符号更像是与世隔绝的符号,并和不是从一开始就属于它的人们保持着距离。这些新党员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经验得知德国资产阶级在"同志"的称呼面前感到恐惧,并且害怕战争的红旗和好战的阶级斗争歌曲。对于社民党内受过大学教育的资产者来说,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包袱。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想要胜利的话,就必须扔掉这一切。

[**原书第 143 页图片说明**]1957 年,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和他的经典著作《大众福利》①。基民盟在当时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取得的巨大胜利还要感谢"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的盛名。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没有多少可以与之对抗的:社会化、控制

① 原文"Wohlstand für Alle",意为"共同富裕"、"全民富裕"。本书中文版也被译作《来自竞争的繁荣》——译者注。

和计划——所有这一切早就没有《大众福利》的表达形式所拥有的魔法和魅力。

在1953年的社会民主党中,牧师海因里希·阿尔贝茨和卡洛·施密德教授最强烈地主张这一新的路线。但是,他们未能获得成功。一个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政党不能仅仅经过一次打击就摆脱重要的传统。这样的一个过程要持续数年。因为对于阿尔贝茨和施密德来说,传统只是多愁善感的言辞,而对于多数党员——至少是积极分子——来说则是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内容。弗里茨·海涅,这个波恩“办事处”里最受改革者攻击的人,根本不理解对“窠臼”负面的背后议论。对于他来说,社会民主党人在50年代所处的“30%窠臼”绝对不是监狱,而更多地是“敌对环境中的一个坚强堡垒的象征”。海涅的好朋友埃里希·奥伦豪尔的想法与此类似。他也不希望和党的传统表现方式断然决裂。1953年11月,他在一次纪念活动中解释说:“一个没有红旗这一象征符号的社会民主党将是一个没有心脏的政党。没有了歌谣和战斗歌曲——90年来,它们已经长入我们的心中,也许、但愿明天能得到新的和及时的补充;没有了同志般的‘你’;没有了有联系的、约束性的‘同志’的称呼,这样的一个政党就是没有血液的政党。”

社民党内的象征符号之争延续了半年之久。然后,改革者放弃了。在1953年,社民党还没有准备好和自己的过去决裂,为此,党在议会不得不经历更大的痛苦。1957年,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了:联盟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这是德国议会选举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结果,比甩在后面的社会民主党多了将近20个百分点。社民党的这次失败是如此的明显而令人沮丧,不仅仅是几个我行我素的人和配角,而是整个党,包括最后一名传统主义者都震惊了。

[**原书第144页图片说明**]1957年联邦议会选举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书记埃里希·奥伦豪尔悲伤地注视着来自不同选区的数据。对手,即阿登纳的联盟党取得了巨大胜利,成为德国议会历史上第一个赢得绝对多数的政党。社民党只获得了令人沮丧的31.8%的得票率,比基督教民主党人少了将近20个百分

点。然而，这并没有使奥伦豪尔下台，最迟从80年代开始可能就要这样了。社会民主党人知道，奥伦豪尔没有"成功"，他办事太天真、太正直。但是忠诚和团结——也是一种对"资产阶级"新闻评论的倔犟的抵抗——在社民党内当时还是重要的。因此，他直到去世都担任着党的领导。

当社民党几十年来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在50年代后半期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个失败就更加令人痛苦了。从前，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失败之后还能退回到其环境的防御工事里去，在社会主义未来信仰的礼拜仪式中寻求安慰。然而1957年时，从康斯坦茨到基尔，完好的工人业余活动团体和文化团体的系统都不复存在了，这一系统本来能够为社会民主党人提供一个替代的生活共同体、一种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德国西部，这一组织制度从来没有发展到像在没落的德意志帝国从前的中部工业区那样强大。在纳粹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没有进入到以他们的经历更可能是难以理解的无产阶级的特殊文化；而且，库尔特·舒马赫在1945年之后也认为这种自有文化是多余的，因为他断言，社会主义在德国将来是占优势的社会模式，而不是边缘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社民党在50年代其实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环境政党了，而只是一个执著于环境心态的政党。

作为全面的对立文化的旧环境是以社会民党不屈不挠的必胜信念、以理想主义及其积极分子的使命感为基础的。不过，从20年代早期到50年代后期不得不经历的无数失败却明显破坏了这个仿佛是宗教般的环境的核心：在50年代，没有人仍旧真诚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的，甚至是自然的胜利。因此，在对社民党来说是如此黑暗的岁月里，对环境社会主义的回忆事实上只是情感的、固执的、留恋的回望。在经历了1957年惨痛的联邦议会选举结果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最终成为一个政治性的政党并赢得选举胜利，因为它已经不可能再度成为生活共同体和文化运动了。

过渡时期：
告别传统队伍

在1957年的灾难性选举失败之后，改革者坚决反对波恩党的理事会的老魏玛传统队伍，并取得了优势。新人团体自1953年以来显著扩大了，成为党内的一个权力因子。当时，许多市长和几个州长属于这一团体，当联邦层面的社民党停滞不前时，他们在选举中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众多联邦议员也厌烦了始终被波恩“棚屋”的党的官僚所控制，并且总是被定为反对派角色——他们渴望获得政权。此外，还有1957年转入社民党的面向全德国的新教徒，后来的社会民主党的两位联邦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和约翰纳斯·劳就来自于他们当中。改革者的核心团体依然由来自从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团的反叛者所组成。他们此时已经晋升到党的统治集团中了，但却仍然没有丢掉自己的目标：粉碎社会民主党的观望态度。

这个在政治上和经历上都异于同类的群体的第一个胜利是在1957年秋对议会党团的领导层的新的占领。埃里希·奥伦豪尔的身边现在有了3名议会党团副主席：卡洛·施密德、弗里茨·埃尔勒和赫伯特·魏纳。他们都致力于使党摆脱为传统所累的僵化状态。从现在起的几年中，前共产党人魏纳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有力人物，许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党的真正舵手和领导气质。几近气馁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魏纳身上发现了他们在埃里希·奥伦豪尔身上那么痛苦地怀念的一切：活力、精明、雄辩力和钢铁般的权力意志。

[**原书第149页图片说明**]195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新闻主

管弗里茨·海涅在他波恩"棚屋"的办公室里。自1953年以来，他是社民党内改革者的靶子。改革者把他看做与时代不符的党的机构里的人，一个缺乏幻想、不合时宜的宣传部门的人，一个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58年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海涅——1940年他在马赛帮助数百人逃离纳粹党人——退出了党的理事会。这成为社会民主党转折的标志。

改革者在1958年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成功地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面对党的主席埃里希·奥伦豪尔和强硬的司库阿尔弗雷德·瑙的激烈抵抗，多数代表还是废除了党的执行理事会中的机构。这就意味着不受欢迎的"办事处"的终结；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一个长久的传统束缚因而被彻底剪断了。现在，政治影响力从党中央转移到了联邦议会党团。替代旧的执行理事会的是一个新的由11个人组成的主席团——主要由著名的联邦议员组成，并成为社民党的领导中心。这不仅仅是和党的组织特权的告别，而且也是和长期影响德国的专制国家的传统——剥夺人民代表及其党团的行为能力——的告别，这一传统起源于俾斯麦的立宪主义。

然而，改革者如果没有得到媒体的大力支持的话，也不会这么轻易就获得成功。媒体社会对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文化的胜利不是在1998年3月电视和报纸的宠儿格哈德·施罗德作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闪亮登场时才开始。50年代后期，媒体就已经，虽然还不那么明显，开始对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了。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一段历史结束了；社会民主党的自信和工作能力的核心部分：自治组织的权力和意志形成的能力，丢失了。不依赖于社会的其余部分，这个党总是承受着光荣和苦难；它是自由的、不顺从的，但同时在政治上是孤立的。所以，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在环境时代结束、媒体时代开始时丧失自治，除了若干好的方面之外，也存在许多有问题的方面。

在一些报纸上，连续几个月每天都能读到，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灾难，仅存"机构"，即："党中央"的波恩"官僚"和"社民党公务员"是有责任的。社会民主党新闻主管弗里茨·海涅被指责为坏蛋；海涅是倔犟、僵化的干部的化身。几年前，这类文章几乎还不能触动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不

被大部分党员所注意。然而,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现在起,即使是"资产阶级新闻"的评论对社民党来说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新闻业在50年代出现了报业大倒闭。社民党自己的信息机构的垮台也进一步削弱了社民党的自治。

[**原书第151页图片说明**]维利·勃兰特和他的偶像约翰·肯尼迪。在60年代早期,勃兰特试图模仿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的方式。一开始还不错,但随后却日益成为嘲笑和挖苦的对象。勃兰特必须首先放弃已经习惯了的肯尼迪的姿势,以展示自己的风采。

社会民主党由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迄今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为他们的组织、干部和领薪者而自豪。在这一方面,他们最终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政党,超过了整个资产阶级的绅士朋党,后者是没有结构和纪律的。但是,他们如此长时间所珍视的东西现在却有了一种怪异的味道:拿干部和党的官僚寻开心突然成为合乎礼貌的了,而他们则被描述成为乏味、沉闷和无聊的,被嘲笑为过去世界的代表。干部体制也令社会民主党人感到痛苦。谁想在政治上升迁到非常高的地位,必须现在就从干部和群体的平均水平中脱颖而出,必须努力为此减少一些空虚和庸俗,要更加现代、更加丰富多彩和更加有趣。这一切也在1958年就开始了,在1959~1960年更加强化了,当党的新领头人争取成为联邦总理候选人的时候,就已经适应了媒体世界。

通过埃里希·奥伦豪尔,人们在各式各样的报道中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得到什么的。他举止拘谨、刻板、正直而天真。社民党内甚至这么说,他是"很难卖出去的"。到那时为止,这个标准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从来不曾发挥作用,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社会民主党的伯乐们四处寻找候选人,其形象要年轻、有活力且富有现代感,要有良好的电视形象并"适合于拍电视",正如人们现在所说的。这样,他们看中了维利·勃兰特,正在执政的年轻的柏林市市长。他绝对不被社民党的大多数积极分子所欢迎,这些人不喜欢勃兰特,认为他是纨绔子弟,是轻浮的人。此外,他还缺

乏真正的好名声，不是兢兢业业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54年和1956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这些人无动于衷地令他落选党的理事会。但这并没有干扰社民党内冷静的权力战略家们，最主要的是赫伯特·魏纳。虽然魏纳对勃兰特的政治素质也评价不高，但却希望能够更轻松地控制他。此外，社会民主党人只有让勃兰特作总理候选人才有可能获得一次机会：社民党没有哪个政治家在电视里——这一点变得日益重要——能像他那样驾轻就熟。此外，施普林格出版社特别偏爱他，把他打造成为德国的肯尼迪。勃兰特感激地认可了这个角色，他不断地尝试去模仿那位年轻的美国总统。

维利·勃兰特是德国的第一位媒体总理候选人。他向媒体开放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允许拍摄他的孩子，当然还有他漂亮的夫人以及他在浴室刮胡子的照片。工人运动的老干部们对这些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事情感到愤怒。对于他们来说，勃兰特总体上太右了，太亲美了，太支持与可恶的资产阶级组成大联盟了。但作为党的好战士，他们服从了党的纪律，不情愿地接受了勃兰特和魏纳的新战略——如同他们1959年必须接受《哥德斯堡纲领》一样。

[**原书第153页图片说明**]1958年3月，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人员罢工。执政的市长的司机也停止工作了，因此，勃兰特让他的夫人露特开着自家的大众汽车送他到位于舍内贝格的市政厅。告别时的一个甜美微笑，这就给新闻界提供了一张漂亮的照片，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的读者也喜欢。反之，这在选举中也是值得的。简而言之，勃兰特无疑是一个现代的政治家。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的转变是深刻而全面的：社会民主党人改革了他们的组织结构；拥戴了一位媒体总理候选人为领袖；此外，通过“哥德斯堡”，他们在纲领上也明确了，对于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时代、大胆的社会主义要求和不妥协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时代都结束了。在这次纲领改革中，虽然不是主张组织改革的那一拨人在行动，但是，新人仍主要来自于从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哥德斯堡纲领》在“哲学”上的新定位——从

最终的、唯一的真理到以多元为基础的基本价值——基本上是维利·艾希勒推动的。艾希勒在1926年被社民党开除出党之后,直到1933年之前,一直领导着一个左翼社会主义小宗派。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新的、市场经济的表述决定性地源自海因里希·戴斯特,他是20年代新修正主义的青年社会主义党人霍夫盖斯马派[①]的领导人。这样,社民党内的青年反对派力量用了30多年的时间,直到他们——现在当然成熟了——最终取得成功。在这个意义上说,社民党从1958~1960年的转变并不是纯粹的新开始——因为始于20年代早期的发展和学习过程在这一个点上结束了。由此可以看到,改变一个拥有极其厚重历史的大党是多么艰难而缓慢。这当然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方面,这类政党在遭遇到模式变化、媒体猛烈攻击和选举失败的时候,不会立刻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另一方面,他们却只能缓慢地学习,是迟钝且又倾向于坚持旧有立场的,而不是及时改变立场并参与新事物。

[**原书第155页图片说明**]埃里希·奥伦豪尔和赫伯特·魏纳,社民党形式上的领袖和真正的领袖。1958年,党的理事会内魏玛时代的旧组织机构的权力瓦解了,奥伦豪尔因此丧失了他的基础。虽然他直到去世都担任着党的主席,但党的真正领导人现在是赫伯特·魏纳。魏纳拥有社会民主党人在温和、诚实的奥伦豪尔身上找不到的东西:强硬、权力意志和辩论的激情。

因此,1959年还需要一次有力的行动,以使《哥德斯堡纲领》通过社民党代表大会的表决。这份纲领最终与大量受人喜爱的观点决裂了,这些观点在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曾是理所当然的毕生基本信念。起初,代表们的猜疑主要是下意识的。但在宗教问题上却差点引起激烈争吵,并近乎危及到《哥德斯堡纲领》的通过。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的大部分

① 霍夫盖斯马派(Hofgeismar Kreis),是1923~1926年期间社民党内的一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团体,于1923年复活节在霍夫盖斯马成立。该流派反对马克思的国际主义,追求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社会主义。1992年图林根州的一些青年社民党党员重建了这一组织,但不为社民党所接受——译者注。

都是明确的教会反对者，往往还是自由思想者组织的公开成员。他们一直反对“僧侣”并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社会主义应该使被剥削人民的这种宗教鸦片成为多余。在波恩国家，“黑衣人”——主教、神甫、牧师——仍然是他们的对手，是可恶的康纳德·阿登纳的卫队。突然，这一切都要被改变。《哥德斯堡纲领》拟定，承认教会为伙伴，尊重其特殊提案，甚至承诺对其予以保护。对于代表中的主体而言，这就走得太远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无论如何要恼怒，因为党要放弃一个核心要求，即生产资料的国家化。作为社会主义者，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混乱和危机，他们一直是拥护这一要求的。

对于党的许多老战士来说，这是一个已经颠倒的、癫狂的世界——在波恩附近的资产阶级疗养地呈现出来。然而，他们信任奥伦豪尔。埃里希——他们这样称呼他——支持这份党纲，因此，这份纲领就一定有它的正确性。最终，他们投了赞成票，因为埃里希向他们推荐这份纲领。没有奥伦豪尔这位传统主义者的顶层人士，社民党的改革可能就会，自相矛盾地，无法顺利地进行到底。忠诚同样也属于他的传统主义。因为奥伦豪尔认识到，他周围的新人希望进行党的改革，他通过赋予反对批评者的新人以权力，抚慰那些不知所措的、常常是愤怒的老社会民主党人等方式，使一些地方甚至停止了激动，由此他也加入了改革。与此相应，奥伦豪尔在 1959～1960 年支持维利·勃兰特担任总理候选人，并且在赫伯特·魏纳 1960 年 6 月 30 日令人意外的联邦议会演讲——社民党从此适应了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之后，成功地做到了——当然也经过艰苦的努力——缓和党内的骚动。

对于《哥德斯堡纲领》的通过，奥伦豪尔的贡献甚至大于那些明确的改革者，诸如勃兰特、埃勒尔、魏纳或者赫尔穆特·施密特等人。对于改革者们来讲，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推迟或者完全取消很难预测结果的党纲辩论。与此相反，奥伦豪尔设法做到为戴斯特和埃希勒周围的纲领改革者提供必要的空间，以便于他们介绍纲领草案，并在持怀疑态度的基层党员面前为这一纲领辩护。这样，他为社民党的改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同时，又没有让社民党的传统主义部分处于对立面或被迫放弃。这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也是典型的：如果他们能够以传统为依据，那么，自己的政党和运动的改革就会在他们那里取得最好的结果。

[**原书第156页图片说明**]1959年11月13~15日,在巴特哥德斯堡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非常党代表大会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历史上伟大的纲领转折。从此,社民党也正式成为人民党了;从此,它不再坚信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而是深信基本价值和多元主义。党纲起草者们为经济领域找到了这样的格言:“只要可能就竞争——只有必要才计划!”

20世纪60年代：
“所有时期最好的基民盟”

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德国社民党的新领导层进行了彻底清理，割断了与传统的最后的联系。不应该再回想过去、回忆无能为力和凄凉的反对派岁月。整整10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整体上说都是欧洲最具传统意识的政党之一，几乎没有哪一个政党拥有如此众多的神话和传说、回忆和故事、英雄和殉道者，简而言之：拥有一段如此重要的过去，发展了一种可比较的日常文化，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替代世界。欧洲几乎没有哪一个政党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在60年代如此坚决地疏远了自己的历史，旧的社会主义要求和无产阶级的特殊文化现在成为他们的障碍了。

在柏林墙建立到大学生暴乱之间的那几年里，党的领导人坚定地追求政权。他们并没有动用《哥德斯堡纲领》，这一纲领——与普遍所认为的不同——在其通过之几周之后，在党内就不起作用了。改革者不喜欢它，对于他们来说，这份纲领还是过多地在讲基本价值、新的和更好的社会秩序，而他们关心的则是使社民党变为“切合实际”的，并发誓放弃一切“意识形态的胡话”。这至少是和1958年的组织改革相同的一次停顿。因为该党总是处于紧张之中，这些紧张关系存在于崇高的憧憬和冷静的现实之间；存在于社会主义未来社会的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之间；存在于“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社会民主党人从中汲取了他们的能量、动力，及其道德严肃性。一个将这种紧张关系搁置下来，并想立即完全转向的社民党就成为一个从自己的根源中解脱出来的社民党。

[**原书第161页图片说明**]1949～1963年的联邦总理、社会

> 民主党人强大而占优势的对手康拉德·阿登纳在选择使社民党政治上渺小的选举手段时从不拘谨。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他的告发,感到愤怒和被侮辱。也许只有像赫伯特·魏纳那样的人——具有和这位“老人”完全势均力敌的冷酷的权力本能——能够使他们不再生气,以进入“基民盟的国家”。

新的领导层尝试塑造一个对政权感兴趣,而不是对反对派的自以为是感兴趣的政党。即使是处于反对派地位,社民党也不应该仍旧是反对派,不应该仍旧不满意,而应该是乐观的和有政治家风度的。公民们将会珍视这一点,无论如何,这是社民党全体新领导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不想再给其政治对手提供发动可能胜利的反社会主义战役的出发点。因此,他们摆脱了一切旧的社会主义标志符号和纲领要点。在1964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从维利·勃兰特开始,党的主席第一次没有称代表们为“同志”,而只是直截了当地称:“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与会者,亲爱的代表们……”当时,这在社民党内已经足以引发一场文化革命了。

社会民主党人希望通过向基民盟靠近的方式,而不是强调差别并走向对抗路线的方式,来提出基民盟无权占有共和国的第一政治位置这一问题。社民党把自己表现为更好版本的基民盟,而不是根本的替代方案。他们采用了竞争对手的概念和核心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主题据为己有。他们现在支持北约、西方联盟和市场经济,他们和不久前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一样热情地宣传“人民股票”。“我们不是做得完全不同,但我们能做得更好”,这一格言使当时社民党的战略切中要害了。

6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人还经常略带嘲笑地——但也不无自豪地——称他们的党为“所有时期最好的基民盟”。最高层的社会民主党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是自1964年以来但任党主席的维利·勃兰特。他以共和国“共同性”的伟大演讲家的身份而出现,以“我们所有人都坐在同一条船上”的宣传者而出现。不应该再回忆老党了,老党忧郁地置身事外,不高兴地埋怨共和国内的社会发展,固执己见地坚持社会主义。社民党复制了基民盟——但有一点不同:他们要在新鲜、动力,尤其是现代性上明显地超越基民盟。

在那些年里,现代性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与传统队伍大告别的地地

道道的符咒。社会民主党把自己塑造成专业人员和专家的现代政党，与保守人士相反，他们将会认识和解决未来的任务。它保证将消除教育困境，加快技术进步，扶持科学后备力量，适应时代地扩建和改建基础设施。作为乐观的技术人员的党，社民党争取到了新中间阶层的选票，新中间阶层最喜欢这种态度。党的战略家不需要“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和价值目录，反而认为这是障碍和负担，并在公开场合严格避免这一切。在6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自己几乎都把这些概念忘记了。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的超载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发言人在60年代早期对自己所处地位的认识转到了另一个极端——社民党的政治丧失了其思想基础。

[**原书第163页图片说明**]在60年代，人们还没有谈到“三驾马车”，而是讲胜利合唱：弗里茨·埃勒尔、赫伯特·魏纳和维利·勃兰特。他们共同领导着社民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魏纳使党守纪律；埃勒尔指挥议会党团；勃兰特是人民的总理候选人。

社民党的转变是巨大的。党的领导层所谓的三巨头，即维利·勃兰特、弗里茨·埃勒尔和赫伯特·魏纳坚定地把该党向前推进。他们三人是有分工的。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职责、确定的管辖群体及特殊的形象。维利·勃兰特承担的角色是年轻、进步、现代和摆脱意识形态的社民党影响媒体的代表，其目标是赢得新中间阶层；雄辩的弗里茨·埃勒尔作为联邦议会党团主席则因其高超的专业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赫伯特·魏纳则最终奠定和巩固了政权战略的基础。他是党的驯兽师，他约束社民党，指挥社民党，直接把党推向新的路线。勃兰特当选为党的主席绝不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在社民党内的很多人看来，弗里茨·埃勒尔是更聪明、更勤奋和更坚定的政治家。但埃勒尔从没有一次真正的机会。最终由于电子媒体和可视媒体时代已经来临，而埃勒尔在电视里不成功，他的表现太拘谨，总是有一点自以为是，过冷的理智和冷硬的没有幽默感。埃勒尔很难受人欢迎，因而，他必须退让到勃兰特的身后。

自从1958年以来，赫伯特·魏纳无论如何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真正的、事实上的领导人。通过极其权威的手段——这显示出他作为斯大

林主义的德国共产党干部所接受的社会化和培训——和大概 20 多个无条件忠诚的党的书记的帮助,魏纳扼杀了所有反对社民党新政治道路的严重反抗。魏纳领导层冷酷、无情、有时甚至是残忍地废弃了舒马赫时代社民党的所有公理和目标,但是在 60 年代前半期的党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出现某个值得一提的反对派:魏纳的机构使党内反对派成员在准备阶段就已经不能发展了。在党代表大会上,残存的少数几个批评者的讲话被魏纳个人的喊声淹没了。他在会上狂怒,咆哮、暴跳如雷,伤害和侮辱了所有与他想法不同的人。

[**原书第 165 页图片说明**]赫伯特·魏纳,作为演讲家,人们是这样回忆他的:爱发怒的和进攻性的。魏纳的发怒既让政治对手,也让朋友们害怕。即使是最固执的记者在新闻谈话中也顺从他。然而,魏纳也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乐于助人、体谅他人,甚至是耐心的。他喜爱花卉、诗歌和音乐。魏纳经历过最坏的事情,也参与过最坏的事情。他是一个分裂的、难以相处的,肯定也是严重病态的人。

党害怕他,害怕他极深的卑劣行径;但也钦佩他,他毕竟是德国人民代表中史无前例地成功做到通过唯一一次议会讲话——1960 年 6 月 30 日他代表社民党认可阿登纳政府的西方政策的讲话——突然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局势,并把迄今为止几乎毫无希望的反对派从边缘赶出来。魏纳没有向任何人——既没有向他的党主席,也没有向他的总理候选人——事先透露一丝风声。他总是这样做: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做出决定,然后希望所有人立刻顺从地跟随他。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很少有,也许从来没有,像魏纳那样的一个人,如此粗暴和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政党推向政权。他像一个街垒战斗的鼓动家,一个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领袖。当魏纳把社民党从左翼环境政党的角落里推向波恩联盟的基民盟一侧的时候,这种阶级斗争的特征把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主义者也带动了。

魏纳激进的演讲、策略性的计谋及其对党的机构严格中央集权的统治使他成为社民党直到 60 年代中期的真正领导人。然而,由于他可疑

的、绝非无害的共产党的历史，他不能正式成为党的第一领导人。魏纳是把选民吓坏了的那种人，而选民现在对于取得政权是重要的。如果魏纳担任最高职位，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对于这一职位，魏纳的队伍选出了勃兰特，并使这位执政的市长在1960年成为总理候选人。多年来，社民党对"微笑的维利"——绝对不是少数反对者这样蔑视地称呼勃兰特——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对于社民党来说，勃兰特其实是违背了党的意志而被凑合地推举出来的。他在参加了三次冲击之后，才于1958年被选进党的理事会。即使当他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总理候选人时，在同期举行的党的理事会的选举中，代表们投给他的票也非常少，以至于他仅仅排在第21位，远远落在那些在社民党外几乎无人知晓的候选人后面。社会民主党人至少在1961年的选战中得益于这位年轻的新人，通过勃兰特，社民党被年迈的、逐渐有些僵化的康纳德·阿登纳领导的政党衬托出来。以勃兰特作为总理候选人，社会民主党人的得票率显著地上升了4.4%。基民盟则丧失了4.9%，因而，丢掉了迄今为止的绝对多数选票和议会多数席位。

[**原书第166页图片说明**]维利·勃兰特允许拍摄他和建筑工人亲如兄弟的照片。他并不喜欢这样做，他也不是同事类型的人。记者维布克·布鲁恩斯于1972年写道："勃兰特有着极其关心小人物的热心肠，但却绝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

但是，社民党及其最高候选人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对他们的新任首领并不真正感到振奋。勃兰特在1964～1965年选举中也不像60年代初期时那么受欢迎了。当1965年联邦议会选战开始的时候，勃兰特更多地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匹挽马；社会上对这位社民党第一候选人的支持率肯定低于党内的支持率。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中，也只有1/3多一点的人相信，勃兰特将是一位有能力的总理。1965年夏天进行的一项研究明确表明，选民认为勃兰特缺乏政治素养；认为他只是被他人扶植起来并受他人控制的。事实上，勃兰特不仅是第一位媒体总理候选人，而且是德国第一位公共关系总理候选人。过去，其他政治家从来没有像他那样，被追随民意调查结果的

顾问们投入到一切可能的角色中去,而不论这些角色是否适合他。恰恰是这一点几乎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因为他表现得虚假,像傀儡似的,也就是不自然的。

[**原书第169页图片说明**]人们经常谈论并谣传:勃兰特喜欢喝酒,喜欢漂亮的女人。但是这一切不太容易发生在他身上。他是性格内向的,些许的孤独包围着他。

勃兰特在1965年体会到,如果一个政治家过于信赖专业的形象顾问,过于投入角色,并想要得到世界上的一切,将导致这样的后果:毁掉自己,丧失尊严和权威,而不会获得胜利。在联邦选举之夜,路德维希·艾哈德作为胜利者而庆祝,因为基民盟获得的选票增加了2.3%;相反,勃兰特看起来则似乎是到了终点,是一个没有运气的人:虽然选票增加了,但却是永远的失败者。勃兰特想要放弃,不再在第一线作斗争,在选举之后不久,他还宣称,将来不再担任总理候选人。

这是勃兰特生命的转折点。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上升为伟大的、具有独特魅力的、得到支持者热诚尊敬的党的领袖。这真是太荒谬了:当勃兰特不再竭力追求认可的时候,却成为被自己的政党所认可的党主席;尽管他的雄心不再推动他成为政府首脑,他最终却成了政府首脑。勃兰特从1965年所经受的严重压抑中,从所有人的过高的期望中解脱了出来,并且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再非要成为什么,也不必非要向德国人证明什么。这就使他更安静、更自在、更独立,他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受外人控制的某个政治演员,也不仅仅是约翰·肯尼迪的德国复制品。现在,他不再允许在他的卧室和浴室拍照了;不再向所有的人、向每一个人都虚假地微笑并以此博得人们的同情。他表现得沉默寡言而疏远,但却流露出内在的、胸有成竹的冷静。现在,党的干部们才认真地对待他;现在,他才真正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勃兰特在他不想继续充当媒体宠儿的时候成功地取得了突破。

这样,他就成为人们至今仍然怀念的政治伟人之一。他也因此不受赫伯特·魏纳的政治策略的侵犯,拥有了自己的权威和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60年代的“两匹战马”——也就是勃兰特和魏

纳——在这个时候不太关心媒体的认可。魏纳和从前一样,是粗暴、嘲讽和威吓的;而勃兰特则只是不再有兴趣迎合记者并顺着他们说话。但是,这绝对没有给他们两人造成损害,反而更多地是给他们两人带来了媒体代表们的尊敬。

此外,维利·勃兰特发现了他的政治使命。他执著地坚信这一使命并能够通过这一使命把社民党动员起来:他擢升为新德国政策和新东方政策的勇敢的先行者。自从1966年以来,他像康纳德·阿登纳在50年代早期推行西方政策那样,目标明确而坚定地推行新东方政策,这一政策成为其领导力量及其独特魅力的源泉。随着外交政策的推进,他最终也赢得了党的中下层积极分子,这些人在60年代后半期被该党领导层对基民盟的战略性适应所折磨,热切渴望明确的社会民主党的替代方案。现在,勃兰特向他们提供了其所渴求得到的东西;可以参加到他的德国计划和外交政治计划之中,可以和不受欢迎的基民盟彻底脱离。即使是在大联合政府期间,勃兰特仍然继续推行他的路线,他是第一个谨慎地表示承认奥德—尼斯边界的人,并因此陷入了和联邦总理基辛格的争吵,因而社会民主党的特征比在反对派岁月里还鲜明,这只能稳固勃兰特在党内的地位。现在,他是社会民主党的干部和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所欢迎的英雄。

[**原书第171页图片说明**]赫伯特·魏纳、维利·勃兰特和弗里茨·埃勒尔于1964年10月14日庆祝海因里希·吕布克的70岁生日。3个多月前,他们保证了吕布克再次当选联邦总统。这纯粹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吕布克是基民盟和社民党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因此,魏纳在很多时候打断了吕布克绝对有损其职务威望的空话连篇的出格语言。魏纳是和政权打交道,所以他找了吕布克,如同阿努尔夫·巴林所写的,"关心和照顾地,亲切地笼络他,花言巧语地哄骗他,即口头和书面多多恭维他"。

勃兰特的事业满足了党的基层对和平政策的向往。现实的外交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的缓和愿景很少能够恰如其分地相符,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情况却是如此,并且将影响到整整一代人。勃兰特现在称社民

党为“和平的党”。干部们充满期待地接受了这一称呼,这是社会民主党的良好传统,同他们作为和平与进步的战士的自我形象相符合。简而言之,这就和其他人、和保守派及德意志民族派、和军事煽动者及冷战划出了清楚的、期望已久的界限。

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层的气氛。60 年代后半期表明,社会民主党基层民众的大部分虽然接受了党的领导人提出的向政治中心进军和向大资产阶级政党靠近的政策,也咬牙切齿地共同参与了,但这一切都不是令人高兴的。社民党的转变是受上层指挥的,而且突然和阶级工人运动的象征符号、比喻和纲领全面决裂了。并不是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够接受和理解社民党新领导层的战略计划:为什么勃兰特一直在讲“共同性”,魏纳似乎特别偏爱吕布克,埃勒尔如此看重联邦军队和北约;为什么不允许再谈论批判资本主义,而是必须表示赞成市场经济;为什么无论如何要同自称为基督徒的政党走到一起——20 年来,该党可一直是侮辱、诽谤、诋毁和嘲笑社民党人的。

直到 1966 年,社会民主党基层都保持着安定、守纪律,正如他们已经学到的。但他们随后反抗了,对羞羞答答地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因素的做法感到厌烦了。社会民主党人希望被允许再度成为红色的。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因为全世界在 60 年代中期都在谈论意识形态的终结,而社民党看来似乎是这种终结的最好例证。在 1964 年的卡尔斯鲁厄党代表大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从前社会主义的痕迹:没有红旗了;没有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战斗歌曲了;人们几乎不以“同志”,而以“党内同志”相称。所有聪慧的政治评论家、细致的专栏作家和博学的社会科学家也一致认为,人们毫无疑问且不可逆转地进入了非意识形态时代。

[**原书第 173 页图片说明**]1968 年 2 月 18 日,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反对越战大游行,其中,包括党在州一级理事会的成员,如哈里·里斯托克和埃尔温·贝克等人。游行队伍中的红旗、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画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画像、胡志明和切·格瓦拉的画像,令城市震惊了。柏林的社民党也同样感到愤怒,并(暂时)开除了反叛的理事会成员。“1968”年随后也迅速地改变了社民党,该党重新意

识形态化了，而且左翼派别赢得了相当的影响力。

然而，完全出人意料，世界观和滔滔不绝的讲述又回来了——在1966年左右就回来了，首先不是回到大学，而是回到刚刚才通过强硬手段从意识形态的包袱中解放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那里。突然间，在多特蒙德的党代表大会上重新持续、执著而自豪地讲"同志"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复苏了。对党的领导层的批评纷至沓来，突然，没有人再喜欢魏纳独裁的指挥结构了。当时党的理事会一位成员半开玩笑、半是放弃地这样评论道：现在"在社民党内成为左派"再度被看做是时髦的了。左翼——在60年代前半期，还只是被贫困和痛苦的生活煎熬着——在仅仅几个月内就赢得了蜂拥而至的支持者、自信心和党内的分量。党内再度开始激烈争论那些于1958～1965年之间在魏纳严厉、粗暴的鞭子之下成为纪律和团结的化身的东西。旧的、对于社民党来说如此独特的——在面向现实和未来愿景之间、现实政策和乌托邦之间、反对派和适应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回来了。社民党仿佛历史化了，似乎再度更像社民党了，与此同时，从哥德斯堡到大联合政府之间的岁月现在则像是一个短暂的错误，像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古怪的插曲。特别典型的是，直到今天，社会民主党人也还没有真正明白该如何着手处理其历史上绝对重要的这一段，尽管这段历史其实距现在非常近。

1966～1969年之间回归的毕竟不是老社民党的简单回归，而已经是一种新情况了。经过1958～1959年的组织改革，社民党成为人民党了，因此，其构成是不均一的和多层次的；它现在不仅从资产阶级阶层获得新生力量，而且学生中的激进抗议力量也加入进来了。这使得从上面对党进行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这种代价是社民党必须付出的，因为它想成为人民党并获得多数派的能力。

所有这一切对于维利·勃兰特的政治生涯都是有利的，因为社民党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凝聚者，需要一个在最顶层的伟大的整合者。在1966年，这样的一个人只能是勃兰特：只有他能够接触到不同派别、不同年龄群体和政治文化。虽然他从柏林时代以来是一个右翼的人，一个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基于其东方政策攻势，他现在被新左翼看做是希望的承载者，社民党内年轻的反叛者也对他寄予很多期望。勃兰特在青年时

代就体会到,左翼社会主义的过多的乌托邦思想有时是怎样地妨碍着眼界。他对社民党现在所面临的一切并不陌生;他对反抗者表现出充分的理解,显示出耐心。他是在恰当的时间处在恰当的位置上的一个恰当的人。

赫尔穆特·施密特,一些社论作者在 1965 ~ 1966 年已经呼吁他作为勃兰特的继任者,缺乏这种整合能力。他仅仅代表一种文化、一个政治方向、一代人;他不理解他的下一代人,不理解在政治中不能始终控制自己情绪的人。这就使施密特在代际冲突和文化变革之际明显地弱于勃兰特。党内派别之间的平衡愈难建立,勃兰特的领导地位就愈稳固;他现在已经完全从魏纳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了。简而言之,在 60 年代后期,勃兰特的领导力量是基于他备受党员支持的东方政策使命,基于他调解不同派别、不同代际之间矛盾的能力,肯定也基于他在大联合政府中作为联邦外交部长的立场。

勃兰特曾根本不想要这种联合。他在 1966 年秋天曾尖刻地对大联合的支持者这样说道,“组建大联合时,甭考虑我”。人们使他明白,在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参加联邦政府的时候,作为党主席的他根本不能留在外面。当时,他首先是很想去卫生部。科研部或交通部也适合他。勃兰特一定是被迫进入外交部的,是赫伯特·魏纳蔑视地决定这样做的。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至迟是从那时,而不是从 1974 年起,魏纳就把勃兰特看作是一个喜欢洗温水浴的人。事实上,魏纳远比勃兰特清楚地认识到大联合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未来的战略性意义。在联邦德国的社会中,人们在 60 年代对社民党还抱有很多怀疑。正因为如此,这个信号才如此重要,即资产阶级大党,迄今为止的国家执政党在某种程度上认可社会民主党人是有执政能力的伙伴并将其拉进内阁。从这一点出发,人们随后可以提出进一步的计划和额外的要求,开启新的选择。至少魏纳是这样打算的。

而他的打算也如愿以偿了。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参与大联合政府在权力政策上肯定比所有的党内组织改革和纲领改革都重要。这样,社民党人可以证明,他们不是蒙昧的阶级战士和激进的私有财产国有化主张者,而是严肃、内行而坚定的政治家。他们很幸运:恰恰是在基督教民主党人及其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经济政策神话破灭的时刻需要他

们参与组成政府。正是这一神话使社民党长期难以有所作为，使他们在50年代成为天然的反对党，而基民盟则相反——成为天然的执政党。

但是，当创造经济奇迹的伟大英雄艾哈德领导的基民盟于1966年陷入经济衰退，不能再和执政联盟的自民党找到走出窘境的办法时，上述一切就都结束了。现在——从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困境中的救星。尽管这一危机不是特别严重，但这个国家却由于有着对魏玛时代的回忆而非常不安。因此，需要这样一个人：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作为专家出现并且令人有这样一种感觉：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能通过现代的国家政策而得到很好的、顺利的解决。卡尔·席勒就是一个适合于此的人：他善于雄辩而自信，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高超能力；表现得坚定、有时是有些高傲的。尤其是他总是不断创造新的、席勒式的概念，如"全球控制"、"魔力四边形"或者"集中行动"等。这也令单纯的公众着迷，特别是似乎涉及到了关于现代危机处理的真正的符咒。在席勒任职仅仅一年之后，经济真的复苏了，甚至开始了高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繁荣。联邦、各州和乡镇的钱箱重新被填满了，失业不再是问题了。

[**原书第176页图片说明**]卡尔·席勒或许也最喜欢自己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作为德国（经济）政策的超人。席勒是最自信的，是一个明星，是自我中心的和难于打交道的——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社民党—自民党的政府里，他从1971年5月起领导经济部和财政部，因而是"超级部长"。然而，他是不幸的，因为乐于花钱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听他的。1972年7月，他辞职了。

1968～1969年，卡尔·席勒之于社民党就像路德维希·艾哈德在经济奇迹期间之于基民盟一样。如前所述，维利·勃兰特在外交政策上接任了从前康纳德·阿登纳所扮演的那些领导角色。社会民主党人从大联合中收益巨大：1966年，他们掌握了两个职能部门——基民盟要感谢这两个部门成就了其在联邦德国富裕社会"天然执政党"的美誉——正是外交部和经济部。在这个意义上说，联邦德国的权力转移不是从1969年才开始，而是很大部分地从1966年就已经开始了。

随着大联合政府的建立,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一些内容突然在政治上实现了。这首先是由于新的执政联盟是一个社会政治家的联盟。社会政策此时不再局限于社会救济、缓解困境、疾病保障措施、养老和残疾人保障措施。自从社会民主党参与执政以来,人们就将这些政策理解为有远大抱负的、旨在减轻阶级差别和收入差别的社会政策;理解为建立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但社会政策也影响到教育、文化、司法和发展部门,这些部门同样也要关心最重要的社会财富的所有参与者。

国家因此被赋予了一种新的作用。它现在应该自信地干预、共同塑造社会,包括调解性地干预经济,以便缓解危机、达到社会大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国家应该是积极的,应该塑造,尤其是应该计划。计划是 60 年代后期的关键概念。当时,国家和计划的反对者,即新自由主义看起来是历史上过时的模式——倒退的、不合时宜的、非现代的。只有少数人怀疑官僚机构、计划部门和科学指导班子的合理性和效率;只有少数人认为国家是不灵活的和确实过于昂贵的莫洛赫神①,并且宁愿今天而不是明天将公共财产私有化。

大联合那几年其实是德国社民党的黄金岁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很少起主导作用,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却抱怨这个大联合。对于他们而言,和宿敌基督教联盟党、和实施过紧急状态法的内阁所共同组成的政府,无论如何是一场不幸的结合,必须为此感到羞耻。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在这些人那里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不愿意回忆大联合,尽管社民党很少取得像当时那样的成绩:当时,他们第一次出任总统,第一次因一位经济部长而显耀,第一次指挥外交部;当时,他们奠定了东方政策和缓和政策的基础,还进一步跻身于社会中心,似乎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中间”的政党;此外,他们的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创造出了远离老无产阶级、传统资产阶级和典型小资产阶级的新中间阶层。

[**原书第 178 页图片说明**]1967 年 7 月 6 日,大联合内阁在寿堡宫(总理府)的花园开会。随着 1966 年大联合政府的成立,

① 莫洛赫神为古代腓尼基等国信奉的太阳神,要求以活烧儿童为祭品。此处意为无情的、耗尽一切的力量——译者注。

曾经被阿登纳诬蔑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参与执政。这主要是赫伯特·魏纳的杰作,他坚韧、系统地朝着这一联合工作着。最后,在1969年,社民党从这段执政时间得到了积极的结果:其经济部长卡尔·希勒引人注目;党的主席维利·勃兰特作为外交部长最终赢得了鲜明特色,内阁还通过了深刻的改革法案。另外,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喜欢过大联合。

社民党—自民党时期：
觉醒和失望

随着阿登纳时代的终结，旧中间阶层、旧资产阶级的时代在德国似乎结束了。从社会学角度说，这种结果肯定是明确的，即：经典的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消失了。1950 年还有 28% 的就业人员是独立从业者及其帮手；在社会自由联盟结束时则只剩下其中的一半多。收缩幅度最大、最迅速的是农民的数量。至少在半个世纪之久，社会民主党内最有智慧的理论家和最优秀的战略家都在不懈地思考着如何争取农民和农业工人的问题。社民党讨论、采纳、又抛弃了几个相关的农业纲领；在多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过农民问题，甚至在理事会内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委员会。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业经济部门在 30 年代还属于德国社会最重要的领域；当时，有将近 1/3 的从业者在农业部门工作。在 50～60 年代，愈来愈多的农民放弃了他们的农家院落。农民的数量如此大幅度地下降，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就不值得再开展痛苦的农业争论以及思考自己针对农村的宣传方式了。

而且，六七十年代的乡村生活早已不再像二三十年代那样，还会向后逆转。小地方找到了和现代化的连接点；城乡之间在收入、职业、消费行为和穿着行为、大众媒体的使用和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别显著缩小。粪堆、家畜和牲口棚在乡村消失了；具有悠久传统的、原本是自给自足的领域——乡村，现在日益成为专业工人和职员的私人住宅区，这些人是在附近的大城市里就职的通勤者；乡下非乡下化了，乡下早已不仅仅是以教堂、卫队和德意志全国农民联合会为依托的不受欢迎的、传统的保守主义的精神中心和堡垒了。这种情况虽然在勃兰特和施密特执政时期还在某

种程度上存在，但是政治保守主义的社会文化前提还是显而易见地粉碎了。这块平坦的土地不再毫无例外地是农民的和乡下的了，这就给社会民主党人提供了比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或者早期联邦共和国时期的全部农业纲领更好的、在这里扎根的前提条件。

[**原书第 182 页图片说明**]1950 年之后，工人们忍受了一个多世纪的恶劣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仅仅在 1953 年，就建造了 50 万套新住宅。这些住宅现在更大了，当然也有浴室和厕所。在工人家庭里也出现了取代居室厨房的起居室。始终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同旧无产阶级的告别和高水平雇员社会的开始。

不过，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职员领域在 60 年代的转变。相当部分的职员在 20～30 年代早期就已经了解了自由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时还站在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立场，重视与工人在具体的和象征的意义上划清界限。到了 60 年代，这种区别被工会的劳资合同和政治决定有意识地消除了。传统上工人—职员的矛盾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虽然绝不是完全地——变得缓和了，却没有引发职员起来反抗同化过程并再次产生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组织，就像他们在 1933 年之前通过德意志全国商务助手联合会所做的那样。职员因而摆脱了和旧中间阶层之间的、存在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的持久联盟，取而代之的是和工人及部分公务员一起组成了位于新形成的社会中心的现代雇员团体。在这里，社会民主党人能够比在旧资产阶级的、等级中心的反无产阶级和反社会主义的要塞——如同它们在俾斯麦帝国，甚至在阿登纳时代——更容易获得影响。

同时，反工业化的专业工人精英的一部分脱离了无产阶级，其社会地位上升了，这些人从现在起同样也属于新中间。来自专业工人当中的社会民主党的专业工人精英的这种升迁要归功于 60～70 年代的教育扩展。社会民主党人在联邦和各州层面大力推动了教育政策，这不仅改变了共和国，而且也改变了社民党自己。没有哪一个社会团体像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专业工人精英那样，如此长久地期待学校和教育途径的拓宽；从此，工人运动的这些核心团体就是有上进心的、努力接受教育的和争取晋

升的。但是,他们在从倍倍尔到奥伦豪尔的全部时期是被阻挠的,因为资产阶级顽固地护卫着其教育特权。直到阿登纳时期,资产阶级的教育特权才不复存在;政府扩建了中小学校和高等学校,增加入学名额并降低入学条件,决定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资助服务。专业工人立刻利用了这一解放机遇,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普通中学和大学。在20年代末,只有3%的德国大学生来自工人家庭;在社民党—自民党联盟的后期,这一数字已达到将近20%。许多工人子弟学习师范。此外,大部分人都争取在公共服务领域就业;对于"婴儿潮"那一代和教育普及的第一阶段的工人子弟而言,公共服务领域简直就是平步青云之路。新中间的这个先驱群体在联邦德国社会里还是强烈地倾向于国家的,因而对社会民主党加强中央集权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总而言之,旧中间阶层在60年代无论如何已失去了意义。在社会阶层的中心形成了新中间阶层,这一阶层较少地是拥有财产的资产者,并把自己看作是广泛的雇员运动的一部分:联邦德国在阿登纳和艾哈德之后的时期走上了雇员社会的道路。许多人认为,社会民主党将在这个社会里一跃而成为多数派政党。因此,社民党看起来几乎回到了最初,回到了拉萨尔和倍倍尔的黄金岁月。因为那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并从社会发展过程中受益;他们因而希望,不可阻挡的社会进步将有助于社会主义和社民党取得胜利。在那个时候,工业社会的发展几乎是自动地为他们输送越来越多的新党员、支持者和选民。所以,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10年里,社会民主党人仍然相信未来;他们乐观地思考、满怀信心地行动。然而,在1914年之后,迎来了停顿、倒退和失败的时期: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几乎不可阻挡的上升之后,接着的是另外半个世纪的几乎毫无希望的抑郁。而现在,随着60年代中期雇员社会的开始,预示着下一个转折,即社会民主党在半个世纪之后出色的新突破。

1969年,社会民主党人——在将近40年之后——重新担任了总理,1972年,他们以45.8%的选票取得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对于1969年的政府更迭,由职员和公务员组成的新中间阶层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直到1965年,在第三产业从业的大多数人还同情资产阶级政党。一直到那时,基民盟在职员和公务员那里始终能够获得50%以上的选票。创造

奇迹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是这一群体的英雄。但是,当1966年的经济衰退爆发时,艾哈德之星急剧黯淡了。基民盟突然就在服务领域的中间阶层那里失去了有经济能力的政党的光环。但在随后的大联合时期,新中间阶层很快就发现了一颗新星:经济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席勒。席勒把新中间阶层带到社民党的选民阵营,因而扩大并创造了波恩总理的办公室从基辛格更换为勃兰特的重要前提条件。

社民党最主要的支持者来自第一次参加选举的选民和青年选民;在传统上更倾向于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和宗教性质的政党的妇女那里,他们也逐渐赶了上来,到70年代初,社民党甚至和基督教民主党人——后者在女性选民当中长期领先社会民主党人10多个百分点——并驾齐驱了;即使是在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选民中——到当时为止,这些人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支可靠的队伍——社民党作为公立学校学生的阶级政党,现在也接近基民盟了。

"和我们一起开创新时代"——社会民主党人在魏玛时代一直喜欢唱这首歌,但当时他们自己或许都不再相信它了。在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前期,"新时代"事实上似乎确实是由社会民主党人开创的。在有影响的期刊和杂志上,已经谈论着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谈论着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也具有的结构优势。社民党显然在和未来的力量——青年人、新中间阶层、青年妇女——结盟;与此同时,联盟党看起来却好像和农民、退休者及天主教徒组成的社会的后卫部队一起,跟在社会民主党的先头部队的后面无望地跛行——至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有非常细心的观察者才注意到,1969年的政府更迭对于社会自由联盟的政党来说,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已经没有选票多数了;社民党在其1972年的选举大胜中虽然进一步赢得了工人的选票,特别是在天主教地区,但它在新中间阶层却必须再一次承受损失,而且恰恰是在经济繁荣的地区。

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和自民党联盟的第一阶段里不承认这一切。特别是对于社民党的那些青年支持者来说,这些年是令人陶醉、令人眩晕、令人屏息的政治舞蹈的岁月。今天的党的积极分子主体不无道理地宣称,1969~1972年那段时间是其政治生活中最幸运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说,那是酝酿、觉醒、焕发热情的时代。他们从来没有像当时,即维利·勃兰特担任总理的时候,感觉自己也那么正确;他们从来没有像在

那几个月里那么少地怀疑自己所投身的活动的正确性——当时国务秘书埃贡·巴尔去了莫斯科,总理勃兰特去了爱尔福特,而联盟党和施普林格出版社、被驱逐者协会以及企业家却在试图推翻新政府。社民党人从来没有如此坚信:自己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即站在了缓和、民族和解、裁减军备、民主、公正和团结的政治力量一边。这已经是政治气氛少于宗教气氛了;对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向来表现得有些缺乏抵抗力,但他们在20世纪很长时间都不再感受得到了。现在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来说,时机到了;历史和政治的转折点到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的不幸之后,德国伟大的澄清时刻到了。现在,共和国才开始成为真正民主的;现在,进步的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人要把民主化输送到社会的全部领域。

联邦总理通过其政府声明——"我们不是站在民主的终点,我们刚刚真正开始"——亲自把这种气氛推向高潮。但维利·勃兰特绝不是狂热的乌托邦分子——他的对手有时给他贴上这样的标签,他更多地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在一生中看到了太多的被意识形态所割裂的深渊,却仍然还相信人间的天堂,而且生性善良。在1969年之后,他还是完成了这一使命:使德国人和东欧民族达成和解,缓和或者某个时候通过一种新的和平秩序来解决集团之间的激烈政治冲突。在70年代早期的"政治圣灵"降临节期间,他通过自己推行的东方政治计划,成为几十万青年人和大部分联邦德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世俗的救世主。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推行外交政策的联邦总理,而且是伟大的和平缔造者和使国民亲如手足者。当勃兰特于1971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通过自己对基督教的认可与和解姿态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光芒更加强烈了。这种光芒在70年代早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那些年里把基督教联盟挤压到防御地位,为社会民主党人赢得了崇高的道德信誉——这在当时的情势下对他们有利,但在后来却往往足以成为他们的负担了。

对于社会自由联盟政策的似乎神圣的认证来说,没有哪一天比1970年12月7日更加重要了。这一天应该给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左翼积极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他们在以后的几年里经常与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争执,对那个阴冷灰暗的12月的一天的记忆——如果涉及到的话——却仍然使他们始终站在社民党一边。存在一些恰好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不仅仅是短暂的政治营销,而是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够将社会

基本情绪凝聚在一起，并能够以这种方式影响整整一代人。这些行为当中的很多都在历史上消失了。但在那个12月的一天，能够在华沙看到那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在犹太隔离区起义死难者纪念碑前，勃兰特献上了一个花环——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地，突然跪在了潮湿的花岗石上。恰恰是勃兰特，一个不负有纳粹罪行责任的流亡者，为所有的德国人跪下了；多数人有更多的理由应该这么做，但却没有做。勃兰特，这个没有责任的人，亲自承担了责任并为人民赎罪。但是，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正如民调随即显示的，这不合适：他们不愿看到一位德国总理在波兰下跪。正是这一点，令勃兰特神圣的谦恭态度尤其深刻地影响了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在反对派时期属于被歧视的真正的中间派。从前，没有哪一位总理能够像勃兰特那样被他们认同；对于他们来说，勃兰特代表着对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合理的共和国的希望。

知识分子还在选战中为勃兰特助选。1969年，作家君特·格拉斯、新闻记者君特·高斯、历史学家埃伯哈德·杰克尔以及两位政治学家阿努尔夫·巴林和库尔特·松特海默尔组成了社会民主党选民动议组织。这一组织的最初设想是作为一个作家和教授的联合会，但它在1969年夏天迅速地、令人惊讶地扩大成为一个知名人士俱乐部。艺术家们突然把支持社民党看作是时髦的，尤其是在慕尼黑的电影界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不仅是广受欢迎的周五晚上侦探片的警探，如出演《动臂起重机》的霍斯特·塔贝珀特和出演《老年人》的西格弗雷德·洛维茨，呼吁选举社民党；马丁·本拉特、克劳斯·比德施泰特和吉拉·冯·魏特斯豪森也跟随社民党。此外，社民党的狂热爱好者还包括德国电视的两位一流表演大师库伦坎普夫和弗兰肯费尔德先生。“民族电视之母”英格·迈泽尔[①]也同样参与了，不过，人们长久以来就知道她的心是在左侧跳动的。

[**原书第189页图片说明**]“在德国历史的深渊旁，在百万被谋杀者的重负之下，我做了人们要做，而口头却拒绝做的。”——维利·勃兰特。

① 英格·迈泽尔是德国著名女演员（1910～2004年），由于父亲是犹太人而在纳粹期间被禁止演出。20世纪60年代，她因为扮演了一系列母亲形象而被称为“民族电视之母”——译者注。

然而,1969 年只是序幕。社会民主党选民动议组织的真正高潮——几个月来,主要是君特·格拉斯在为它费心劳神——直到 1972 年才到来。现在,在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中间,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佩戴写有"选维利"或者"公民支持勃兰特"的徽章几乎是"必须"的。在媒体和电影界,只有少数几个人在 1972 年秋天的那几个月里敢于不在上衣的翻领处佩戴维利·勃兰特的徽章而出现在聚会或者接待会上。人们当然不希望属于"保守派"。这一切必然使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高昂的情绪之中,他们一定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即他们现在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再只是工人的政党,并且已经不仅仅是新中间的政党,他们现在甚至是知识分子和更高社会阶层的政党。

这是社民党剧烈动荡的年代。到了最后,它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社民党了。在该党内部,很少发生像 1968 ~ 1972 年之间那样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其实,只有独立社会民主党在 1919 年春经历过类似的迅速转变。1969 年和 1972 年这两个选举年首先是大规模入党的催化剂:社民党在 1969 年得到 10 万名新党员,在 1972 年甚至得到 15 万人;在 1968 ~ 1972 年之间,党员数增加了将近 1/3;1976 年底,1 022 191 个联邦德国人拥有从现在起更蓝的社民党党证,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没有比它更高的数字了。

社民党在 70 年代早期首先是彻底实现了年轻化,它在 50 年代还绝望地遭受着老龄化的威胁。现在,许多在 1968 年之后政治化了的"青少年"——人们当时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入了党。1972 年,将近 2/3 的新党员还不到 35 岁,全部社会民主党人的 1/3 处于 16 ~ 24 岁的年龄段;同时,由于新 的年轻人构成了德国教育扩展的核心群体,学者的比重增加了。社民党不仅是教育革命的发动机之一,而且是受益人之一,在 70 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人中拥有高中毕业证和大学文凭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全民的平均水平。

[**原书第 190 页图片说明**]汉斯 - 约阿希米·库伦坎普夫和彼得弗兰肯费尔德是 60 年代末最著名的德国电视表演明星。他们中的一个使《有一个人将获胜》的节目现代化了,另一个则

使《勿忘我》节目现代化了。他们也像其他许多名人一样，在1969年呼吁选举社民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非无产阶级化了，工人在新党员中的比例在70年代下降到28%。社会主义的历史性主体——社民党及其理论家对它曾寄予了如此长久、如此众多的崇拜——日益丧失了其意义。现在，日益重要的是职员，尤其是公务员，他们在其他任何党内——当时还没有绿党——都没有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社民党在这个社会自由主义的10年里成为公共服务人员的政党，成为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的政党。这种情况在干部层次比在广大党员那里体现得更明显：在党代表大会和议会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自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会、教育界和科学界的工会；而来自五金工业工会、矿山工会、矿石工会和土地工会的社会民主党人则相反，自70年代中期以来，只有很少人跻身于党的领导层。

在1958～1961年之间，社民党从纲领、组织和象征符号上告别了作为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告别直到社会自由联盟的最初几年才发生。现在，社民党才真正成为一个人民党，其党员构成反映了人口的社会概况。然而，这一转折进行得非常迅速，而不是一种有目的地控制的、谨慎改变的过程。这在党内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剧烈的喧嚣。

事实上，社民党内随后的发展是相当疯狂的。在一个毕竟经过了极其漫长的时间之后才刚刚执政、本来可以对自己、对世界都感到满意的政党里，一种已经近乎不负责任的当反对派的兴趣却又一次蔓延开来。社民党在这些年里成为一种奇怪的辩证法的牺牲品：他们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了——并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回到了过去，因为来自新社会阶层的新党员的行为非常激进。

在此时，新党员中的年轻人恰好再度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社民党用了几十年才摆脱确定论和考茨基式的马克思主义繁琐哲学，全面参与了政治，积极争取国家政权，而不是被动地相信社会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客观上软弱无力并遭受政治压迫的时候仍起到一种可以理解的、无疑稳定了政党的作用；它当时很可能也反映了现实，往往也进行了有预见性的解释。然而，70年代年轻人的马克思主义不再解释任何

东西,它既不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不是现实分析的工具,而只是煽动,年轻人想令年长者——"庸人"——愤怒;它还是一种年轻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但却令上一代人胆怯的暗语。7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精英的姿态,有时还是后青春期对抗的简单表达。在那些年里,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开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辩论中,除了无穷无尽无情的词句以及写得很糟糕的小册子之外,没有得出任何结果;没有对德国现状的有洞察力的分析,没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明确的,同时能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切合实际的反资本主义计划。但是,这一切却在 70 年代早期被异常雄辩地、极度傲慢地、毫无幽默感地宣讲着。

[**原书第 193 页图片说明**]西格弗里德·伦茨和君特·格拉斯在社会民主党选民动议组织 1976 年的一次集会上签名。这一组织的特别之年是 1972 年。当时,数百名艺术家、运动员、科学家、知识分子和无数的广大公民公开支持维利·勃兰特。当时,笼罩着引人注目的认同热。格拉斯是社会民主党选民动议组织真正的推动者和最勤奋的演讲者,仅在 1972 年,他就在 129 场活动中为社民党宣传。他自己直到 1982 年才加入社民党,却又在 1993 年因社民党的难民法决议而退党。格拉斯和社民党之间的爱是伟大而又艰难的。

这种形势已经是异乎寻常的了,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又使现实更困难了。本来一切都可能是良好的:社民党在经历了几十年政治上的软弱无力之后终于进入内阁。该党实施或着手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在联邦德国社会里,工人早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了,他们在物质上和社会上的保障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改善,许多人达到了完全舒适的富裕生活水平,他们的孩子常常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社会整体多元化了,文化多种多样,更宽容,更丰富,更开放了,简而言之:更自由了;在中上阶层,德意志民族的流派几乎不复存在了。这个国家更公平了,更民主了,社会福利更多了,大约可以这样描述 70 年代早期的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成为这个乐于改革的联邦共和国的多数派政党。

然而,这些新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言人不愿意了解这一切。

他们更多地谈论“对工薪大众的剥削”，现在又轻蔑地把民主刻画为“形式上的”或者“资产阶级的”；对于他们而言，国家——也就是自己的政党目前正居于其最顶层的这个国家——简直就是资本运用利益的一个执行机构。此外，这些青年人分裂成许多派别，相互争斗，并以巨大的热情争论谁是所有人当中最马克思主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奇怪而可笑的，但它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而言则并非不同寻常。所有伟大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在这种党内宗教战争中得到锻炼的：无论是拉萨尔还是倍倍尔；勃兰特还是——恰好在70年代早期那几年——施罗德，他当时曾为自己属于青年社会主义者中特别坚定的反修正主义者而自豪。对于后来成长、成熟起来的政治领导人来说，青年人的这种得意洋洋和混乱的辩论战显然是很不错的学校。

[**原书第195页图片说明**]社会民主党青年团（Jusos）——这是摄于1975年社民党曼海姆党代表大会时的一张合影照片——在70年代中期不再是一个很令公众恐怖的组织了，他们终于也穿着正常的服装了。他们在那个时代非常自信：把自己看作是新社民党，是未来10年的领导人。这里拍摄的Jusos当中的两个人是今天的联邦部长：汉斯·艾歇尔和海德马里·维乔雷克-措伊尔。其他人，如沃尔夫冈·罗特，于1992年去了欧洲投资银行，放弃了党内生涯的想法。约翰诺·施特拉塞尔则继续著书立说并告诫同志们。

但是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混乱的冲突到来的时刻，他们却使一个政党——特别是当它正在执政的时候——很难有所作为。留着长头发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突然涌入一个稍微有些倾向于小资产阶级专业工人的政党，打破了社民党精神上的平衡，引发了代际斗争和文化斗争。因此，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拥有不同生活经历和经验的两支对立的队伍，它们彼此陌生，也不想互相理解。尽管其核心是关于不同的经验世界、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他们却以一种左右翼之间政治派别斗争的方式展开彼此的冲突。

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和大学城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慕尼黑和法兰克福

成为联邦范围内引人注目、令人震惊的范例。直到60年代末,社民党在这些地方还是工人和下层职员的政党,即"小人物"的政党。在小人物——社民党的地方支部会议上,党员们迄今为止都是听简短的报告,较少讨论,偶尔也会责骂党的理事会或者联邦议会党团里的"上层人物",但这一切会适当地结束——通常是在开怀畅饮的团结中结束。真正的政治内容从来没有持续到22点,然后,人们还要进行一些交际,玩玩纸牌并坐在一起喝点啤酒。

1970年之后,这种局面结束了。突然来了年轻人,他们大多是封闭的团体,穿着有些吊儿郎当,极其精于辩论。他们不断地提出关于议事规程的提案,老同志到那时为止都不知道这些提案的存在。年轻人不断地宣讲,不断地使用外来词汇,把自己的党说得一无是处,嘲笑、讥损,提出激进的决议和决定来进行表决。他们有的是时间,地方支部大会不再于22点之前结束,常常也不在23点左右,而是很多时候都在午夜之后才结束。第二天清晨要早早起床的工人和职员在那个时候已经入睡了,大学生新党员、多数派——当时在青年左翼圈子里得意洋洋地这样称呼——就可以舒服地"折腾"了,因为他们的初级讨论班在下午才开始。就这样,在这些年里,施罗德、沙尔平和维乔雷克-措伊尔这一代人从下层占领了党,就这样,他们有些无情地排挤了上一代人。马克思主义难懂的语言也对他们有利,这种语言把不善表达的对手气跑了。此外,他们还以某种方式使自己队伍的要求在政治上合法化了。

[**原书第197页图片说明**]在1978年霍夫海姆青年社会主义者联邦大会上,格哈德·施罗德被选为社民党青年团的主席。在社民党青年团团员时期,施罗德也不是那种头发打绺,手里拿着啤酒瓶的理想主义者和狂热的幻想主义者;而是已经具有锐利、理智的眼光。当然,他的讲话是"左"倾的,比如他评判总理施密特说:"总理的管理井井有条。遗憾的是他没有发展起未来的愿景。因此,他使社民党的未来自取灭亡。"

对于倾向市场经济和积极就业的新中间选民而言,社民党内装点着意识形态的文化斗争和代际斗争的作用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对社会民主

党人的信任毕竟还不是那么坚定;他们谈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时间毕竟还不长。现在,青年积极分子突然开始重新争论这一切了。当社民党于1970年再次开始考虑控制企业投资的时候,当它在1971年11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作出大胆的税率决定的时候,必然使每一个收入稍好一些的人都陷入担心和恐慌。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1969年支持席勒的一部分选民再度离去。因为其偶像卡尔·希勒本人最后也离开了,先是离开内阁,然后是离开党。

然而,社民党1972年的巨大的选举胜利再一次掩盖了早已开始七零八落的事实。其中,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接受已经在此次联邦议会选举中出现的损失,特别是在共和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如在黑森州、巴登-符滕堡州和巴伐利亚州。尽管这一切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已经是一个可靠的信号,即在60年代的新中间内部也充满保守的反混乱思想,在他们当中也存在着十分正常的占有财产的本能,而不仅仅是老中间对改革者的过分热心作出了不信任和拒绝的反应。恰恰不应该对1972年的联邦选举结果进行错误的解释:投给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不是对大胆的内政改良主义的奖赏和信任,而首先是对勃兰特-舍尔政府在东方政策和德国政策方面所签条约的投票。

这样,选民批准了新东方政策的伟大路线;这样,维利·勃兰特的光芒烟消云散了。对于他来说,和世界历史上所有独具魅力的政治家一样,只要历史任务完成了,只要单调的日常政治重新出现,其影响就逐渐消失了。以前如此有魅力的领导人不再光彩照人、引人注目了;他不再是伟大的救世主和拯救者,而仍然只是世俗的、普通的和尘世的。不仅民众在这一时刻是清醒的,而且具有独特魅力的人—自己,也不能应对这种非神化,因而经常变得消沉而冷漠。选战刚刚结束之后,所有这一切都于1973年发生在维利·勃兰特这个具有忧郁和自我怀疑倾向的人身上。他感到空虚,身心憔悴,精神疲倦。维利·勃兰特在1973年不再做事,他迟疑踌躇,无精打采地执政。他放任政府成员和党内的青年人;政府和党不断地相互疏远。勃兰特顶多是现代化了,但他不再领导了。他没有做到将政府、议会党团和政党组成一个行动整体,而这是议会制度内的一个政府首脑和政党领袖,如果他不想失败的话,必须做到的。

[原书第198页图片说明]社会民主党青年团联邦理事会于1974年初开会:洛克·默尔尼茨卡、沃尔夫冈·罗特、德特勒夫·丰克和约翰诺·施特拉塞尔(从左侧开始)。罗特,读报的人,当时热心地思考着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后来,他发现了市场和竞争的长处。施特拉塞尔,留着伊米-亨德里克斯发型的理论家,撰写机智的文章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默尔尼茨卡,留着大连鬓胡子的人,是社民党青年团内先锋人物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无产者代表。他们为在轧钢车间工作过的默尔尼茨卡感到非常自豪。

所以,勃兰特是易受伤害的。当民意调查结果跌入谷底及地方选举失利时;当共和国的气氛因通货膨胀和石油价格的打击而逆转,但公共服务、运输和交通行业工会却在经济增长率只有0.5%的年份违背总理的意愿,为"国家公仆"们取得两位数的薪金和工资谈判结果时;此外,当人们在总理办公室还碰到一个东方间谍时——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对于久经阴谋历练的赫伯特·魏纳来说,事情并不困难,即让已经疲惫不堪的总理再遭受致命的一击并强迫他辞职。

魏纳的行为方式常常是令人反感的,但对社会民主党人却也常常有益处。无论如何,几乎没有人仍旧认为社民党——作为以勃兰特总理为领导的执政党——还能再次实现转折。勃兰特是具有伟大前途,也作出过伟大承诺的人,是一个处在社会不惧怕转变的时代的人。但是,这个时代过去了:自1973年以来,国内笼罩着危机的气氛,直到联盟结束也没有消失。现在已经不再是公布大胆计划和抱有宏伟希望的时期,现在要做的是细节工作,要以精确、冷静、内行的方式处理危机。这是赫尔穆特·施密特的时代。勃兰特和施密特——这种人事状况反映了始终影响着社会民主党的两重性——对社民党既是激励也是负担。勃兰特考虑的是:"应该是什么";施密特则坚持"是什么"。勃兰特将社会改革运动视为成功的政府工作的发动机;施密特则相反,惧怕运动和动荡,他在其中首先看到的是对合理性和可预见政治的威胁。作为总理,勃兰特让政府内部的讨论自由进行;施密特则立即进行干预,如果他认为部长的讨论是没有方向的话。因为施密特的一句格言是:"讨论必须产生结果,结果产生决

定,决定产生行动。”

[原书第200页图片说明]1974年末,新总理和继续任职的党的领导人。他们看着不同的方向,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还必须一再言归于好。这对他们并不容易。但只要他们还能做到这一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就能够维持下去。

因此,施密特在1974年切中时弊,无论如何能够得到多数德国人的赞同。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而施密特则是处理危机的人,他是紧急状况的政治家。在紧急状态时期,他崭露头角,能够展示出他的特长:敏锐的头脑、专注力、持之以恒、决策性、勇气和审慎。1962年,施密特通过在汉堡与洪灾作斗争证明了自己的能力;1968年,面对愤怒的学生抗议,仍然启动了关于设立议会栏杆的紧急状态法——他在这件事情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他是在社会自由政府于1974年陷入总理危机时走上这一岗位的;他在1977年领导了全国反左翼恐怖主义的斗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施密特都能够展示其领导能力。当然,在危机时刻,否决势力的数量减少了,并且可以使用行政工具,这是政治家在其他情况下所不能动用的。

在联邦德国历史上,施密特拥有比任何一位总理都多的政治能力。他的前任们主要是热情的外交政治家,对经济和财政问题仅仅略知一二。只有艾哈德的情形恰恰相反:他或许熟知——尽管对此也存在争论——经济事务,但在外交政策领域却是一无所知。反之,施密特则是一切问题的专家: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货币问题和财政问题、世界经济政策问题。在70年代,不存在第二个在这么多不同领域都如此内行的政治家。此外,施密特还是理性主义者。勃兰特更倾向于直观地领会、预感并发现政治形势及其变化;施密特则相反,他是博学、清晰地使用准确的概念去分析这一切。施密特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不以为政策在已有情况下只具有很少的行动能力。但与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人不同,他不对此悲叹,也从不尝试从封闭的、狭隘的现实逃往广阔的、被绝美描绘的未来幻境。对于他来说,只是确实是存在回旋余地问题——他想要利用这种余地。他将全部政策都集中于此。

[原书第203页图片说明]施密特、根舍和勃兰特——社会自由联盟的支柱——在1976年12月。这个"历史性联盟"最初的改革热情消失了。他们的目光是怀疑的、冷静的,也是坚硬而冷酷的。

憧憬和乌托邦是令施密特反感的。他正是对那些憧憬和乌托邦、也对那些明显、公开甚至是尖锐地表现出来的观点感到担忧。他不理解那些容易激动、坦白的、对情绪不加控制的人——如果他们是政治家的话,就更不理解了。因此,他和社民党内的年轻人,和年轻的下一代的整体都很难相处。施密特属于怀疑的一代里年长的那部分人,他们厌烦了伟大的思想,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感觉。此外,他是德国北部的新教徒。那里的人们不向外流露其内心的活动。勃兰特也具有相当明显的北部德国特征,封闭而内向。但他在其政治社会化的岁月里,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主义时代里,经历了诸多紧张、决裂、戏剧性的和违背情理的事件。勃兰特知道这一切是多么重要,对于政治也是重要的。因此,他比施密特想得更复杂、更辩证。勃兰特也许比施密特更清楚地了解人类社会中的深渊、迷途、对抗和矛盾心理,包括自己政策中有疑问的地方和两难状况;而施密特则是线形地、因而肯定是更有逻辑和更严格地,但同时也是一维地、在某种程度上比其前任更简单地看待事务。施密特不喜欢自相矛盾和颠三倒四。因此,他完全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他喜欢排除他所不理解的那些事情。

施密特只着眼于一种非常简单的政治图画和社会图画。他的理论是,人们对政府的首要希望是政府能够正常、可靠地完成经典的国家任务,即:关注国家的内外安全和物质富裕。只有和满足的人们在一起,民主才发挥作用,施密特对此深信不疑。现在,施密特在作为总理的任期内是受人欢迎的。和他一样,大多数德国人无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对施密特的政策核心表现出不满。对于他们来说,总理关于安全和富裕的经验主义是不够的。在7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还仍然是社会民主党人:仅有经验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超越。

[原书第205页图片说明]冷静的效率和理性的、有能力的危机处理——这也许最好地描述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他作为联邦总理任期内(1974～1982年)的特征。即使是在改革的兴奋结束之后,鉴于迫切的经济问题,也还需要他的能力。社会民主党人知道,施密特是他们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的最佳人选。他们非常尊重他的贡献,但是却不像对待其前任维利·勃兰特那样热爱和崇拜他。

因此,除了总理的职位之外,施密特已经不能再担任党的主席了。当时,他本来就不想当主席。直到后来,他才愿意说出来,他的放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施密特回忆道,作为党的主席,他将已经把党带领到政府的路线上来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一点。刚刚入党的几十万名青年人还充满干劲、满怀热情和激进改良主义的梦想。对于这一切,不能简单地从上层进行窒息和约束。施密特也不能采用制度方法把这些相互争斗的青年积极分子压制住,甚或是抛出党外。他们的人数早就很多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党组织的中坚力量。这对社民党来说有点令人悲伤,但却是现实:施密特和新党员的主体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波长尺度上传递着信号,他们的经历和文化特征的差异远远大于在这些年中所能找到的共同点。在70年代,施罗德和维乔雷克-措伊尔那一代人还要信仰某种虚幻的、理论的、激进改良主义的东西,仅凭"政府稳定"这个压倒一切的命令是难以令他们承担义务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施密特得益于1974年之后不必再担任党的主席。他担任总理,而另外一个人照管党,这对他有利。这样就减轻了他的负担,使他有可能完全集中精力于内阁事务。他也不必介入党内争吵和派别争执的深渊,通过和自己的党保持距离,他反而保护了自己作为所有德国人的伟大的人民总理的名声。此外,在那些年里,社民党分裂的领导层或许已经暗示了结构上的原因。社民党的成分最终由于新党员潮而变得不单一,党的不同部分很可能只能通过不同的领导人物来代表并使之联系起来。

这正是著名的"三驾马车"的前提条件:领导层由维利·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伯特·魏纳组成。这三个人对应了社会民主党不同

部分的文化。勃兰特令青年一代着迷,他们重视对新社会的光明憧憬;施密特影响着倾向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看重实用主义的行为方式和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政治效率;而魏纳则令所有那些看重党的无产阶级传统的人兴奋,这些人还想要自己组织内部的严格纪律并与政治对手断然划清界限。这样,"三驾马车"代表了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方向、生活世界和类型。这样,"三驾马车"——尽管这三个人几乎互不攀谈并且互不喜欢——在70年代整合了社民党。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做到了继续保持16年的执政地位。

[**原书第206页图片说明**]1980年时的"三驾马车"。在社会自由联盟的几年间,党的这三位领导人之间没有过多的交谈。他们将不再单一的党维系在一起。然而,和睦相处,相互宽容对于他们来说日益困难。魏纳表现出衰老和疲惫;相反,勃兰特则是强有力的和富有朝气的。1983年之后,勃兰特是他们当中唯一仍在社民党领导层的人。

不过,社会民主党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令人惋惜的,因为他们总是在参与执政的时候,不得不与特别不利的状况作斗争:1918~1919年工人运动的分裂以及许多工人的极端化令他们苦恼,他们必须应对战争失败的后果和混乱的内政状况。而在70年代的社会自由联盟时期,党员的极端年轻化和原教旨主义引起党内的不安;同时,国家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社民党处于一种走投无路的困境:一方面,失去耐心的青年积极分子迫切要求激进的改革;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利率增长,由于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参议院内保守党的多数派地位,社民党政府的回旋余地变得异常狭小。事后看来,这简直是令人吃惊的,即社民党竟然能够这么长久地保持政权,而不是在1982年以前就失败。

在70年代,社民党肯定不是总理选举联合会。其他任何政党的党代表大会都没有如此激烈和骚动,如此公开地解决争论,尽管有时是令人感到痛苦的。在勃兰特和施密特时代,社会民主党的党代表大多不是沉闷无聊的。所有重大的冲突其实都已经在社民党内出现了,自70年代中期

以后，这些冲突震惊了整个社会。更重要的是：社民党比波恩的议会更有力地解决了这些冲突。这几乎撕裂了党。但社民党也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党，一个生气勃勃的、强有力的政党。它曾距离希望和恐惧非常之近，距离共和国高出生率年份的那些骚动不安的青年人的异想天开和非理性也很近。由此发展出这一代人对社民党的一种特别的——虽然有些困难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在社会自由联盟时期结束之后也得以保留：许多人虽然对施密特政府非常失望，但却感觉到一如既往地和最初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想，和维利·勃兰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民党在未来应该还会从中受益，但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这种联系却加剧了社民党内部的紧张。因为青年积极分子在关键内容上拒绝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邦政府的政策，不论是关于原子能、削减军备还是武器出口。社民党在内部，和新社会运动都只讨论那些使自己的阵营分裂和两极分化的题目。更重要的是在能源政策和安全政策上，施密特政府的决议虽然得到议会反对派原则上的同意，但却不再能够得到——如果得到，也只能是咬牙切齿地——自己人的同意了。

70年代早期，在1969年使得政府更迭成为可能的那些"新中间"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就已经再度分道扬镳了。一部分人倾向于右翼；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左翼，首先是倾向于市场经济的群体离开了社民党，他们反感新左派的辩论，反感加强福利国家的国家主义。在经历了4年的社会自由联盟之后，他们对改革疲倦了，也因持续不断的解放要求和革新而失去信心了，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在勃兰特时代末期，新中间的这一部分就已经重新和老中间结盟了，并转入联盟党或者至少是转入自民党。务实的、专家型的总理施密特的情况是，当他在世界经济峰会上大放异彩并战胜恐怖主义的时候，他在70年代后半期又一次将这些选民拉回社民党，直到他的名声在1981～1982年，即社会自由联盟的解体时期，每况愈下。

[**原书第208页图片说明**]1977年，时任柏林负责科研的州府委员彼得·格罗茨在一次学生集会上。教育革命现在胜利了，大学人满为患了。但是在出生率高的年份出生的人——尽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却未被合理地需要，他们的职业前

途更加渺茫。这是失去的一代,并且出于防御而作出反应:反对宽容极端主义分子,反对原子能,反对高校框架法律,反对火箭基地。他们从社民党那里得到了太多的承诺,现在则对该党感到极其失望。今天,他们则是社民党引人注目的最忠诚的选民,是"红绿联盟"的基础。

倾向于左翼自由的新中间部分则不过多批评解放和改革,而是恰恰相反,批评政府的犹豫不决。被维利·勃兰特的民主承诺所激励起来的所有的人希望现在就看到这些承诺的兑现。因此,对于一些人来说,社民党走得太快了、太远了;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太慢了、不够激进。特别是在1973年,这些思想分离了,新中间联盟崩溃了。其左翼自由主义部分成立了公民动议组织,发现了生态问题和增长问题,开展了反对中程导弹驻扎的抗议活动。最后,正是从这一派别中形成了绿党。这一切涉及到的是激进的社会自由主义,而不是——如同人们最初所认为的那样——历史性的新生态原教旨主义。激进的社会自由主义队伍虽然对施密特感到生气,因为他的政策实际上意味着背离了1969年政府更迭时的革新激情,但对于社民党来说,也因此没有永远失去他们;后来,当其中的许多人对持续投身于运动的兴趣明显减弱的时候,重新出现了向社民党的靠拢。

但是,社民党在80年代早期——几乎和在不幸的魏玛时期一样——陷入了两个阵线之间:新中间的一部分向右,转入了联盟党;其余的向左,转入了绿党。社民党不再有能力使不同的社会团体协调一致,不能建立社会文化的持久联盟。的确,该党丧失了多数派能力和执政能力;这就导致它回到了反对派的位置上。

[**原书第211页图片说明**]1980年前后是生态抗议的时代,特别是反对施密特政府的能源政策。因此,核能反对者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1972年还曾热情地支持勃兰特——也陷入了同社民党的冲突。社民党人最终失去了这一代人。同自民党的联合破裂了,绿党作为新政党——年轻人的、激进社会自由主义的以及社民党的部分选民的——赢得了40岁以下的人士。

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再成功地整合不同的选民阵营或者党内派别了——即使是议会党团也不再团结了。可想而知,议会党团主席赫伯特·魏纳对于整合政策肯定是不合适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权威的人,一个训练大师;他发出命令,其他的人必须服从。魏纳对政治领导就是这样设想的。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他就是这样把社民党带领上路了。但在1972年之后,尤其是在1976年之后,这种方法不那么灵验了。新进入联邦议会党团的青年人——对于他们而言,旧阶级社会主义的纪律伦理是陌生的——希望被充分的理由来说服,而不是被呵斥和粗暴地责备。这是魏纳不能与之很好相处的一个新世界。以前,在60年代的时候,魏纳和联盟党的政治家整夜喝酒,第二天,他就把前一天晚上作出的约定独断地在议会党团内硬性推行下去。现在,这种事情不再可能了;现在,出现了矛盾、反对和"讨论的需要"。魏纳对这一切都感到陌生。他除了继续发怒、骂人和侮辱人之外,想不出别的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激励这些新的、固执的议会党团成员,并从他们的能力中获益。魏纳调动别人的弱点,而不是长处。此外,他的身体疲惫不堪,这损耗了他的很多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日益孤独,也日益固执。在社会自由联盟的后期,他已经不能控制议会党团,其在社民党领导层的影响也消失了。

"三驾马车"变成一对二重奏了,这在1981~1982年反而不太和谐了。迄今为止,施密特和勃兰特都在同一部戏里扮演了两个角色。但现在,他们出现在不同的舞台上。勃兰特长期试图深入地对党施加影响,使其共同承担施密特政府的政策。从1981年以来,勃兰特则思考着超越施密特执政期以外的事情。他把党的未来和团结置于比联邦内阁的稳定更加优先的地位。他有时暗示,他对总理的火箭政策也有疑虑,他的内心也是同情反军备者的。最后,他不想让社民党再承受内阁的不稳定而有缺陷的妥协方式了。1982年,当工会——迄今为止,工会一直是总理忠诚的战友——也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号召到波恩举行抗议游行的时候,施密特丧失了必要的支持,这种支持能够使其抵御善变的联盟伙伴——自民党。1982年9月,社会自由联盟结束了。

至少,施密特担任总理职务长达八年半。因此,他比艾伯特、基辛格

或者勃兰特执政的时间长得多,尽管他面临着一些问题,从经济繁荣初期开始,经历了恐怖主义,到缓和的结束。而正是持久的危机成为施密特的力量源泉。总理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达到最佳竞技状态,因而得到了多数联邦公民的信任,并由此稳定了联邦政府——尽管最迟从70年代中期起,在社会和州议会内向右转入联盟党的趋势已经清楚可辨了。

然而,在1980年之后,施密特——当然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天生保守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有所作为。政府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痛苦的长期冲突中达成的妥协方案,在几周之后就不再起作用了,而只是在东拼西凑地推行政策。大规模的理论讨论在此期间不存在了;长远计划在总理的周围是禁忌。当然,一切都不同了,不再像60年代后期那样美好了,当时还能达到高于7%的经济增长率,当时的时代精神是社会自由的和社会国家主义的;当时的东方政策和西方主要伙伴的缓和政策是一致的。1982年则相反,全国都感受到了衰退的后果,新自由主义成功了,而且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冰冷的——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时期。

这是黑暗的岁月。1981年,8 500个公司破产。1983年,失业人数突破200万大关。国家债务危险地增长着,德国国民经济的投资率却在危险地下降。"婴儿潮"那一代人从学校和大学毕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不再能找到工作。青年人来到大街上,他们组织议会外的抗议运动,担心环境灾难和大规模核战争。关于世界末日的舞台场景在社会自由联盟末期被画到了墙上。共和国麻痹了。社会自由联盟始于巨大的热情和过度陶醉的启程。这一定会导致巨大的失望、挫折和痛苦。当社民党作为执政党退场的时候,国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就令自己人和支持者感到沮丧和备受折磨。1982年秋的政权丧失更多地是令社民党感到轻松,至少不是受苦。最后,他们感到政府的任务只是沉重的负担;相反,反对党的角色则被他们,又一次,看做机会——尤其是,凝聚力量并再度成为自信的政党的机会。

科尔时代：
“孙子们”的舞蹈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从执政党到反对派的过渡很可能从来都不是平缓而充满关爱的。这种过渡也许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决裂。然而，在德国议会的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个政党像1982～1983年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极端地进行了这种决裂。在几个月之内，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政党就和施密特担任总理期间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党作出的所有重要的方向性决定拉开了距离。1983年，赫尔穆特·施密特——仍然是共和国内遥遥领先的、最受尊重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他自己的党内被完全孤立了。在1983年的科隆党代表大会上，他只为其安全政策路线找到了十几个显得很胆怯的支持者。绝大多数代表则是保持距离地、怀疑地倾听着——深刻分析、准确表述的——前总理的最后的大报告，然后不再对其进行讨论，而是傲慢地立刻转换到下一个会议日程。社民党内的多数人和施密特决裂了。他们感觉施密特的总理职务最终只是一个镣铐，是过分的要求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压制。现在该结束这一切了。为此，新一代的社会民主党人要容忍这样的事情，即打破和基民盟保持一致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是赫伯特·魏纳于1960年6月30日通过其联邦议会的讲话而建立起来的——以便使社民党真正具有执政能力。

在社会自由联盟破裂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问题根本不是寻求直接的执政能力。他们想要重新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并参加反对原子能和军备项目的“进步人士”的社会联盟。他们首先想要重新赢得在施密特时代末期离开社民党的那些年轻人。这种大批离去使社会民主党人的处境很困难，因为从历史上看，只有当社民党是青年

人的党和面向未来的党的时候,才能运行良好;相反,当青年人离开他们,就像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和在50年代那样,他们就要经历不幸的时期。随后,他们感觉衰老了,和他们对未来的坚信一起消失的还有选民的选票。

因此,当相当部分的德国青年抗议赫尔穆特·施密特的政策,绿党或者替代名单成立之时,已经给社民党人敲响了警钟。在这个意义上说,施密特于1982年秋天之后不再担任总理对于他们并非是不幸。因为现在他们能够迅速地将社民党转换成生态运动与和平运动的政党。领导人和中层干部中的新人们在新教的普世教会节日去朝拜,在那里,他们低下布满忧郁皱纹的额头,表示理解聚集于此的生态和平主义运动的青年人对未来的担忧——或者更好地:表明他们的参与。

在施密特时代之后,社民党内确实存在着一种青年崇拜。社会民主党人仔细阅读大量的青年研究报告,这些报告都得出结论说,青年人对未来的看法悲观,害怕技术、化学和计算机的挺进,不太重视物质财产。新社会民主党的舆论领导人轻信了这种自我答复,认为它们不是一种变化无常的时代的精神的表达,而是社会价值全面转变的征兆,这种转变将直接导向后物质社会。社民党现在也转向那里——它毕竟总是喜欢把自己理解为"客观的"社会发展进程的先锋。

这样,社民党在80年代中期把后物质主义提升到纲领的高度。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当社民党处于反对派并且不具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的时候,它肯定就再度成为强有力的纲领党了。在1984~1986年之间,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与苦行主义的生态态度完全相适应——多次前往巴伐利亚州阿尔戈伊的伊尔湖修道院。在非公开的纲领会议结束时,他们写出了总共长达107页的报告,其中再次强调了抛弃赫尔穆特·施密特的政策。具有新的、后物质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拒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思想,而前任总理恰好代表了这些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寄希望于生产和消费的生态化,坚持对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一种有道德根据的控制。女性主义思想甚至也在——迄今为止,显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和雇员运动中找到了切入点;社会民主党

人现在要求重新"做许多长期被认为是妇女应该做的事"①。伊尔湖修道院小组的许多观点随后都包含在1989年的《柏林纲领》之中。这份纲领至今仍然继续有效,尽管在它通过之后不久——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德国再度统一,并重返十分传统的面包与黄油问题——就被认为是过时了,在党内也被迅速忘记了。

然而,对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来说,80年代中期的后物质主义转折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现在重新聚集在社会民主党革新与觉醒的光辉形象——维利·勃兰特——的周围。在1983~1985年之间,勃兰特差不多经历了第二个政治春天。与1966年类似,他现在显得很轻松,就好像卸去了重负一般。对于他来说,"三驾马车"的痛苦时期终于过去了。那段时间充满了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几乎毫不掩饰的怨恨——勃兰特,毫无疑问是三个人中最敏感的一个,在领导岗位上可能比魏纳和施密特承受了更多的痛苦。但他比那两个对手在政治上生存得更长久;1983年,只有他还在社民党的领导核心。这种情况异乎寻常地鼓励着这位党的主席。他想再一次领导社民党走向新岸——离开施密特政府沉重压抑的岁月,达到新的联盟、新的社会发展和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他亲自领导了在伊尔湖修道院的纲领小组。

社会民主党人兴奋地跟随了一段时期。"维利"再度成为他们的英雄和偶像。但是,他们逐渐冷静下来了。勃兰特的目标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了:因为他日益喜欢自己的晦涩表达和暗示。即使是他最紧密的跟随者往往也只能猜测他打算干什么。一次,他欢欣鼓舞地高呼红绿多数派;另一次,他则同样坚决地支持大联盟。社会民主党的基层不知所措了,逐渐生起气来——伟大的勃兰特的"纪念碑"开始碎裂了。80年代中期,勃兰特最终使同志们厌烦了。当他让一个无党派的、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女工业经理马格丽塔·马特奥普罗斯担任社民党发言人的徒劳尝试失败之后,他最终于1987年辞职了。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感到震惊,但与此同时也轻松了。

接替具有独特魅力的维利·勃兰特的是又一位管理者,汉斯-约翰

① 这句话出自社民党1989年通过的《柏林纲领》:"未来要求我们大家——妇女和男子们,做许多长期被认为是妇女应该做的事。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关心他人,用想象力战胜突如其来的困难,尤其要同其他人在工作上进行亲密的合作。"——译者注。

·福格尔。不仅是在这方面令人想起一些30多年前从舒马赫到奥伦豪尔的过渡。奥伦豪尔和福格尔都是过渡性人物,更多地是政治经纪人而不是具有创造性的革新者,他们都非常自豪地把自己理解为党的公仆,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宣告者。这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自从奥伦豪尔去世之后,议会党团领导和党的领导第一次再度集于一身。长期以来,已经没有人像福格尔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党内权力。

[**原书第218页图片说明**]1983年,维利·勃兰特在汉诺威新教的教会大会上。施密特和魏纳在社民党内不再起作用了,勃兰特独自领导着党。当时,教会大会是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重要场所。人们希望和那些在施密特总理推动北约"双重决议"之后离开社民党的、和平运动的青年人重新建立联系。

福格尔首先能够依靠联邦议会党团。1983年,他作为赫伯特·魏纳的继任者担任了议会党团主席。他在这个艰难的位置上证明了自己是合适的:在魏纳领导下的最后阶段,议会党团分裂成许多团体和派别,丧失了积极性,表现得无精打采。许多人曾预计,在丧失执政权力之后,议会党团还将进一步瓦解——在70年代早期,联盟党的议会党团的人曾不得不经历这样的局面:从执政角色到反对派角色的转变过程中伴随着多么巨大的党内混乱。但是,福格尔通过严格的纪律和艰苦的工作,阻止了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党团的腐蚀。他强有力地领导着党团,但也和个别议员进行多次谈话,而魏纳在其任期的最后几年里是既没有威力也没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的。此外,他还通过有约束力的管理结构和行政规则来协调他的工作。因此,可怕的混乱没有发生;议会党团成为他管理下的宁静之地——而事实上事情有可能会发展得更加糟糕。

相应地,汉斯-约翰·福格尔从1987年开始也担任党的主席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社会民主党最优秀的学生:永远准时、始终在场、当然也比其他所有人更勤奋和更见多识广。不过,是他缺乏分配任务以及使他人有较大独立行动空间的能力。他把社会民主党的行政管理完全集中到自己身上,以至于常常失去政治视野。在社民党的领导层,本周内累积起来的所有问题都必须逐一地进行深入研究。只要福格尔能够将政策分解

成“一、二、三……”,对于他来说,社会民主党的世界就是正常的。这样,政治就变成主要是行政管理的过程,按照权限明确分类,标记大量的案卷备注,并以声名狼藉的再次呈递而结束。官僚和纪律是福格尔政治的特征,透明封皮是他的象征符号。

[**原书第221页图片说明**]1987年3月,维利·勃兰特和他的“孙子们”:奥斯卡·拉封丹在最前面,但伯约恩·恩格霍姆还绝对没有被挤到边缘。赫塔·多伊布勒-格梅林同属于其中,虽然在其他人后面不容易看清。鲁道夫·沙尔平已经伸长脖子,显然准备跳跃了。事实上,他后来在某个时候跳起来了并惨痛地失败了。“孙子们”——和这张有女士的照片上所缺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①——的斗争使社会民主党人在10多年里都处于紧张状态。

在80年代的后1/3时间内,福格尔以严厉的手段维持党内的平静,通过迅速的妥协方案来阻止纠纷和派别斗争。这一切无疑表现得很安静——总体说来,这一切对于几年前还混乱不堪、争斗不已的社民党来说甚至有些索然无味。但是,福格尔却难以解决众多内部冲突。他关心的只是,要使这些冲突处于控制之下,不引起喧嚣。社民党因而停滞了。但他在关于妇女比例的讨论中却采取了果断的立场。为了使非常有争议的,社会民主党妇女工作委员会自1985年以来强烈要求的,必要的2/3多数比率通过党代会的表决,他于1988年拿出了全部的政治筹码。福格尔成功了,党的性别结构——特别是在干部层面和议员层面上——由此显著地改变了。其结果就是给社民党带来了女性选民的极大同情。

但是不久之后,人们在社民党的内部和外部就既不看重福格尔——当涉及到党的未来的时候,也不看重1987年的总理候选人约翰内斯·劳,而是看重所谓的“孙子”们了。当时,人们能数着叫出名字的有奥斯卡·拉封丹、格哈德·施罗德、伯约恩·恩格霍姆和迪特尔·施波利。维利·勃兰特亲自创造了这一概念,由此,他也削弱了福格尔和劳的权威基

① 指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译者注。

础:从此之后,这两个人注定被看做是过渡性人物,被看做仅仅是党的真正后备领导力量的送水人①。

当时,被过多赞美的维利·勃兰特的"孙子"中有几个人表现得相当没有原则。他们其实更是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孩子,因为他们在阿登纳时代经济奇迹的岁月里成长起来;他们大都来自普通家庭,是第一批——非常成功地——从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的上升机会中获利的人。当他们大学毕业时,职业通道和政治升迁的道路还没有被阻塞。因此,他们很快,相对而言,毫无困难地开始了职业生涯。他们寄希望于煽动,而不是有约束力的原则和不可动摇的价值取向。这一代人从来不是——像他们有时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因此"孙子"们经常表现得如此不严肃、如此玩世不恭,简直有一些被宠坏了。但对于那些事实上不能绝对坚持不可动摇的原则的政治家来说,策略上的不假思索当然也不是坏的品德。

在80年代中期,维利·勃兰特对这件事情从来没有隐瞒,即在所有后备力量的天才中,他准备挑选谁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未来领导人物:萨尔州的奥斯卡·拉封丹。拉封丹代表了和汉斯-约翰·福格尔完全不同的一种政治风格;对他来说,党在任何时候所决定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神圣的,首先就是党章中规定的,被福格尔始终小心翼翼、密切注意的程序规定。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仅仅为党服务;党对于他来讲,更多地是满足其野心的工具。拉封丹想要领导,永远作为第一人指示方向;他想要权力——而且想要尽情享受一切权力。在这个萨尔人身上,没有任何普鲁士人的东西。

拉封丹上升为希望的寄托者、后来是总理候选人,最后成为社民党的主席。对此,他首先应该感谢在此期间全面发展起来的媒体社会。在从倍倍尔到奥伦豪尔的漫长的几十年中,一个像拉封丹——不具备显著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一个不重要的联邦州的州长——那样的人永远不会获得德国政治中的突出职位,更谈不上成为党的第一人了。那时,为了能

① 送水人在历史上指消防队负责用皮桶将水送到起火地点的人,他并不直接承担灭火任务。在某些城市也指向居民家庭送水以收取报酬的人。现在送水人指自行车比赛中主要任务是为主力队员送水,而本人并不追求比赛成绩的队员。这种协作是互惠的,因为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因主力队员的成绩而获益——译者注。

够在社民党内走到最前面，还需要在全国议会党团或者自己家乡的党部中拥有为数众多的一批人。然而在媒体社会里，则不再取决于组织才华，而是取决于信息沟通的才华，几乎没有第二个人像拉封丹那样拥有这些才华。他很快就知道，怎样才能够引起媒体的注意，那就是：打破禁忌。当人们挖苦自己的政党及其主席时；当人们取笑纲领性原则，讽刺党的传统和干部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在电视谈话节目和报纸头条新闻中去做这些事。因此，拉封丹迅速进入了——类似于维利·勃兰特的“孙子”中的第二大天才：格哈德·施罗德——兴趣十足的挑衅者的角色。而且他同样迅速地了解到，媒体不喜欢人们固定于一个题目，因为那样将变得无聊。所以，必须不断地打破新的禁忌；必须永远带来新的惊奇，今天不允许再关心昨天讲过的话。当时，拉封丹出色地拥有这些能力。他在不同的立场之间迅速变换，从左转到右，然后又回来——媒体兴奋了。他旋转般的交换场地绝对没有损害他的名声；相反，终于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媒体现在是这么说的，不是索然无味的、官僚的，而是好奇的、新鲜的、不正统的和灵活的。

[**原书第 222 页图片说明**]1988 年，奥斯卡·拉封丹和汉斯－约翰·福格尔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大多数观察家只把当时的党主席和联邦议会党团主席福格尔看做是过渡期间的管理者。这是令人不愉快的。80 年代中期以来，新社民党真正的领头狼在社民党内外被认为是拉封丹。然而，他表现得不平衡，既有大刀阔斧的阶段，也有踌躇迟疑、动摇不定的阶段。因此，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从勃兰特的社民党到“孙子”的社民党的转换。

在 80 年代后半期，没有人持有这样的想法，即奥斯卡·拉封丹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在旧联邦共和国的最后、也是经济上再次毫无负担的那几年里，他也被看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化主义者。即使是和社民党没有任何瓜葛的经济界头面人物也酷爱勃兰特最喜爱的这个“孙子”。有些人甚至在他身上看到了社会民主党新的经济改革者——海因里希·戴斯特和卡尔·席勒的与时俱进的继任者。在社民党的社会政治利益的

所有守护者当中,拉封丹看起来是现代的、明智的市场经济创新之人。他冷静而具有权力意识地在党内为自己发现了被忽略的题目,而且在对手到来之前就迅速地占有了这些题目。萨尔州的这个州长注意到,文化批评的、悲观的后物质主义的时代过去了,他这个受天主教影响的享乐主义者反正不可能从新教的苦行主义的抑郁开始。拉封丹一直宣称自己是一个文雅的人,是昂贵的葡萄酒、丝绸领带和美女的爱好者。在80年代后期的新富当中,他能够尽情享受这一切;他甚至能够把自己理解为或者策划为已经抛弃了奥格希海姆[①]的市侩习气的一种新政治文化的先行者,理解为开明的、西方的、后民族主义的共和国的代表。当时,只有工会人士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责骂拉封丹,因为他表示支持在没有完全工资补偿的情况下缩短工作时间,在周末也让机器更长时间地运行。然而,传统主义者的狂怒愈加剧烈,这位现代化主义者所放射出的光芒就愈加明亮。

同时,拉封丹对正在到来的社会问题拥有细致、准确的感觉,他能够如此尖锐地表达这些问题,使其处于公众讨论的中心。毫无疑问,这一才华在80年代后期对社会民主党人是有利的,并把他们带入了反对赫尔穆特·科尔领导的衰弱不堪的基民盟的攻势。直到1989年夏天,拉封丹看起来还是社民党合适的总理候选人。正因为他很快地连续代表了对立的政治立场和方向,他做到了同样程度地影响不同的选民阶层:他享受着激进改革者和生态和平主义者的同情,因为他在这个10年开始时曾与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军备政策作斗争,现在则强烈支持生态税。他通过攻击工会的不灵活;通过当时还是非常规的方式,诸如把政治冲突带进电视演播室和谈话节目;还通过他在萨尔州的波恩代表处雇用了顶尖的厨师等手段,令来自增长行业的新中间阶层印象深刻。在萨尔州,拉封丹通过成功的选战证明了,他同样可以动员传统的工人:他比别人更早地预感到"小人物"正在产生的担心,并以绝对平民主义的能量利用它。简而言之,社会民主党人在1989年初可以希望,他们的候选人能够建立起广泛的选民联盟。

1990年末,这个梦想破碎了。拉封丹没有带领他的政党成为新的多数派,而是远远地退回到50年代的"苦海"。在1990年的联邦议会选举

① 奥格希海姆,地名,在德国西部路德维希港市郊——译者注。

中,以他为第一候选人的社民党只获得了33.5%的选票,这是自1957年以来最差的结果。十分完美地推敲出来的现代化战略和社会联盟政策没有发挥作用——德国的统一在此期间摆到了社会民主党人面前。不仅是赫尔穆特·科尔所感受到的统一的历史意义被这个西部边界州的州长顽固地忽略了,在统一进程中的每一个月里,都可以看到拉封丹对两个德国的合并是多么的陌生,这件事对他的触动是多么少,他的怀疑是多么过分。拉封丹始终都没有找到能够赢得当时民主德国公民信任的恰当的话语。即使拉封丹也许正确认识到了重新统一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他过分萨尔的、西德自我中心主义和傲慢的世界主义的大杂烩在1990年也没有切中时弊。

1990年不是奥斯卡·拉封丹之年。风向突然转了,媒体残忍地令其从前的宠儿跌倒。媒体以尖酸的严厉、有些发怒地,最后是居高临下的蔑视的方式说着他的坏话。对拉封丹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转折:从现在开始,他必须改变自己的战略;不能再作为善于利用媒体的沟通天才和社民党的伟大现代化主义者而出现。这个角色现在为其他人空出来了。此外,还有和维利·勃兰特的决裂。1990年,勃兰特明显地和他从前最喜欢的这个"孙子"拉开了距离。当拉封丹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总理候选人因"过分强调德意志特点"而恼火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前总理勃兰特却在进行爱国主义的讲话。除了这一切之外,拉封丹还要处理遇刺事件的后果——他在1990年4月成为一个刺杀事件的受害者。在联邦议会选举痛苦失败的当晚,他深感失望。他抱怨自己党内的大部分人,他的权威走到了终点。他不想在这种情况、这部宪法框架条件下出任建议由他担任的党和议会党团的领导职务。拉封丹首先需要距离,以便思索。

在随后的5年中,社民党陷入了党的历史上也许是最混乱的领导危机。埃里希·奥伦豪尔处在社民党的最高位置上达11年,维利·勃兰特甚至长达将近1/4世纪。然而现在,在90年代的前半期,党的主席则迅速交替。其中的三个人——恩格霍姆、沙尔平和拉封丹——属于"孙子"一代。现在,他们在共和国的公开政治活动中多次被嘲讽。人们认为他们要为充斥在社民党内的混乱负责。当时,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孙子"们最初被远远高估了;在关键时刻,他们不起作用了。

[**原书第226页图片说明**]1990年10月4日,拉封丹在全德联邦议会于柏林的帝国议会老会议大厅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不久前,他还在社民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为总理候选人而得到祝贺。然而,由于他对重新统一的怀疑态度,他没有取得成功;赫尔穆特·科尔仍然是总理。

然而,这种印象并不完全正确:自相矛盾的是,社民党在90年代早期和中期之所以在联邦政治层面如此软弱并因危机而动摇,是因为它在地区层面太强大了。被过多责骂的“孙子”们绝对没有完全不起作用;相反,通过在联邦州的成功,他们在1991~1995年之间已经开始了权力转换。当伟大的维利·勃兰特在1987年引退的时候,社民党只在4个联邦州政府参与执政;当伯约恩·恩格霍姆于1991年接任社民党领导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在10个旧联邦州中的8个州担任部长或者州政府的领导人了。在联邦德国此前的历史上,社民党从来没有像1991年那样,拥有这么多有影响的州长,“孙子”们对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95年,当联邦层面的社民党领导危机在沙尔平领导下达到顶点的时候,甚至有10位州长来自社民党的队伍;此外,该党还参与了另外4个州的内阁。联邦共和国不再是基民盟的国家了。

但正因为如此,联邦层面的社民党无法安静下来。正因为如此,社民党才陷入长久的领导危机。因为党提名越有影响、有雄心的州长,联邦议会党团和党的主席就越难以在他们面前坚持主张。赫尔穆特·科尔在70年代后期想必早已经历过这种情况了,现在,从福格尔到恩格霍姆,再到沙尔平的社民党领导人对此则有了切身体验。联邦共和国的政权交替导致社民党内部的权力分裂。现在,党内同时存在好几个年轻而有影响的州长,他们的志向已经超越了汉诺威、美因兹和萨尔布吕肯的州政府,不想要党主席的政策或者联邦议会党团的战略。最后,就连最严厉的汉斯-约翰·福格尔也没有主意了。特别是他不能把下萨克森州州长格哈德·施罗德压制住,使之坚决支持党的路线。施罗德现在占据了奥斯卡·拉封丹不得不让出来的位置。他计划通过媒体,而不是政治委员会来实现其进一步的平步青云;他甚至经常不去波恩参加主席团的会议。施罗德在他晋升的几年里,绝对没有遵守纪律,而纪律则是他后来当总理

时理所当然地要求的。

[**原书第228页图片说明**]从80年代后期起,社民党在联邦州层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例如在下萨克森州,在1990年的州议会选举中,他们自1974年之后第一次领先于基民盟。格哈德·施罗德——这是选举日当晚他和他当时的妻子希尔特露德——成为红绿联盟政府的领导。

作为党主席,需要拥有相当的活力、严厉、灵敏和党内的支持,以对抗社民党内众多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而推行自己的政策。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个"孙子"在上述所有方面的能力都不足。伯约恩·恩格霍姆在1991年根本也没有想当党的领导,人们只得恳求、逼迫并劝说他,直到他最后屈服。不过从内心来讲,他从来都没有接受这个职务,如果可能的话,他宁可避免呆在党中央。同时,汉斯-乌尔里希·克洛泽担任了联邦议会党团领导人,他的职业生涯其实已经结束了。之所以选择他,只是因为议会党团的大多数人拒绝赫塔·多依布尔勒-格梅林,即汉斯-约翰·福格尔最喜欢的人。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是跟随着一个不想当主席的党主席和一个早就不属于党内真正重要的人物的议会党团主席。

这已经是一对引人注目的搭档,他们应当挑战当时的掌权人物科尔:恩格霍姆和克洛泽两人都是从容不迫的性格,是沉思的抽烟斗的人,是更精神化的人物,而不是本能引导的天生权威型人物;这两个人既没有发号施令,也没有独断专行的姿态。但社会民主党人和这种宽松的领导作风难以良好相处。他们其实期望准确的规定、严格的结构和强硬的手段。不久,他们就开始诋毁来自共和国北部的这两个"软弱的男人"。直到今天,在社民党内还有人持这种看法,即:党和议会党团从来没有像在恩格霍姆和克洛泽领导下那么松散。但这种苛刻的看法并不完全公正。因为在恩格霍姆的领导下,社民党的改变比在福格尔或者后来的沙尔平领导下要多,尽管他与后二者相反,并不是以强者的态度出现的。

当社民党敦促恩格霍姆担任主席职务的时候,他绝不是轻量级的政治人物。他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经历,既有一些成功,也有痛苦的挫折。这种经历使他变得成熟。首先,他在将近14年之久——1969~1983

年——都是联邦议员;在施密特的领导下,他多年担任议会国务秘书和联邦部长;在社会自由联盟结束之后,他在基尔的州议会里共同经历了4年艰难的反对派岁月;直到1998年,他成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州长。恩格霍姆总是以巨大的毅力和耐力追寻——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他的政治目标。

[**原书第230页图片说明**]鼻祖、两个过渡性人物和担任党主席的第一个“孙子”:勃兰特、福格尔、劳和恩格霍姆,社会民主党的三代人。他们在——象征性地——拉一根绳子。但在党的现实生活中,“孙子”们的竞争开始了。直到就这一冲突作出裁决,社民党才安静下来。

恩格霍姆比社民党内的其他“孙子”更强烈地反感自80年代以来在社会民主党人当中蔓延开来的“关门心态”。他很早就认识到,社民党在福利问题和社会问题上日益孤立;认识到社民党过早地变得衰老了,在文化上变得荒芜了。因此,他推动了一次党的改革,即社民党向外来者[①]积极开放,应该给党员个人创造更多的直接民主的影响——社民党至少是这样决定的。但在恩格霍姆之后,社民党不再坚持这些做法了,而且干脆忘掉了这个项目,直到后来的总书记弗兰茨·明特费林在2000年初的时候重新从抽屉里取出了这些计划,以再次对这个久病衰弱的党组织进行改革。

毫无疑问,恩格霍姆最重要的贡献是在难民政策问题上使社民党转变到一种新的立场上来。1992年,他几乎是独自启动了难民政策转折,并且在一个季度之内以巨大的耐力,面对党内激烈的反抗贯彻下去。这并未直接提高他在党内的受欢迎程度,因为他过分要求具有鲜明基层认同的社民党作出痛苦的牺牲。就这一方面而言,恩格霍姆在1992年夏天和秋天真正地领导了自己的政党:他不停地谈论社民党,不是以毫无作用的妥协来摆脱不愉快的事,而是把社民党从一个守不住的阵地推开了。

① 外来者(Seiteneinsteiger)本意是指转行者,在政治上指那些不是某党党员或者没有党内工作经历,但由于其声望仍被该党推举为某一职务的候选人的人士。例如,美国电影演员施瓦辛格于2003年被共和党推举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候选人并成功当选——译者注。

汉斯－约翰·福格尔没有这个能力。相反，他使社民党难民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使是出于某种值得尊敬的原因——教条化了，使自己的政党僵化了，从而导致了和从前城市工人居住区的固定选民疏远了。

在这场路线修正过程中，恩格霍姆和议会党团主席克洛泽并肩战斗。他们两人也曾尝试在其他问题上为社民党提供一种新的动力。因此，尽管面对在党内占优势的和平主义，他们仍然坚决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动用联邦军队；支持一种具有市场经济活力的政策，而不是坚持流行的社会国家主义的思想。尽管他们常常表露出具有忧郁的理性，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政治倾向显然是务实而冷静的。不过，他们两人都不够严厉和粗暴，也许还缺乏阴谋家和可靠的个人势力，以便使社民党成功地开辟新领域。只有在难民政策上，他们以非常有力的行动获得了党代表大会多数代表的支持，但他们也因此而精疲力竭了。其他的所有动议最终也都烟消云散了。社民党在纲领和理论上都真正停滞不前了。

［**原书第233页图片说明**］恩格霍姆不喜欢波恩。他的家乡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始终吸引着他。与拉封丹、沙尔平或者施罗德不同，他不迫切追求权力。他喜欢闲暇，乐于阅读，对艺术感兴趣——至少他展现出这种形象。这在公民看来不是坏事，但在媒体和政治同行那里——包括在社民党内部——他是“软弱的人”。

恩格霍姆绝对不是失败在他对政治沟通的理解，即他在节日讲话中喜欢讲述其“思想工厂”项目；而是相反，他沟通得还不够：进行的谈话不够多，团队工作组织得太少，并且无力在重要的党内人物中形成一致意见。正是在90年代早期开始了整合、交流和意见一致，因为与社会自由联盟的时代——其间，在波恩的“三驾马车”，即勃兰特、施密特和魏纳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紧张的关系——不同，现在，最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党的主席居住在波罗的海边上，他最重要的副手在靠近法国的边界地区等待着其第二次机会，新上来的人则在汉诺威和美因兹蓄势待发。恩格霍姆的任务应该是把所有这些人在政治上凝聚起来，使他们的行动和联邦议会党团的行动协调起来，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他

几乎也没有为此而努力。取而代之的是他日益隐退,回到他的故乡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避风港。他谈话不多,几乎不打电话——社民党的领导结构以令人忧虑的方式解体了。该党失去了团结和意志形成的力量,表现得毫无方向。公众讥笑社会民主党人的"多声部合唱"、讥笑这个"独立发言人的共同体"。这样,恩格霍姆在1993年年初——在不断传出的关于"基尔事件"①的传闻和发现把他赶离岗位和政治之前——就已经深深陷入了旋涡之中。

在恩格霍姆辞职之后的几个月,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对他的继任者进行一次顺利的选举。事实上,鲁道夫·沙尔平代表了与更倾向于犹豫、踌躇的那个基尔人完全不同的政治类型,后者的雄心和权力意志都不突出。1993年,沙尔平想得到要一切:党的主席和总理候选人。当他达到这个目标之后,就立刻进行下一步,从美因兹首相府指挥联邦议会党团;汉斯-乌尔里希·克洛泽已经在其任职的最后一年辞职了。

[**原书第235页图片说明**]1993年,社民党主席候选人在杜塞尔多夫市政大厅亮相。这是该党进行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党员意见问询,以便确定他们的主席。党员们非常喜欢这一方法,将近50万名党员参加了6月13日的党内投票。鲁道夫·沙尔平参与竞争,并战胜了海德马里·维乔雷克-措伊尔和格哈德·施罗德。然而,他也没有能够得到多数支持,只有40.3%的选票投给了他。施罗德也并未因此而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他将最后成为"孙子"们漫长争斗的大赢家。

① 基尔事件又称巴舍尔事件。1987年,在德国石荷州州议会选举之前,该州州长、基民盟党人巴舍尔(Uwe Barschel)采取非法手段对社民党候选人恩格霍姆进行了跟踪和诽谤。具体负责对恩格霍姆实施窃听的州长助手普法伊费尔(Reiner Pfeiffer)在最后关头向《明镜》周刊告发了巴舍尔。《明镜》周刊以《基尔"水门事件"》为题揭露了这一事件。巴舍尔被迫辞职,随后被发现死于瑞士日内瓦。但事件并未就此结束。1993年,石荷州的社会部长、社民党人延森(Günther Jansen)为了救济在基尔事件发生后找不到工作的普法伊费尔,筹集了4万马克的现金送给他。由于延森将筹集来的现金放在一个抽屉里保管,事件曝光后被称为"抽屉事件"。基民盟怀疑延森的动机,要求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恩格霍姆承认他于1987年对巴舍尔事件调查委员会作了伪证。事实上,他早在选举之前,而不是选举当天才知道被跟踪的。因此,他辞去了石荷州州长职务和社民党主席职务——译者注。

凡是恩格霍姆所缺少的东西，沙尔平都拥有得太多了。1993 年，他就已经想当“大师”了，尽管他——至少在联邦层面上——还是政治上的学徒。沙尔平成为党的头号人物，因为他在 1991 年赢得了一次州议会选举，导致了一个传统上的基民盟堡垒的权力更迭。现在，这是获得社民党领导职位的前提条件：一个人必须以某些内在魅力赢得州议会选举，然后，才能对党的最高职位提出要求以及要求成为总理候选人。劳、恩格霍姆是这样，现在的沙尔平，后来的施罗德——在此期间拉封丹曾有很多次——也是这样。然而，沙尔平是他们当中最没有经验的。他在美因兹的州议会经历了整个反对派岁月，其中至少将近六年担任州议会党团主席，两年担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但这也就是全部了。某个人谋求共和国的最高职位，却还不能保住一个完整的州长任期，也从来没有进入过联邦议会。和恩格霍姆相比，沙尔平在联邦政治层面上还是生手。

然而，起初看起来并没有问题：沙尔平身上散发着领导力量，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意志力、活力和韧性的人。他不想成为伟大的表演家，不想成为具有虚幻魅力的变化多端的人，但他肯定也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令社会民主党人重视他了。起初，社会民主党人是感谢沙尔平的，他在党内重新恢复了秩序，确立了清晰的决策结构，规定了目标。在恩格霍姆和克洛泽领导下近乎消沉、冷漠的社民党重新汲取了勇气，而且还觉察到了把赫尔穆特·科尔赶出总理办公室的机会。现在，媒体也较少恶意地报道社民党了，并且开始对新的、年轻的党主席使用友好的词汇。直到 1994 年春，沙尔平都没有受到报纸的恶评，在自己的党内也同样得到相当多的支持。但随后，完全是突然地，气氛发生了逆转——现在，沙尔平无论做什么都是失败的。从现在起，他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得到的几乎只有愚弄和嘲笑。对于社民党来说，这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时期。汉斯－约翰·福格尔把社民党置于官僚主义的忙碌状态；恩格霍姆把社民党引领到沮丧的抑郁之中；但沙尔平对于社民党则是一场灾难。在他 1995 年 11 月下台之前的几个月里，社会民主党人处于他们历史上罕见的可怕而绝望的境地。

回顾地看，这种恶劣境况早在沙尔平就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是第一个——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经过全体党员投票而上台的社会民主党主席。这完全有可能成为特别稳定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

次投票却是太过于策略的手段,来自共和国西部有影响的地区领导人想通过此次投票来阻拦另一个人:固执的下萨克森州州长格哈德·施罗德。因此,原本要求的取得最好名次的两个候选人之间的对决——第二次投票选举[①]被取消了。沙尔平虽然比其对手施罗德和维乔雷克-措伊尔取得了更好的结果,但也只为自己聚集到40.3%的选票。远多于半数的社会民主党人因此是反对沙尔平的——至少人们可以这样理解选举结果,施罗德就是这么做的;他不承认失败,也许片刻都没有怀疑过,本来应该是他,而不是这个乏味的威斯特森林人[②]位于顶点。

[**原书第236页图片说明**]他们之间的争论在1995年秋把社民党推入了深刻的危机:施罗德拥有媒体的青睐,决定着冲突的节奏并表现出活力;沙尔平则相反,日益退回到党内传统主义者和干部的环境中去。他给人以一种局促不安的、不可靠的印象。这样,他在媒体社会里不能过关。

1994~1995年,共和国经历了党内的、但也向所有公众开放的沙尔平和施罗德的对决。施罗德从一开始就是个中人士,即使他最初看起来不具有优势。他始终是比决斗对手更敏感、更狡猾、直觉上更可靠,也更大胆。他决定速度,并选择第二场战斗的决斗场:施罗德利用媒体,即使沙尔平对此具有狂热的性格,也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程度。因为施罗德通过咒骂党的那些过时的教条,取笑无聊的干部、一般的国会议员以及取笑自己的党的领导人等方式,来保证自己在报纸头条和电视中出现。简言之,他复制了拉封丹在80年代扮演的角色。现在,媒体把他看做是煽动者、勇敢的独行者和现代的政治家;看做一个不在乎党的教条的人和推行其务实的、非传统的政策的人。沙尔平做不出这种姿态,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主席,他必须重视党的委员会、党章和党的传统,因为他最终必须使党团结起来,要顾及党的干部,尊重他们的感觉世界——与施罗德相比,沙

① 如果候选人在初选阶段均未获得所要求的超过半数的选票,就要在两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第二次投票选举——译者注。

② 指鲁道夫·沙尔平。威斯特森林是莱茵片岩山在莱茵河中游、拉恩河、迪尔河和齐格河之间的部分,鲁道夫·沙尔平于1947年12月2日出生于该地区——译者注。

尔平是令人厌倦的。一个人在媒体世界里愈强烈地表现为现代的政治家，另一个人就愈退回到党的干部结构中去。沙尔平本来是——特别是在经济、法律和外交政策问题上——改革社民党的；就内容而言，他持有和施罗德完全类似的立场。但是，在媒体作用下的现代化态度却将寻求保护的沙尔平推到党内由国家主义的社会政治家和老68一代人组成的传统网络中。随后，他完全被困在这个角落里了。此外，在反对施罗德的绝望的保卫战中，他和奥斯卡·拉封丹结成了同盟，拉封丹现在——在媒体失宠后——持有很多传统的立场，并把沙尔平更加固定在神圣的党的传统主义之上。

[**原书第239页图片说明**]在1995年的曼海姆党代表大会上，奥斯卡·拉封丹出人意料地参选党的主席，并比现任主席鲁道夫·沙尔平多得了131票。这"很疼"，如沙尔平后来所评价的。对于在1995年秋天处于绝望状态的社民党来说，这意味着转折。新的党主席系统、持续地掌控着社会民主党走向选举胜利并进入联邦政府——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绩。最后，只有格哈德·施罗德一个人从中受益。

如果人们围着沙尔平转的话，将是不美妙的。他日益往后退，变得多疑而沉默寡言。这种情形不禁令人想起像恩格霍姆时期：沙尔平现在也局限于只和几个重要的党内同志沟通，他也做不到将党内不同部分整合并互相连接起来了。最后，1995年秋天，沙尔平完全不知所措了。他现在惹怒了每一个人，并且把自己的政党推向深刻的危机。因此，奥斯卡·拉封丹——由于1990年的选举失败以及发生在萨尔布吕肯的一系列事件，他在政治上已经近乎结束了——能够仅仅通过一次内容非常空泛，但却高亢而有冲击力的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将沙尔平赶下台。沙尔平只是过早地就想一次要得太多——他长期以来不够老于世故，不够灵活——以便能够与拉封丹和施罗德较量。当然还有，沙尔平的胡子太多了。他表现得太生硬、太死板，在相机面前不会炫示——他太像奥伦豪尔了。但1995年的社民党不再是这样一个政党，即能够通过变化无常的媒体社会的忽上忽下去容忍一个这样的人。这种时代也许在维利·勃兰特

升迁的时候就结束了。

1995 年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处于深深的泪水之谷。在党内很少像那几个月那样绝望,没落的气氛如此弥漫。社会民主党人在其历史上曾经必须忍受一些事情,诸如禁止、排斥和恐怖。但那一切只会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受,强化他们的对抗,建立他们的自豪感。然而现在,90 年代中期,他们被置于嘲笑之中,被丢弃在荒谬之中,最后人们对它也只剩下了施舍般的同情。这种侮辱是难以忍受的。1995 年夏天和秋天,党的基层以束手无策的愤怒跟随着来自最高领导层的自我中心的阴谋,媒体则是每天津津有味地报道着这一切。社民党表现得丧失了领导、迷失了方向,他们的未来似乎被损害了。甚至连基督教民主党人现在也开始担忧与其对立的这个人民党的现状了。从 1995 年 9 月底,他们停息了关于社民党困境的敌意评论之火。他们似乎可以毫无风险地承受这样大方的行为——毕竟联盟党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为 47%,几乎达到绝对多数了。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率在 10 月初已经跌落 30% 的标志线,显然还处于继续的自由落体运动中。还没有哪一个执政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一年之后——而且,未能展示特别出色的成绩——就像 1995 年的联盟党那样引人注目;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最大的反对党在议会选举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像社民党那样如此严重地垮掉了。在昏暗的 1995 年秋天,即使是社会民主党内著名的乐观主义者也不相信该党会在 1998 年的下一届联邦议会选举中取胜,这一戏剧性历史事件中的布鲁特斯①——格哈德·施罗德也许一次也没有相信过——但这是历史上没有证实的。

然而,社民党的困难不仅仅是领导危机;仅从鲁道夫·沙尔平一个人无法解释社民党在联邦层面上的失败和长期的消沉。更确切地说,是大量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从 70 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给社民党制造了困扰。首先而且特别要提到的是社会的转型。随着从工业社会向带有强烈第三产业特征的社会过渡,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决定性资源匮乏了:传统工业和大工业领域的雇佣劳动阶级。与此同时,公职人员的数量下降,这就使社会民主党干部和代表的源泉逐渐干涸了。旧的环境缩小

① 布鲁特斯(Brutus),古罗马时期高卢和马其顿的总督,于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和卡修斯一起带领反叛者在元老院的台阶上刺杀了古罗马执政官恺撒——译者注。

了,传承下来的、迄今为止仍能保持的条件瓦解了。更加困难的还有,社会不再是——仍像60年代时看起来的那样——雇员单一的政党了,而是多元化的和分化的。在社民党内能够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一过程的结果。在80年代,联邦德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能够使其选民内如此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协调一致: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兼顾后物质主义的享乐主义者和苦行僧,同时要把新中间阶层中的物质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留在自己的队伍中;但还不能把那些日益向右漂移的人口密集区的下层选民赶走;此外,还有5~6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其他社会团体,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它们吸引进来。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征变得模糊了,不同立场之间的分歧成为纲领和理论上的直接负担。尽管付出了进行整合的一切努力,社民党还是在70~80年代丧失了其选民谱系中关键性的左、右翼的选民部分。在社会自由联盟的早期阶段,60年代后期的"席勒选民"已经离开了社民党,他们来自面向生产和市场的中间阶层;80年代早期,大部分具有生态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告别了社民党,转向绿党;同一年代末期,在青年工人和失业者转变成新的右翼平民主义政党——共和党选民中,专业工人的比例甚至曾一度高于在社民党支持者中的比例。最后,在90年代,社民党的基础选民——特别是在地区选举和乡镇选举中——也很难争取到。简而言之,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着严重的整合问题和动员问题。

社会民主党人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他们坚决实行生态的或者经济现代化的路线,就撵走了对经济变革和价值转换深感不安的基础选民和下层选民,这些选民会感觉在文化上被现在大多受过学院教育的社会民主党的干部们抛弃了;相反,如果他们停留在传统工业的补助金心态的福利国家的传统队伍,就会丧失和数量不断增加的上升阶层的联系。到1994年,社民党尝试了所有相应的可能性:1987~1994年,他们作为"小人物的保护者"而出现。当时,他们充分利用了基础选民的潜能,但却事与愿违地把新中间阶层分离出去了。1990年则与之相反,他们在奥斯卡·拉封丹的领导下遵循生态现代化的路线,表现为世界主义的,并与民族统一拉开了距离,虽然因此重新赢得了绿党阵营的选票,但却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损失惨重。无论这样还是那样,社民党到90年代中期在联邦范围内都不具有多数派能力。

社民党的整合问题还由于党的精英在施密特辞职之后几乎全部都是由4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组成而变得更加尖锐了。这些人受到1968年以及勃兰特时代的影响,在社会民主党青年团里积累了最初的政治经验,并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早期的社会抗议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向党的领导层进军。施密特之后的新社民党精英的立场起初非常之左,因而,这些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基层,尤其是和政治构成极为复杂的社民党的潜在选民脱节了。这就使社民党不同于联邦德国的其他政党,后者当时还能显示出领导团体和全体选民之间的政治标准的高度一致性。

那一代人的成功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社民党使自己完全适应于他们的心态、语言和生活方式。年长者弃党而去了,年轻人再也找不到途径了——这个地地道道的党员党在德国渐渐地失去了党员。1992年,社民党的党员人数第一次降至90万以下,1996年甚至降至80万以下。1997年底,776 183名联邦公民还持有社民党的党证。其中,约有75万人居住在老联邦州。社民党还面临着老龄化。70年代初,青年人还大量加入社民党;但在90年代,青年人却远离社民党。1992年,只有16.5%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处于16岁到35岁的年龄段;1974年时,这一比例还是30.8%。考虑到全部人口情况,青年党员在社民党内极其不具有代表性,尤其是16~25岁这一年龄段。

因此,大量的结构性因素预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能力和未来能力的情况不佳,1995~1997年之间州议会的全部选举结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社民党到处丧失选票,有时甚至是急剧的。1995年,党主席的更替并没有给社民党人在州议会选举和市议会选举中带来新的选民,而是恰恰相反。

然而,在1996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候,共和国的气氛发生了逆转。在民意调查中,联盟党的分值持续下跌;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的声誉却重新上升了。社会民主党非常迅速而成功地进行了传统队伍的形象修正。从1997年起,他们自我展示为政治营销的先锋:选战得到完美的策划并完全处于时代的潮头,总理候选人在媒体的表演极其出色。最后到来的就是社民党巨大的选举胜利。

社会民主党人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似乎证实了解释者们是正确的,他们把一个政党在固定的选民条件消失了的媒体社会里取得的选举成功只

归因于短期的成功因素，特别是归因于营销和候选人的倾向。然而，不应轻率地忽略在政党竞争中长期作用的那些影响的重要性。历史地看，社会民主党的成功是逐步形成的。除了上述的所有问题之外，还存在一些对社会民主党人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的结构上的有利前提条件，长期地看，恰恰是从一些负面消息和社民党的危机因素中成长出新的、直到很晚才被注意到的优势。

[**原书第 242 页图片说明**] 1994 年，沙尔平和他的影子内阁。具有现代选战技术和生动活泼口号的“卡姆帕”(Kampa)时代还没有开始。一切仍然按照经典和传统的模式进行：社民党要求“工作，工作，工作”，要求一个“公正的德国”。他们当时还没有为自己发现“创新”的口号。

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而言，选民谱系的极端多向性虽然不免意味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为社民党赢得了重要的优势地位。因为他们比其他政党早得多地同日益分化——包括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新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社民党因而在某些方面比联盟党更现代，后者直到 90 年代中期才全力重视自己阵营中尖锐的两极分化的期望。当基民盟不再能够消除老社会天主教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并将基督教资产阶级阵营再一次团结成具有多数派能力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在 1998 年的联邦议会选战中——在长期的考验和多次尝试之后——成长为技艺高超的整合艺术家，巧妙地处理了自己的潜在选民中依然存在的严重分歧。

首先，社会民主党人拥有——经常被人忽视的——孕育着未来的潜在选民。与基民盟最主要的支持来自退休者相反，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者在 90 年代中期则特别固定于 30 岁到 45 岁之间的群体中，即正在工作的、承载着社会重任的“为人父母的一代”。这些人的影响在量上就已经相当可观了，因为他们由“婴儿潮”的高出生率那一代人构成。自 80 年代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相当稳定的、支持社民党人和绿党的多数派。这一代人在高度政治化的 70 年代，即社会自由主义时期，所形成的选举行为——与其他许多群体不同——在他们后来的生活经历中几乎没有改变

过。这个从人口统计上看,已经是共和国"新中间"的群体,在90年代的过程中把阿登纳时代和艾哈德时代的社会化队伍挤出了社会的核心,不过,他们的诸如"后现代的灵活性"、"灵活性"和"新独立性"等口号不足以充分地刻画他们的特征,即使有许多人——也包括后来的总理——很愿意做这些事。30~45岁的这一代人在政治上受到70年代的冲突的影响、人道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扩展以及社会福利国家建立的影响;肯定也受到流行音乐和替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在这里,赫尔穆特·科尔的举止最不受欢迎。在这个社会自由主义的"新中间"当中,多年来在乡镇和州的层面上,已经逐渐形成了联邦政治层面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和绿党的多数派。在这个意义上说,波恩的权力更替也是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是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社会结构转型和政治转型的结果,是社会自由联盟时代新社会化经验和当时的社会运动的产物。

绿党的出现对于社民党来说也绝非巨大的不幸——就像社会民主党人在80年代所惧怕的那样。绿党处于议会体制中的左翼,并因此将社会民主党人推向中间。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治坐标体系因之而改变了,这对社民党是完全有利的——对它来说,是开启了新的、另外的联盟的可能性。此外,绿党虽然是左翼的生态政党,但其核心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并从许多联邦州的自由民主党人那里吸引了选票。这样,基民盟在许多情况下就没有联盟伙伴了。正是这一点使社会民主党人——从绝对数量上看,他们的得票下降了——在各联邦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地位。80年代以来,对于政府组成,在政党体制中所处的位置比选民的选票数量更重要。

然而,多数派能力的最终突破仍是由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信息带来的,即对社会公正的要求。通过这一要求,社民党现在也成功地做到了与社会的中间联系起来,使他们和传统阶层聚集在一起,并因此赢得了1998年联邦议会选举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无疑早已不断地尝试通过这一主题寻求成功。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最迟在选战的白热化阶段,他们也总是要回到这个核心信息,即使他们在此期间已经把经济革新和生态革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然而,他们愈不安、愈争论,就愈加想起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因为只有这一斗争能够统一所有派别,并赋予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他们来说是重要的——相对于"社会冷漠"的

"资产阶级"政党的道德优越感。

而很可能也正是这一点往往足以将德国的中间阶层吓退。特别是在经济上较好的科尔时代,感到满足的中间阶层是不会被社会更公正的时代的前景鼓动起来的。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民主党的公正承诺长久以来更多地是负面的,它意味着附加的费用、更高的税负,国家对个人钱袋的干预。在社会上,在中间阶层和工人甚或"失败者"之间,不存在反对"高收入者"的稳固的团结,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出于战略的原因而乐于看到这种团结。

[**原书第246页图片说明**]绿党最初看起来对于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不幸,然而,社会民主党人最终从这个生态抗议运动的政党获利。因为这个党居于政治光谱中的左侧边缘——社民党到达了中心。这就为它开启了新的联盟机会,也因为绿党从资产阶级阶层吸引了选票,基民盟和自民党丧失了多数派能力。这样,就在联邦州出现了红绿联盟,首先是在黑森州,约什卡·菲舍尔——这是他于1985年宣誓就职——成为德国第一位绿党部长。

但在90年代中期,社会中心的气氛逆转了。因为大部分中间阶层现在也由于重新统一的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日益陷入了不利境地。此外,联盟党和自民党内青年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雄辩也激发了已经由此产生的担心。德国的中间阶层担心其财产状况,害怕其社会地位下降,他们事实上已经承受了物质上的损失和限制。当基督教-自由党联邦政府提出税政和养老金改革计划时,他们终于表现出了不信任和担心。现在,1996年底,出现了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雷娜特·克歇尔有些不屑地描述的"社会福利国家信仰的复兴"。多数德国人不再以资产阶级的阐释模式去解释社会和经济中的危机;他们在克服社会困境时不再相信灵活性、节俭和新的独立性,而是希望保持和捍卫集体承担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希望削减退休金,不希望支付附加药品费用,不希望取消生病情况下的工资继续支付。简而言之,他们依附于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社会民主党130年之久的基本要求突然重新获得了现实性,因而,社民党几乎

已经赢得了选举。

[**原书第248页图片说明**]当赫尔穆特·科尔1982年接掌政府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处于一种凄凉的境地,直到90年代后期,也无法使选民相信他们的执政能力。然而1998年,社民党最终成功地使政权更迭了:自1972年以来,他们第一次取得了比联盟党多的议会席位;科尔时代结束了。

就这一方面而言,社民党的选举胜利来自于传统心态的源泉,而不是源自刚刚成功的营销活动这一青春和活力的源泉。当然,还有长期的学习过程。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社会民主党选战胜利的基础。来自“孙子”一代的新的社民党精英经历的成熟过程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们在80年代成功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但当时远还未达到在总理职位斗争中获胜的程度。在老联邦共和国的最后10年,他们参与了所有可能的流行思潮。他们喜欢强调——这对媒体有积极作用——还存在一种超然于政治的生活,并以享乐主义者、美食家和美酒专家的姿态出现。可是这一切表现得更像新富,甚至有点像暴发户的样子。他们虽然因此进入了谈话节目,但这却无助于提高他们在波恩担任总理或者部长职位的可信度。此外,如上所述,他们毫无顾忌地散布相互之间的竞争——因为在这诸多天才之间的领导权问题远没有最终明朗化。

不过,当这一代人中的多个杰出代表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进入州政府时,某些变化发生了。与新的政治责任伴随而来的约束力持续影响着从前“左”倾的后施密特时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并把他们推向了政治的中间。在90年代,社民党迅速地,最终也没有引起党内很大抵抗地放弃了大约于1986年在党内获得多数支持的生态和平主义-后物质主义的立场。在反对难民法改革时,在社民党内还出现了非常高调的抗议;在批准“窃听干预”时,抗议的声音就已经微弱了;1995年之后,尤其是在1999年之后,调整外交立场就可以完全没有噪音地进行下去了。在20年前还那么愤怒地同施密特总理“适应政策”进行斗争的“孙子们”年龄大了,或许只是疲倦且没有幻想了。由于其新的、相当温和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党的基层和选民之间的长年的冲突缓和了。从这一

新的立场出发,社民党自赫尔穆特·科尔上台以来第一次希望,能够将联盟党的选民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原书第251页图片说明**]他们构成了1998年选战的双重领导人,并这样领导社会民主党人重返政权:拉封丹和施罗德之间有纪律约束的竞争为社民党带来重要的得分,该党有一个支持"创新"的代表和一个支持"社会公正"的代表。也许它因此最终成为联邦议会选举中最有力的政党。

然而,这就需要社民党的党内团结和一个有行动能力的领导层。这是社民党自70年代后期以来所一直缺少的,并从根本上导致了社民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的恶劣结果。但在奥斯卡·拉封丹于1995年11月突然袭击式地接任党的主席之后,持久的领导危机似乎最终被克服了。社民党的最顶层现在是——经过许多年的踌躇之后——"孙子"一代当中的真正的领头狼。自80年代早期以来,拉封丹一再以挑衅性的观点——他意图对公众施加影响,以使这些观点尖锐化——向前疾驶。他是他那一代人当中第一个赢得地方权力更迭,并为社民党指明新方向的人,他同时也代表了他那一代人的学习过程和成熟过程。在80年代,他曾陷于变化无常的、享乐主义的媒体宠儿的角色。他起草了大量的政治方案,虽然他只能实现其中很少的几个,但这并没有损害他的形象。随后,他却必须认识到媒体社会的阴暗面:由于90年代初的几个痛苦的事件,他慢慢地得到不良评论,其政治生存受到了威胁。对于拉封丹来说,这是挫折、考验的时期。他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最终表现得更成熟、更严肃、更可靠;现在他成长起来了,足以觊觎社会民主党主席的职位了。

享乐主义者和故意挑衅者在1996~1998年间成为社民党的驾驭者和队伍的领导人。自勃兰特以来,在社民党内还没有人像拉封丹那样获得如此的权威——也许他拥有比勃兰特更多的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力;与勃兰特不同,拉封丹在社民党领导层也非常精确地规定战略路线;同时,他能够重新整合不同的党内团体,即使是地方诸侯和党内巨头,他也会用威胁和恭维相混合的手段把他们约束到社会民主党的新的共同事业中。这在以前,无论是福格尔还是恩格霍姆或者是沙尔平都没有做到

的。经过多年以后，社民党于1996年第一次重新表现出纪律和团结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毫不妥协的联邦政策——拉封丹用这一政策来抨击基督－自由联盟的税制改革——也起作用了。他认识到，科尔政府的改革方案在很大一部分民众当中引发了担忧，社会公正的问题变得日益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他使社民党和政府尖锐对立，并因此做到了动员自己的、长期丧失勇气的支持者。对于联邦议会选举结果，拉封丹的领导艺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他们在联邦参议院成功的封锁政策，社会民主党人终于重新展示了团结和行动能力。这一切正是他们长期缺少的，许多选民也因此并不认为他们具有执政能力。

[**原书第253页图片说明**]社会民主党人把美国的选战方法引进了德国。1997年9月，他们的专家和一些新招募的人员搬进了距离真正的党中央300米远的所谓"卡姆帕"(Kampa)，即社民党新的选战中心。"卡姆帕"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成为媒体中成功故事的题材。在照片上，社民党选战的最高总管、党的总书记弗兰茨·明特费林指着上方的一个时钟，它显示着"科尔总理还剩下的"天数和小时数。明特费林的计算实现了。

不过，拉封丹不是一个令资产阶级阵营有好感的人。他虽然常常通过其洪亮尖锐而又不容置疑的讲话来激励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但这并不能使他接触到社民党右侧的、仍然迟疑不决的中间选民，而这些选民对于社民党的多数派能力至关重要。如果让拉封丹作为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联盟党就很容易使用有效的阵营选战的战略，以重新巩固资产阶级的阵营，使其走上团结一致地反对政治左派的立场。然而，反对一位长期以来和联盟党的政治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的，呼吁更多现代化、创新、灵活性和独立性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就困难得多了。面对这位新中间的格哈德·施罗德，联盟党传统的反社会主义的方法落空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两个领导人的决定——社会民主党人以此投入1998年的联邦议会选战——是改变德国政治多数派关系的漫长里程的最后一步。社民党这一次既没有尝试80年代那样的目标群体战役，也没有尝试各种各样的一揽子纲领。极其不同选民阶层的整合现在更多地是

通过人员，即通过拉封丹和施罗德，而做到的。拉封丹通过谴责共和国内的社会不对等并宣布与新自由主义作斗争的方式，来动员社会民主党的核心团体；施罗德则相反，他首先就全力针对处在社民党和联盟党之间的边界阶层，这些人在科尔执政16年之后首先希望社会和经济的新振兴。因此，社民党的两个领导人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德国人矛盾的心理状态：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原则上赞成对过度上涨的、财政无力承担的社会福利国家结构进行改革，但却又坚决地拒绝任何具体的、将导致个人损失的步骤。大部分德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创新，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对创新感到恐惧。通过这两个领导人，社会民主党有可能迎合这两种趋势；福利国家的辩护士、老工会干部和放松调控的支持者、年轻的公司创始人同样都对社民党感到满意。如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从现在与未来、适应与变革、担忧与希望的紧张关系中获得政治力量。

[**原书第255页图片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到达了目的：在1998年9月的联邦议会选举中，他们获得了40.9%的选票，领先于联盟党5.7个百分点——一次历史性的胜利。总理候选人施罗德对此作出了两个胜利的手势。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愿意长期被看作新中间的政党，和基民盟几十年来作为老中间的政党完全一样。然而，新中间在政治上很难确定，是经常波动和随时变化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99年的地方选举中就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无论如何，争取柏林共和国新中间的斗争还不明朗。

然而，为了在选民市场获得最多的选票，两个领导人并非真正必要。在选民的感觉中，施罗德绝不仅仅是现代化者和中间阶层的代表，而且也一直是制度政治的毫不犹豫的社会干预者、破产企业的收购者、一个战争寡妇土生土长的儿子，有时也是自然的大男子主义者，他能同样影响着开宝马和开曼塔的人。这就解释了施罗德为什么能够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作为鲁道夫·沙尔平的竞争者——提出了他对领导权力的要求：通过其巨大的覆盖面，他成功地策划了选民联盟，福格尔和沙尔平没有实现这一联盟，而且这一联盟也不是通过纲领性的宣言就能够得到的。施罗德在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时就受到了不同选民群体的欢迎：既在窃听

措施的广大支持者那里,也在其反对者那里;既在生态和平主义者那里,也同样在工会人士那里;既在后物质主义者那里,也在物质主义者那里;既在爱国者那里,也在世界主义者那里。施罗德没有明确的政治形象。他根据具体情况接受民意,据为己有并表达它。为此,当然要忍受很多政治纲领之苦,但是毫无疑问,这对社民党争取多数派能力有利。

[**原书第257页图片说明**]施罗德、约什卡·菲舍尔和拉封丹刚刚签署了联盟合同,气氛是热烈的,甚至是放纵的;应该会快乐地执政并创造新的政治文化。当时,没有人预料到这一时期很快就将变得异常严肃,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必须决定动用军队的问题。

最后,还有当时非常著名的"卡姆帕"①——令人吃惊的社民党现代的选战中心。迄今为止,在德国还没有哪一个政党如此美国化地开展他们的选战,恰恰是社民党——典型的干部党、委员会党和意识形态党——将选战的"美国化"向前推进了巨大的一步。然而,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根植于传统的:为了在党内实现这一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这个人是就弗兰茨·明特费林,土生土长的威斯特法伦人,当时是党员人数最多的党区的领导人,随后是社民党内最大的州联合会的主席。他是拥有自身权威的党的管理者,而不是党主席的执行助手或者仅仅是党主席的下属。只有像他那种类型的社会民主党人,才有能力驱散存在于党内积极分子中的对"媒体选战和洗涤剂选战②"的深刻不信任。在才智上肯定更出色、举止上更现代的他的前任们——彼得·格洛茨、君特·费尔霍伊根,或者还包括卡尔海因茨·布莱辛——恐怕也做不到这一切。也许,他们从未允许迈出第一步,即把选战中心从埃里希·奥伦豪尔大楼分离出去,并安置在大约300米远的大办公室内。明特费林希望藉此摆脱多年来笼罩着党中央的压抑的气氛。只有最有能

① 卡姆帕(Kampa)是Kampagne(运动、竞选活动、政治宣传活动)一词的缩写。1998年德国联邦选举时,社民党总书记明特费林用它来命名德国社民党选举中心。通过卡姆帕,社民党的选举方式改变了,变得更加现代、更加美国化了——译者注。

② 指在选举中采用类似于洗涤剂广告策略的竞选广告——译者注。

力的人才能从党中央一同前往新的总部。此外，还雇用了有兴趣、有热情、有思想的年轻的新人。速度、新鲜、生动活泼——这应该是“卡姆帕”的写照。

社民党比其他所有政党都更早地开始了选战——正好是在联邦议会选举的一年之前。他们使用最现代的通讯技术并且雇用了一个有创造性的、具有烟草销售经验的营销企业。社会民主党选举纲领中的所有要求都经过民意调查的检验；最受欢迎的内容被凝缩为核心信息，并转化为常用的图片主题和口号。突然，社会民主党传统队伍的选战不再像早些年那样散发着工人福利社会的难以接近的气氛，而是表现得机敏、时髦而突发奇想。几个月来，“卡姆帕”本身就一直是报纸和电视报道的对象，这些报道大都是友好的，同时，总是发现令人惊愕的结果：恰恰是落伍的社民党老大妈领导着德国最现代的选战。

社会民主党人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自 1980 年的上一次胜利以来，第一次没有公开进行关于联盟问题的争论。拉封丹和施罗德虽然发出了红绿优先的信号，但他们也接受大联盟。伴有幻想般的社会生态方案的红绿爱情婚礼的时代早已结束了，组成大联盟不再会使社民党特别骚动甚或是分裂了。最后，社会民主党人从这样的情况中获利，即大多数评论家纯粹从计算出发，认为大联盟是可能的，而红绿多数在选战的最后阶段还被看作是不现实的。因此，1994 年就准备改变的基民盟选民感到这次将选票投给社会民主党人更容易了。就这样，大联盟的支持者使得红绿联盟成为可能。

格哈德·施罗德成为联邦总理。

结束语：
在柏林共和国

在选举胜利的几个月之后，施罗德又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席，拉封丹的政治篇章也随之结束了。这或许一定会发生。拉封丹和施罗德——一个人就足够了。在1998年的选战中，这两个强者的合作还十分顺畅，虽然这是一场充满风险的高空走钢丝表演，随时都可能失败，因为在两人之间从未有过关于所策划的双重领导的细节的详细约定。他们各自制定策略，完全是由直觉得到的。这种方式运转正常，因为他们都很守纪律地采取行动，在几个月里都相互顾惜对方。他们想获得政权——因而，他们彼此需要。

然而，当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权力之后，则只能有一个人占据最高位置。这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很难忍受，尤其是他显然认为自己在才智和思想上更胜一筹。但是他也许感觉到，自己不可能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人：在他1990年的失败之后，拉封丹不再是那个容易获得德国人同情的希望的化身及其所希望的总理。为了这一目标，他自1990年以来表现得太固执、太自以为是，他现在作为财政部长也是如此——他的名望很快就消失了。拉封丹再次成为寂寞的反叛者，他和全部的其余世界——媒体中的新自由主义评论家、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们、经济界的大人物——较量。以这一姿态，拉封丹最初曾在政治上到达了非常高的位置，但那是反对派的、宣传鼓吹者的、社民党代表大会的英雄所持的立场。对于一个合作民主中的负责任的部长，这种姿态是不适合的。拉封丹把所有的政治团体和经济团体都当作敌人，而这些团体恰恰是他必须通过谈判和对话拉到一起来，以达成协议的。最后，他孤立了，没有行动能力了。他抛弃了一切，包括内阁职位和党主席的职务，退出了政治舞台——此刻，他该为这

个决定追悔莫及了。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深刻地影响了80～9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而现在他只能局限于在外部进行毫无结果和有点不伦不类的抱怨。

拉封丹退出之后，施罗德在众多"孙子"们争夺社民党领导权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成为最大的赢家。1999年4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选举他为党的主席，这就把他置于拉萨尔、倍倍尔、舒马赫和勃兰特的行列之中。这不无讽刺意味，因为施罗德恰恰是通过不断攻击自己的政党而将其政治生涯向前推进的，他并不是一个珍视党的传统和特别顾及党的心理状态的人。在90年代，施罗德和社民党之间更多地是一种不顺畅的关系。但他现在是总理——而且也必须成为党的领导人。不过，大多数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此并没有热情的反应。人们不安地回忆起关于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的路线的混乱的党内争斗。施罗德表现得与施密特相似，他也同样乐于表明自己是平民的人民总理，是脱离自己的政党而发挥作用的。社会民主党人——如同他们从历史经验中得知的——总是难以和这种实用主义类型的掌权者相处。许多人担心，1999年将重复该党在1979年曾经忍受过的一切：在社民党及其总理之间可能再度发生一场深刻的冲突；而且，这一次施罗德还担任着党的主席。凡是令社会民主党人害怕的，都是令媒体高兴的。无论如何，人们有时期待着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和一个反对施罗德的坚定的党内反对派。

然而，1999年不再是1979年了。社民党已经改变了。之所以会改变，是因为党的积极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那批人。在干部和代表的岗位上，人们看到的几乎全部都是从前的施密特的反对者。不过，当年30多岁的这些人现在年长了20岁。1979年，他们还信仰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并以极大的热情提出了激烈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的理论，参与了所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政策的游行。当时，他们的职业生涯尚未开始，他们的个人前途远远超越了施密特时代，所以，他们不必担心施密特的垮台。而1999年时，一切都不同了，从前的反叛者疲倦了，他们不想再搞费力的游行示威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之梦已醒，从前的宏伟纲领已泛黄。这些人当中，无人在现任总理之后的时代还有前途。

这一切都有助于施罗德地位的稳固，尽管发生了1999年欧洲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的失败。与施密特不同，施罗德不必为自己队伍中狂热、年

轻、渴望行动的反对派——从前的反叛者维乔雷克－措伊尔、沙尔平、施特拉塞尔、拉封丹或者施罗德自身类型的年轻后代——而烦恼了。他既不必抵御巧言善辩且组织良好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粗暴攻击，也不必在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替代方案的支持者面前捍卫其客观的政治概念。在社民党内，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与施密特不同，施罗德可能是强有力的，因为社民党内部现在是如此虚弱。当然，外部的战争和危机局势也对他有利，因为这对行政机构和政府首脑来说总是内政否决权使用次数大幅减少的时期。这几乎是基督教民主的条件，施罗德在这种条件下可以作为总理行动。社民党赋予他所想要得到的一切。该党在军事干预政策中跟随他；在联盟危机的时候给他以信任；在党代表大会上支持他——几乎是完全一致地，虽然有些迟疑，但却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即使是反对派在2001年夏天那次短暂的反对军队进驻马其顿，也更多地是无力又无语的，是缺乏领导、结构和方向的。社民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总理选举联合会，几乎不再是一个拥有固执的意志构成、固执的精神生活和大胆的未来方案的庞大政党。

今天，社民党变得虚弱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将近140年以来，它其实是一个不幸的政党：常常被排斥，有时被迫害，很少能够执政。但社会民主党人自身——恰好是在其充满苦难的时刻——并非是不幸的。他们于自己的存在、于自己的行动、也于自己的边缘位置中看到了一种崇高的意义。他们相信自己的历史使命，相信自己阶级解放的力量，相信自己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有些天真、有些乌托邦，甚或是愚蠢而不明智的，其实是不现代的，但社民党唯有如此才成为德国最古老的政党——因为它是这样的，因为它借助其党员的使命感战胜了失败、禁止和恐怖的压迫。社会民主党唯一的生活力量和生存下来的力量取决于道德的优越感、纲领的可靠性以及社会民主党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稳定的认同感。

上述的一切所剩无几了。社会民主党人今天看起来更多地是气馁、不安和胆怯的。他们的党在执政，处在国家的顶端，出任了总理、总统、联邦宪法法院院长和联邦议会议长。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却并非真正幸运。他们顶多对于自己的政党能够做到这一切而感到满足，并且不无自豪地看到，自己的政党首脑和总理是怎样用很多政治计谋熟练而冷酷地骗过基民盟的新领导层的。终于不再是他们，而是迄今在权力政治的阴谋中

完全是被他们缓慢超过的“黑色”，一段时间内要承受公众尖刻的批评了。这一切使得党员主体与施罗德和解了，他拥有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所特别缺少的坚韧的权力意志。

此外，社会民主党从前的积极分子变得安静了，几乎失语了。党的集会上也总是充满忧郁的气氛，人们有时甚至感觉到心灰意冷，例行公事成了最好的情况。无论如何，社民党已不再是战斗的政党了：在年长者中，可以看到许多厌倦而筋疲力尽的面孔；在面颊圆胖的勤奋的年轻人当中，几乎没有人仍反感这个世界的不公正，没有人谴责剥削压迫或者呼吁现存制度的替代方案；没有哪一个派别仍热情地为党的政治路线而争斗，即使是正式宣布的党纲辩论，在社民党的所有层面上都没有引起共鸣。在漫长的几十年中成为社会民主党特征的所有一切——如经常是有些尖锐的、过度激动的和令人筋疲力尽的；但同样也是引人注目的、固执、严肃和可以承受的——全都消失了。

对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他们行动的意义丧失了。所以，他们是那样的受拘束、那样的毫无动力。他们入党本来是因其要求在大工业领域实施更多的共同决定和经济民主，要求更有力地控制投资和更多的国家的框架计划；他们与外交政策的国家干预作斗争并经常代表一种原则性强的和平主义；要求大力推动社会生态的改革，对高收入者更大强度地征税；要求一个稳固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扩建的社会福利国家。他们是新自由主义的公开敌人，是放松国家调控、去国家化和市场正统观念的反对者。

这些要求中几乎没有一个至今依然存在；联邦政府决定的，至少是宣布的许多内容是违反这些目标的。为了这些目标，党的积极分子战斗了那么长时间；为了这些目标，他们多年来每个周六都在市场搭起帐篷，散发传单。当然，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知道，旧的观念世界毁灭了，他们至少预见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甘心于新的情况：他们既无能力，也不愿意热情宣传政府的政策。他们自己丧失了自己的主题、符号和明确性，以及自己的语言；而更多的是丧失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和自信心、社会主义旧的激情，而这些正是其积极性的推进剂和灵丹妙药。由此，社民党虽然失去了慷慨激昂者和教条主义者，但同时它的——如前些年的许多地方选举所显示的——运动能力也非常

弱了。非职业的义务工作恰恰需要思想、信念和伦理;只有从这一切当中才能获得力量,首先是获得意义。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可以动用这些资源。因而,他们并不是现实政治的大师,并慢慢地沦为反对派;但也正因此,在所有的政党中,他们拥有理想主义者、行动主义者和组织者的最强大的队伍。

现在,这些资源很大程度上耗尽了。这对于社民党的行动能力和党的内在活力是不利的;而对于社民党的执政能力及政治现实主义则是有利的。通过社民党的去意识形态化,至少总理的工作肯定是容易了。鉴于施罗德处理工作的方式,从一开始,在党员中间就不存在过高的期望或者是兴奋的觉醒气氛。这样一种希望——政府更迭同时是一次突然的和根本的政策更迭——也不是太强烈,否则,他们肯定会失望。在这一方面,施罗德比维利·勃兰特或者菲利普·谢德曼以及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要容易一些。在魏玛共和国之初和70年代早期,社会民主党人一直对参与执政怀有过多的期望;结果却非常失望,最初的支持者随之极端化了;最后,他们愤怒地反对社民党——激烈的党代表大会战斗爆发了,人们对背叛和投机感到极大的愤慨。这一切在任何时候都是伟大叙述和坚持意识形态的党的阴暗面。这样,施罗德就可以高兴了,上述内容在社民党内所剩无几了,因而,他可以消除那些恰好处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中间选民对红绿联盟可能出现的不可靠、出格和不稳定的担心,这些担心可能把他们吓倒。从其行动主义解放出来的社民党仿佛是有纪律的、理性的政党和总理忠诚的队伍。毫无疑问,与毫不妥协的争论或者旷日持久的纲领冲突相比,这样能够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更多的赞同。对于选战的管理者来说,处于静止的政党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件幸事: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推行其专业性地设计的媒体运动和营销运动,不受执著于意识形态并因而不灵活的、由业余活动分子组成的基层的打扰,后者始终固执地坚持着僵硬的基本原则、决议和纲领目标。

因此,总理、部长和政治精英非常普遍地珍视这个处于静止的政党——它不惹麻烦,不招致不满。媒体社会愈向前发展,政党机构的驯服也许就愈重要。因为在媒体社会里,内部意见纷争和结构缺失的政党是没有机会的:它们被看作是不和睦且没有行动能力的,是危害到共和国的混乱队伍。不追求政权的政党也许还能够做到,进行一场漫长而激烈的

关于政治基本问题的辩论。在倍倍尔、韦尔斯甚至勃兰特的时代，这一切还是可能的；而对于处在施罗德时代的社民党，这一点目前恐怕是很难想象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自 1998 年执政以来以及在执政联盟中，社会民主党非常胜任，因为它“非行动化”了。另一方面，社民党却又尤其立足于这一年龄段的人，即在党内喧嚣和社会大纷争的年代，政治上曾深受影响的那些人。社会民主党选民的这一核心群体由 50～60 年代早期出生的人组成。在这一代人当中，社民党遥遥领先于联盟党；即使在选举严重失利的 1999 年，社民党在这一群体里——只是在这里——仍继续领先。因此，从前的扭打和方向斗争不仅仅是起了威慑的作用。巨大的、公开解决的冲突能够影响、塑造，特别是能够长期地凝聚队伍。驯服的政党缺少冲突，因而也就缺少凝聚其支持者的黏合剂。所以，这些政党——不合逻辑地——反倒比来自混乱和冲突的政党更加不稳定、更加脆弱。

这同样适用于政治精英的质量。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伟大领袖都是在党内的宗教战争和派别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伴随着头破血流、遭受伤害和挫折，不仅从倍倍尔到勃兰特是如此，而且施罗德也正是如此。施罗德在混乱的社民党内学会了他的“手艺”，在阴谋、代际斗争和文化战斗中发展了他应对危险的本能。这样，他今天才能够在柏林政治的“鲨鱼池”内坚守；他需要用这种本能和老于世故的媒体代表、狡猾的游说者、好斗的反对派领袖以及其他国家非常强硬的政府首脑打交道。在混乱中，人们获得了在安排得当的职业生涯中很难形成的品格：尖刻、渗透力、雄辩力、勇猛、坚定、好斗以及平民主义的力量。施罗德成为统治者，成为政治手法上老谋深算的社会民主党人队伍的领导人，因为他参与了——在他学习和晋升时期——尚未驯服的社民党的无数争吵和冲突。

因此，从前的混乱却有违常理地成为今天稳定的基础。但今天的这种稳定却可能导致明天的抑郁。因为在静止的政党内部，纲领性的想象消失了，富有成效的争论之火熄灭了，雄辩的力量不复存在了。这个党扶持那些一般人，扶持那些斤斤计较、政治上过分谨慎的追名逐利者，扶持立志要当国务秘书的自得的青年国会议员这一类人；相反，他们当中不再能产生像拉萨尔、倍倍尔、勃兰特，也包括拉封丹和施罗德那样的冒险者、大胆的思想先驱和政治家。因此，在施罗德之后，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列中

很可能将出现几个能干的地方政治家、勤奋的部长、品行端正的国务秘书,以及有专门知识的部门负责人;但不会出现能够影响、团结并大力推动社民党向前进的人,思考新的、适应时代的社会民主党叙述内容的人,希望,并且能够成为领头狼的人。在基督教民主党竞争者那里,毕竟已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事情:静止的总理党是当前稳定的基础,但同时也是未来不稳定和衰弱的前提。这一切并非一定会在社民党内发生——从经验上看,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比基督教民主党人更反复无常——然而这一切却是可能发生的。

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到达了社会的中间,一段漫长的历史就此结束了。社会民主党人不再处于社会的边缘,肯定不必再担心被歧视;他们不再需要自己的环境和替代的世界,以便退回去并躲避于其中。他们不再惧怕权力,不再容忍资产阶级,不再怀有一个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伟大梦想、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的伟大梦想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伟大梦想。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不信任也消失了;他们早就不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主要的办法了;他们也不再想用约翰·迈纳德·凯恩斯的理论调控经济了。社会民主党人不再拥有光辉的乌托邦了,不再眷恋迷人的憧憬了,不再期待巨大的"崩溃"和集体拯救的新帝国。

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更少意识形态的、更平和的并因而具有执政能力的政党;一个拥有左翼和右翼联盟伙伴的政党。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却因此变得更加贫穷了:它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特征,作用有些模糊了;从现在起,他只是众多党派中的一个。对于社民党来说,特殊的紧张关系消失了,他们从这种紧张关系中总是得到力量、活力和幻想;这种紧张关系存在于"是"和"应该是"、经验和超验、适应和变革之间。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只是讲求实际的、实用主义的和适应现实的。这也使得社民党变得更苍白无力、更缺少希望、一定程度上也更平庸。它首先是对外部的行动压力作出反应,而不再是拥有自己的要求、标准和具有未来设想的自治组织。通过从自己的历史中解放出来,社民党失去了尤其使它历史上强大,关心它的存在的那些素材。社民党也依靠,特别在困难时期是依靠党的回忆、传统、故事、教义、苦难经历而生存的;是依靠超出现实之外的伟大思想前景而生存的。这一切曾在诸多历史形势下阻碍了社会民主党人,但却也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今天,社会民主党人从自己的神话和神圣承诺中解脱出来了。不再有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叙述,100 多年来,它们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是党的黏合剂和推动剂,但也意味着是负担和障碍。现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能够或者必须离开这一切而生存。这既能够对社民党有利,但也会威胁到它的生存。还不能确定,社会民主党是否还能继续存在另一个百年;无论如何,社民党不再拥有伟大的信息了。但这一切也许根本就是不必要的。

时间简表

1848 年　德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工人联合会(4 月);在施蒂凡·伯恩的领导下,在柏林成立了“工人兄弟会”(8 月 23 日 ~9 月 3 日)

1854 年　德意志联邦议会解散了所有的工人联合会(7 月)

1863 年　“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成立;斐迪南·拉萨尔当选为主席(5 月 23 日)

1864 年　斐迪南·拉萨尔死亡(8 月 31 日)

1869 年　“社会民主工党”(SDAP)在爱森纳赫成立(8 月 7 ~8 日)

1875 年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哥达纲领》(5 月 22 ~27 日)

1876 年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普鲁士被禁止(3 月 30 日)

1878 年　《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危害社会和治安的法令》实施(2 月 21 日)

1890 年　帝国议会拒绝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 月 25 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次在帝国议会选举中成为得票最多的政党(2 月 20 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9 月 30 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10 月)

1891 年　德国社民党通过《爱尔福特》纲领(10 月 21 日)

1912 年　德国社民党第一次成为帝国议会最大的党团(1 月 12 日)

1913 年　奥古斯特·倍倍尔去世(8 月 13 日)

1914 年　社民党帝国议会党团批准了战争预算(8 月 4 日)

1916 年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国际团”(斯巴达克团)成立(1 月 1 日);社民党帝国议会党团批准战争预算的问题而分裂;“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协会”成立(3 月 24 日)

1917 年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在哥达成立(4 月 6 ~ 8 日)

1918 年　有社民党参与的马克斯·冯·巴登公爵政府成立(10 月 4 日);菲利普·谢德曼(社民党)号召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11 月 9 日);来自社会民主党多数派(MSPD)和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人民代表委员会组成政府(11 月 10 日);“德国共产党”(KPD)成立(12 月 30 日)

1919 年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谋杀(1 月 15 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当选为帝国总统(2 月 11 日);社民党、德国民主党(DDP)和中心党组成菲利普·谢德曼政府(2 月 13 日);谢德曼政府辞职(6 月 20 日);社民党、中心党以及后来的德国民主党组成古斯塔夫·鲍尔政府(6 月 21 日)

1920 年　社民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心党组成赫尔曼·米勒政府(3 月 27 日);社民党选举失败和联盟政府结束(6 月 6 日);独立社民党在加入共产国际后分裂(10 月 12 ~ 17 日);独立社民党的左派和德国共产党合并(12 月 4 ~ 7 日)

1921 年　《格尔利茨社民党纲领》(9 月 18 ~ 24 日)

1922 年　独立社民党的其他党员和多数派社民党合并(9 月 24 日)

1925 年　艾伯特去世(2 月 28 日);社民党的《海德堡纲领》(9 月 13 ~ 18 日)

1928 年　社民党、德国民主党、中心党和德国人民党(DVP)组成赫尔曼·米勒政府

1929 年　德国共产党将社民党作为主要敌人(6 月)

1930 年　赫尔曼·米勒政府联盟解体(3 月 27 日);社民党容忍下成立布吕宁政府(9 月 14 日)

1931 年　社民党左派分裂，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SAP）（10 月 4 日）；社民党、全德工会联合会、黑红金帝国国旗队和工人体育协会联合成立抵抗纳粹的“钢铁前线”（12 月 23 日）

1932 年　社民党支持了保罗·冯·兴登堡当选联邦总统（3 月 13 日）；奥托·布劳恩（社民党）的普鲁士邦政府垮台（7 月 20 日）

1933 年　社民党帝国议会党团拒绝了《授权法》（3 月 23 日）；禁止社民党并开始大规模逮捕社民党人（6 月 22 日）

1934 年　流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OPADE）发表《布拉格宣言》（1 月 28 日）

1941 年　在伦敦成立“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在不列颠联盟”（3 月 19 日）

1945 年　库尔特·舒马赫在汉诺威主持通过社民党重建决议（4 月 19 日）；共产党和社民党在柏林成立“共同行动委员会”（6 月 19 日）

1946 年　在苏占区，共产党和社民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ED）（4 月 20～21 日）；库尔特·舒马赫当选社民党主席（5 月 11 日）

1947 年　社民党党团通过决议，在联合经济区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中充当反对派（5 月）

1949 年　议会委员会通过德国宪法，社民党赞成（5 月 8 日）；库尔特·舒马赫当选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9 月 6 日）

1950 年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与社会民主主义作斗争”的决议（7 月 20～24 日）

1952 年　库尔特·舒马赫去世（8 月 20 日）；社民党通过《多特蒙德行动纲领》（9 月 24～28 日）；埃利希·奥伦豪尔当选社民党主席（9 月 27 日）和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10 月 7 日）

1957 年　“全德人民党”自行解体，部分党员转入社民党（5 月19 日）

1958 年　社民党组织章程变更：“政治局”被理事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团”所取代（5 月 18～23 日）

1959 年　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11 月 13 ~ 15 日)

1960 年　赫伯特·魏纳在议会发表演讲:赞成在已签协议基础上的联邦政府和反对派的共同外交政策(6 月 30 日);维利·勃兰特当选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11 月 21 ~ 25 日)

1961 年　柏林墙修建后东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县级组织解散(8 月)

1963 年　埃里希·奥伦豪尔去世(12 月 14 日)

1964 年　维利·勃兰特当选社民党主席和总理候选人(2 月 15 ~ 16 日);弗里茨·埃勒当选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3 月 3 日)

1965 年　下萨克森州成立基民盟和社民党联合政府(5 月 12 日)

1966 年　基民盟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联邦政府(12 月 1 日)

1967 年　弗里茨·埃勒去世(2 月 22 日);赫尔穆特·施密特当选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3 月 14 日)

1969 年　古斯塔夫·海涅曼在自民党的支持下当选联邦总统(3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选民动议"建立(3 月 24 日);以维利·勃兰特为总理的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组成(10 月 21 日);赫伯特·魏纳当选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10 月22 日)

1970 年　《德苏互不侵犯与合作协定》(8 月 12 日);德波关系正常化协定;维利·勃兰特在华沙隔离区集中营的纪念碑前下跪(12 月 7 日)

1971 年　维利·勃兰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2 月 10 日)

1972 年　基民盟/基社盟对联邦总理勃兰特的不信任投票失败(4 月 27 日);社民党第一次成为联邦议会的最大党团(11 月 19 日);联邦德国和东德签订双边关系正常化基础协定(12 月 21 日)

1974 年　维利·勃兰特因为纪尧姆事件而辞去联邦总理职务(5 月 6 日);赫尔穆特·施密特接任联邦总理(5 月 16 日)

1981 年　波恩举行了约 30 万人参加的和平示威活动(10 月 10 日)

1982 年　社民党和自民党议会党团在信任投票中一致支持联邦总理施密特(2 月 5 日);在自民党部长退出政府之后,社民党和自民党的联盟结束(9 月 17 日);通过建设性的不信任案表决,赫尔穆特·科尔当选联邦总理(10 月 1 日)

1983 年　汉斯·福格尔当选社民党总理候选人(1 月 21 日);汉斯·福格尔当选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3 月 8 日)

1985 年　奥斯卡·拉封丹当选萨尔州州长(4 月 9 日);黑森州成立霍尔格·伯尔纳领导的由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12 月 12 日);约翰内斯·劳当选社民党总理候选人(12 月 15 日)

1986 年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4 月 26 日);社民党代表大会决定逐步退出核能(8 月 25 ~ 29 日)

1987 年　黑森州红绿联盟结束(2 月 9 日);维利·勃兰特辞去社民党主席职务(3 月 23 日);汉斯 - 约翰·福格尔当选社民党主席(6 月 14 日);社民党和统一社会党起草文件"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共同安全"(8 月)

1988 年　伯约恩·恩格霍姆当选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州长(5 月 31 日);社民党在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妇女比例决议(8 月 30 日 ~ 9 月 2 日)

1989 年　社民党发表新党纲草案(3 月 10 日);"东德社会民主党"(SDP)在柏林施万特区秘密成立(10 月 7 日);埃里希·昂纳克辞去所有职务,埃贡·克伦茨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10 月 18 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辞职(12 月 3 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给党名加上后缀"民主社会主义党"(PDS)(12 月);社民党通过新党纲(12 月 18 ~ 20 日)

1990 年　东德社会民主党(SDP)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1 月 12 ~ 14 日);赫伯特·魏纳去世(1 月 19 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SED/PDS)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2 月 4 日);东部社民党通过党纲,维利·勃兰特担任名誉主席,易卜拉姆·伯梅担任主席(2 月 22 ~ 25 日);奥斯卡·拉封丹当选社民党总理候选人(3 月 27 日);易卜拉姆·伯梅辞去东部社民党主席职务(4 月 2 日);在东德地区成立以洛塔尔·德·迈泽利(基民盟)为州长和社民党参加的多党联盟政府(4 月 12 日);奥斯卡·

拉封丹遇刺(4月25日);沃尔夫冈·蒂尔泽担任东部社民党主席(6月9日);社民党人民议会党团脱离东德政府联盟(8月19日);社民党柏林地区组织统一(9月15日);重新确立社民党的统一,通过《柏林宣言》(9月26~27日)

1991年 鲁道夫·沙尔平当选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5月21日);恩格霍姆担任社民党主席(5月29日);汉斯·克洛泽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11月12日)

1992年 维利·勃兰特去世(10月8日)

1993年 恩格霍姆辞去社民党主席、总理候选人和石荷州州长职务(5月3日);鲁道夫·沙尔平在党员普选后担任社民党主席(6月25日)

1994年 在民社党的容忍下,社民党和联盟90/绿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组成(社民党)领导下的少数派政府("马格德堡模式")(7月21日);鲁道夫·沙尔平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10月18日)

1995年 奥斯卡·拉封丹同鲁道夫·沙尔平竞选社民党主席,并获得成功(11月16日)

1998年 格哈特·施罗德当选社民党总理候选人(3月2日);彼得·斯特鲁克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10月20日);格哈特·施罗德担任联邦总理(10月27日);社民党和民社党在麦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组成领导下的联盟政府(11月3日)

1999年 奥斯卡·拉封丹辞去社民党主席和联邦财政部长职务(3月11日);格哈尔德·施罗德继任社民党主席(4月12日);约翰内斯·劳当选为联邦总统(5月23日);社民党总部迁往柏林(7月)

2001年 社民党和联盟90/绿党的联邦议会党团以4票反对票通过对联邦总理施罗德的信任投票(11月16日)

参考文献

1. Adolph, Hans J. L.: Otto Wels und die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894 ~ 1939.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 1971

2. Albrecht, Richard: Der militante Sozialdemokrat. Carlo Mierendorff 1897 bis 1943. Eine Biographie, Bonn 1987

3. Albrecht, Thomas: Für eine wehrhafte Demokratie. Albert Grzesinki und die preußische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Politik, Bonn 1999

4. Albrecht, Willy: Kurt Schumacher. Reden – Schriften – Korrespondenzen 1945 ~ 1952, Berlin/Bonn 1985

5. Alexander, Thomas: Carl Severing – Sozialdemokrat aus Westfalen mit preußischen Tugenden, Bielefeld 1992

6. Apel, Hans: Der Abstieg. Politisches Tagebuch 1978 ~ 1988, Stuttgart 1990

7. Appelius, Stefan: Heine. Die SPD und der lange Weg zur Macht, Essen 1999

8. Bahr, Egon: Zu meine Zeit, München 1996

9. Barclay, David E.: Schaut auf diese Stadt. Der unbekannte Ernst Reuter, Berlin 2000

10. Baring, Arnulf: Machtwechsel. Die Ära Brandt/Scheel, Stuttgart 1982

11. Bebel, August: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Mit einem einleitenden Vorwort von Eduard Bernstein. Neusatz nach der Jubil – äumsausgabe von 1929, Bonn 1980

12. August Bebel – Repräsentant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Mit Beiträgen von Dieter Langewiesche, Klaus Schönhoven und Peter – Christian Witt, Heidelberg 1991 (Kleine Schriften/Stiftung Reichspräsident – Friedrich – Ebert – Gedenkstätte, Nr. 7)

13. Bernstein, Eduard: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7. Aufl., Berlin/Bonn 1977

14. Beibel, Hans – Joachim: Gewerkschaften in Krieg und Revolution. Arbeiterbewegung, Industrie, Staat und Militär in Deutschland 1914 ~ 1920, Teil I und II, Hamburg 1981

15. Bösch Frank: Die Adenauer – CDU. Gründung, Aufstieg und Krise einer Erfolgspartei 1945 ~ 1969, Stuttgart/München 2001

16. Brandt, Rut: Freundesland. Erinnerungen, Hamburg 1992

17. Brandt, Willy: Links und frei. Mein Weg 1930 ~ 1950, Hamburg 1982

18. Brandt, Willy: Erinnerungen, 3. Aufl., Frankfurt am Main 1980

19. Brandt, Willy: Auf dem Weg nach vorn. Willy Brandt und die SPD. 1947 ~ 1972, bearb. Von Daniela Münkel, Bonn 2000

20. Broszat, Martin: Die Machtergreifung. Der Aufstieg der NSDAP und die Zerstö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München 1984

21. Burchardt, Rainer/ Knobbe, Werner: Björn Engholm. Die Geschichte einer gescheiterten Hoffnung, Stuttgart 1993

22. Dowe, Dieter/ Klotzbach, Kurt (Hg.): Programmatische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3. Aufl., Bonn 1990

23. Dowe, Dieter (Hg.) Partei und soziale Bewegung. Kritische Beiträge zur Entwicklung der SPD seit 1945, Bonn 1993

24. Dowe, Dieter (Hg.): Herbert Wehner (1906 ~ 1990) und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onn 1996

25. Dowe, Dieter (Hg.): Schumacher und der > Neubau <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nach 1945, Bonn 1996

26. Dürr, Tobias/ Walter, Franz (Hg.): Solidagemeinschaft und fragmentierte Gesllschaft: Parteien, Milieus und Verbände im Vergleich.

Festschrift zum 60. Geburstag von Peter Lösche, Opladen 1999

27. Friedrich Ebert. 1871 ~ 1925. Mie einem einführenden Aufsatz von Peter – Christian Witt, 2. Aufl., Bonn 1980

28. Eppler, Erhard: Plattform für eine neue Mehrheit. Ein Kommentar zum Berliner Programm der SPD, Bonn 1990

29. Eppler, Erhard: Komplettes Stückwerk. Erfahrungen aus fünfzig Jahren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u. a. 1996

30. Eppler, Erhard: Die Wiederkehr der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98

31. Ettinger, Elzbieta: Rosa Luxemburg. Ein Leben, Bonn 1990

32. Euchner, Walter (Hg.): Klassiker des Sozialismus, 2 Bde., München 1991

33. Fische, Benno: Theoriediskussion der SPD in der Weima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Bern/ New York 1987

34. Gerlach, H. Von: August Bebel. Ein biographisches Essay, München 1909

35. Gilcher – Holthey, Ingrid: Das Mandat des Intellektuellen. Karl Kautsky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1986

36. Glotz, Peter: Der Weg der Sozialdemokratie. Der historische Auftrag des Reformismus, Wien/ München/ Zürich 1975

37. Glotz, Peter: Die Innenausstattung der Macht. Politisches Tagebuch 1976 ~ 1978, München 1979

38. Glotz, Peter: Die Beweglichkeits des Tankers, München 1982

39. Glotz, Peter: Kampagne in Deutschland. Politisches Tagebuch 1981 ~ 1983, Hamburg 1986

40. Glotz, Peter: Die Linke nach dem Sieg des Westens, Stuttgart 1992

41. Grebing, Helga (Hg.): Entscheidung für die SPD. Briefe und Aufzeichungen linker Sozialisten 1944 ~ 1948, München 1984

42. Grebing, Helga: Arbeiterbewegung und politische Moral. Aufsätze, Kommentare und Berichte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Göttingen 1985

43. Grebing, Helga: Arbeiterbeweging. Sozialer Protest und kollektive Interessenvertretung bis 1914, 3. Aufl., München 1993

44. Grebing, Helga: Negative Integration und revolutionärer Attentimus.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am Vorabend des 1. Weltkrieges,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1973

45. Groh, Dieter/ Brandt, Peter: > Vaterlandslose Gesellen <. Sozialdemokratie und Nation 1860 ~ 1900, München 1992

46. Hachtman, Rüdiger: Industriearbeit im > Dritten Reich <. Untersuchungen zu den Lohn - und Arbeitsbedingungen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Göttingen 1989

47. Hagemann, Karen: Frauenalltag und Männerpolitik. Alltagsleben und gesellschaftliches Handeln von Arbeiterfrauen in der Weimar Republik, Bonn 1990

48. Heimann, Horst/ Meyer, Thomas (Hg.): Reformsozial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e. Zur Theoriediskussion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 Republik, Berlin 1982

49. Heimann, Siegfried: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Stöss, Richard (Hg.): Parteien - Handbuch. Die Parteien der Bunder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 ~ 1980, Sonderausgabe, Bd. 4, Opladen 1986, S. 2025 ~ 2216

50. Heimann, Siegfried/ Walter, Franz: Religiöse Sozialisten und Freidenke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3

51. Herzberg, Wolfgang/ von zur Mühlen, Patrik (Hg.): Auf den Anfang kommt es an. Sozialdemokratischer Neubeginn in der DDR 1989. Interviews und Analysen, Bonn 1993

52. Hölscher, Lucian: Weltgericht oder Revolution. Protestant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Zukunftsvorstellungen im Kaiserreich, Stuttgart 1989

53. Kielmansegg, Peter Graf: Nach der Katastrophe. Eine Geschichte des geteilten Deutschland, Berlin 2000

54. Klenke, Dietmar: Die SPD - Link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regionalen organisatorischen Grundlagen und zur

politischen Praxis und Theoriebildung des linken Flügels der SPD in den Jahren 1922 ~ 1933, 2 bde., Münster 1983

55. Klenke, Dietmar/ Lilje, Peter/ Walter, Franz: Arbeitersänger und Volksbüh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2

56. Kleβmann, Christoph: Zwei Staaten, eine Nation. Deutsche Geschichte 1955 ~ 1970, Göttingen 1988

57. Klönne, Arno: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Geschichte, Ziele, Wirkungen, München 1989

58. Klotzbach, Kurt: Der Weg zur Staatspartei. Programmatik, praktische Politik und Organisatio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45 bis 1946, Berlin 1982

59. Kocka, Jürgen: Lohnarbeit und Klassenbild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1800 ~ 1875, Berlin/ Bonn 1983

60. Kocka, Jürgen (Hg.): Arbeiter und Bürger im 19. Jahrhundert. Varianten ihres Verhältnisses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München 1986

61. Kocka, Jürgen: Weder Stand noch Klasse. Unterschichten in Deutschland um 1800, Bonn 1990 (Geschichte der Arbeiter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Bd. 1)

62. Kocka, Jürgen: Arbeitsverhältnisse und Arbeiterexistenzen. Grundlagen der Klassenbilding im 19. Jahrhundert, Bonn 1990 (Geschichte der Arbeiter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Bd. 2)

63. König, Rudolf/ Soell, Hartmut/ Weber, Hermann (Hg.): Friedrich Ebert und seine Zeit.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der Forschung, München 1990

64. Könke, Günter: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Sozialdemokratie und Staat. Eine Studie zur Ideologi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 Republik (1924 ~ 1932), Stuttgart 1987

65. Kronawitter, Georg: Mit allen Kniffen und Listen. Strategie und Taktik der dogmatischen Linken in der SPD, Wien u. a. 1979

66. Krone, Heinrich: Tagebücher, Bd. 1: 1945 ~ 1961, bearb. Von

Hans - Otto Kleinmann, Düsseldorf 1995

67. Kühn, Heinz: Auf den Barrikaden des mutigen Wortes. Die politische Redekunst von Ferdinand Lassalle und Otto von Bismarck, August Bebel und Jean Jaurès, Ludwig Frank und Karl Liebknecht, Rosa Luxemburg und Clara Zetkin, Giacomo Matteotti und Otto Wels, Konard Adenauer und Kurt Schumacher, Bonn1986

68. Kurz, Thomas: > Blutmai <. 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 im Brennpunkt der Berliner Ereignisse von 1929. Berlin 1988

69. Langewiesche, Dieter: Politik - Gesellschaft - Kultur. Zur Problematik von Arbeiterkultur und kulturellen Arbeiterorganisationen in Deutschland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2 (1982), S. 359 ~ 402

70. Langewiesche, Dieter/ Schönhoven, Klaus (Hg.): Arbeiter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Lebensweise der Arbeiterschaft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0

71. Lehnert, Detlef: Reform und Revolution in den Straegiediskussionen der kla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is zum Ausbruch des 1. Weltkrieges, Bonn 1977

72. Lehnert, Detlef: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Protestbewegung und Regierungspartei 1848 bis 1983, Frankfurt am Main 1983

73. Lehnert, Detlef/ Megerle, Klaus (Hg.): Politische Teilkulturen zwischen Integration und Polarisierung. Zur politischen Ku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90

74. Leif, Thomas/ Raschke, Joachim: Rudolf Scharping, der SPD und die Macht. Eine Partei wird besichtigt, Reinbek 1994

75. Lemke - Müller, Sabine: Ethischer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Demokratie. Der politische Weg Willi Eichlers vom ISK zur SPD, Bonn 1988

76. Lepsius, Rainer M.: Parteisystem und Sozialstruktur. Zum Problem der Demokratisierung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in: Wirtschaft, Geschichte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Festschrift zum 65. Gebutstag von Friedrich Lütge, Stuttgart 1966

77. Lösche, Peter/ Scholing, Michael/ Walter, Franz (Hg.): Vor dem Vergessen bewahren. Lebenswege Weimarer Sozialdemokraten, Berlin 1988

78. Lösche, Peter/ Walter, Franz: Zur Organisationskultur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Niedergang der Klassenkultur oder solidargemeinschaftlicher Höhepunkt?,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5 (1989), S. 511 ~536

79. Lösche, Peter/ Walter, Franz: Die SPD: Klassenpartei - Volkspartei - Quotenpartei. Zur Entwicklung der Sozialdemokratie von Weimar bis zur deutschen Vereinigung, Darmstadt 1992

80. Löwenthal, Richard/ von zur Mühlen, Patrik (Hg.): Widerstand und Verweigerung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Berlin/ Bonn 1984

81. Luthardt, Wolfgang (Hg.):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bewegung und Weimarer Republik. Materalien zu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927 ~ 1933, 2 Bde., Frankfurt am Main 1978

82. Mallmann, Klaus - Michael: Kommunis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volutionären Bewegung, Darmstadt 1996

83. Malycha, Andreas: Auf dem Weg zur SED. 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Bildung einer Einheitspartei in den Ländern der SBZ. Eine Quellenedition, Bonn 1995

84. Matthias, Erich: Kautsky und der Kautskyanismus. Die Funktion der Ideologie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in: Marxismus - Studien 2, Tübingen 1957

85. Mersburger, Peter: Der schwierige Deutsche. Kurt Schumacher. 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 1995

86. Meyer, Thomas: Bernsteins konstruktiver Sozialismus. Eduard Bernsteins Beitrag zur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Berlin/ Bonn 1977

87. Meyer, Thomas: Die Transformation der Sozialdemokratie. Eine Partei auf dem Weg ins 21. Jahrhundert, Bonn 1998

88. Meyer, Thomas u. a. (Hg.): Lexikon des Sozialismus, Köln 1986

89. Michalka, Wolfgang (Hg.):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1984

90. Michels, Robert: 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oligarchischen Tendenzen des Gruppenlebens, Neudruck der 2. Aufl., Stuttgart 1957 (zuerst 1925)

91. Miiler, Susanne: Burgfrieden und Klassenkampf.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im Ersten Weltkrieg, Düsseldorf 1974

92. Miiler, Susanne: Das Problem der Freiheit im Sozialismus. Freiheit, Staat und Revolution in der Programmatik der Sozialdemokratie von Lassalle bis zum Revisionismusstreit, 5. Aufl., Berlin/ Bonn 1977

93. Miiler, Susanne: Die Bürde der Mach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918 ~ 1920, Düsseldorf 1978

94. Miiler, Susanne/ Potthoff, heinrich: kleine Geschichte der SPD.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ation 1848 ~ 1990, 7. ,überarb. u. a. erw. Aufl., Bonn 1991

95. Mooser, Josef: Arbeiterleben in Deutschland 1900 ~ 1970. Klassenlagen, Kultur und 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4

96. Neumann, Sigmund: Die Partei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5. Aufl., Stuttgart 1986 (zuerst Berlin 1932)

97. Niclauβ, Karlheinz: Kanzlerdemokratie. Bonner Regierungspraxis von Konrad Adenauer bis Helmut Kohl, Stuttgart u. a. 1988

98. Nipperdey, Thomas: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 ~ 1918, 2 Bde., München 1990/1992

99. Offermann, Toni: Arbeitebewegung und liberales 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1850 ~ 1963, Bonn 1979

100. Pflanze, Otto: Bismarck, Bd. 2: Der Reichskanzler, München 1998

101. Pyta, Wolfgang: Gegen Hitler und für die Republik.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mit der NSDAP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89

102. Ristock, Harry: Neben dem roten Teppich. Begegnungen, Erfahrungen und Visionen eines Politikers, Berlin 1991

103. Ritter, Gerhard A: Die sozialistis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Republik, in: Pöls, Werner (Hg.):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politischen Wandel.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Welt, Stuttgart 1979, S. 100 ~ 155

104. Ritter, Gerhard A.: Staat, Arbeitschaft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Vom Vormärz bis zu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Bonn 1980

105. Ritter, Gerhard A.: Die Sozialdemokratie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 sozialgechichtlicher Perspektive,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9 (1989), S. 295 ~ 362

106. Ritter, Gerhard A.: Arbeiter, Arbeiterbewegung und soziale Ideen in Deutschland.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 1996

107. Ritter, Gerhard A./Tenfelde, Klaus: Arbeiter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1871 bis 1914, Bonn 1992 (Geschichte der Arbeiter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Bd. 5)

108. Rohe, Karl: Wahlen und Wählertraditionen in Deutschland. Kulturelle Grundlagen deutscher Parteien und Parteiensysteme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92

109. Rojahn, Jürgen/Schelz, Till/Ateinberg, Hans - Josef (Hg.): Marxismus und Demokratie. Karl Kautskys Bedeut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2

110. Rosenbaum, Heidi: Proletarische Familien. Arbeiterfamilien und Arbeiterväter im frühen 20. Jahrhundert zwischen traditioneller, sozialdemokratischer und Kleinbürgerlicher Orient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2

111. Rudolph, Karsten: Die sächsische Sozialdemokratie 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 1871 ~ 1923, Weimar u. a. 1995

112. Rother, Bernd: Die Sozialdemokratie im Land Braunschweig 1918 bis 1933, Bonn 1990

113. Saage, Richard (Hg.): Solidargemeinschaft und Klassenkampf.

Politische Konzeptionen der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Frankfurt am Main 1986

114. Schäfer, Rainer: SPD in der Ära Brüning. Tolerierung oder Mobilisierung? Handlungsspielräume und Strategien sozialdemokratischer Politik 1930 ~ 1932, Frankfurt am Main 1990

115. Scharpf, Fritz: Sozialdemokratische Krisenpolitik in Europa. Das > Modell Deutschland < im Vergleich,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16. Scharrer, Manfred: Die Spaltung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 1983

117. Schmersal, Helmut: Philipp Scheidemann 1865 ~ 1939. Ein vergessener Sozialdemokrat, Frankfurt am Main u. a. 1999

118. Schmidt, Helmut: Weggefährten. Erinnerungen und Reflexionen, Berlin 1996

119. Schneider, Michael: Unterm Hakenkreuz.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 Bonn 1999 (Geschichte der Arbeiter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Bd. 12)

120. Schober, Volker: Der junge Kurt Schumacher. 1895 ~ 1953, Bonn 2000

121. Schöllgen, Gregor: Willy Brandt. Die Biographie, Berlin/ München 2001

122. Schönhoven, Klaus: 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1987

123. Schönhoven, Klaus: Reformismus und Radikalismus. Gespaltene Arbeiterbewegung im Weimarer Sozialstaat, München 1989

124. Schorske, Carl E.: Die große Spaltung.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905 ~ 1917, Berlin 1981 (engl. Ausgabe 1955)

125. Schreiber, Hermann: Willy Brandt. Anatomie einer Veränderung. Photographiert von Seven Simon, Düsseldorf u. a. 1970

126. Schröder, Dieter: Erich Ollenhauer, München/Köln 1957

127. Schulz, Klaus - Peter: Sorge um die deutsche Linke. Eine

kritische Analyse der SPD – Politik seit 1945. Köln/Berlin 1954

128. Schulze, Hagen: Otto Braun oder Preuß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u. a. 1977

129. Schuster, Jacques: Heinrich Albertz. Der Mann, der mehrere Leben lebte. Eine Biographie, Berlin 1997

130. Schwarz, Hans – Peter: Adenauer. Der Staatsmann: 1952 ~ 1967, Stuttgart 1991

131. Schwarzmüller, Theo: Otto von Bismarck, München 1998

132. Seebacher – Brandt, Brigitte: Ollenhauer. Biedermann und Patriot, Berlin/Bonn 1984

133. Seebacher – Brandt, Brigitte: August Bebel. Künder und Kärmer, Berlin/Bonn 1988

134. Seifert, Jürgen/Thörmer, Heinz/Wettig, Klaus (Hg.): Soziale oder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Link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eundesgabe für Peter von Oertzen zum 65. Geburtstag, Marburg 1989

135. Smaldone, William: Rudolf Hilferding. Tragödie eines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en, Bonn 2000

136. Soell, Hartmut: Fritz Erler.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2 Bde., Berlin/Bonn – Bad Godesberg 1976

137. Soell, Hartmut: Der junge Wehner. Zwischen revolutionärem Mythos und pragmatischer Vernunft, Stuttgart 1991

138. Solidargemeinschaft und Milieu. Sozialistische Kultur – und Freizeitorganisa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gel. Und hg. von Peter Lösche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zu Berlin, 4 Bde., Bonn 1990 ff.

139. Sommer, Karl – Ludwig: Wilhelm Kaisen.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onn 2000

140. Stampfer, Friedrich: Die vierzhen Jahre der ersten deutschen Republik, 3. Aufl., Hamburg 1953

141. Steinberg, Hans – Josef: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Zur Ideologie der Partei vor dem 1. Weltkrieg, 5. erw. Aufl., Berlin 1979

142. Storm Gerd/Walter, Franz: Weimar Linkssozialismus und Austromarxismus. Historische Vorbilder für einen > Dritten Weg < zum Sozialismus?, Berlin 1984

143. Sühl, Klaus: SPD und öffentlicher Dien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öffentlich Bediensteten in der SPD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olitik 1918 ~ 1933, Opladen 1988

144. Tammena, Heiko: > Unser schönes rotes Luckenwalde <. Lager, Milieu und Solidargemeinschaft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zwischen Ausgrenzung und Verstaatlichung, Münster u. a. 2000

145. Teichler, Hans - Joachim/Hauk, Gerhard (Hg.):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s Arbeitersports, Berlin 1987

146. Tenfelde, Klaus: Proletarische Provinz. Radikalisierung und Widerstand in Penzburg/Oberbayern 1900 ~ 1945, München 1982

147. Thamer, Hans - Ulrich: Verführung und Gewalt. Deutschland 1933 ~ 1945, Berlin 1986

148. Ullrich, Volker: Die nervöse Großmacht. 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71 ~ 1918, Frankfurt am Main 1997

149. Ullrich, Volker: Otto von Bismarck, Reinbek 1998

150. Vogel, Hans - Jochen: Nachsichten. Meine Bonner un Berliner Jahre, München 1996

151. Wachenheim, Hedwig: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1844 ~ 1914, Köln/Opladen 1967

152. Wachenheim, Hedwig: Vom Großbürgertum zur Sozialdemokratie. Memoiren einer Reformistin, Berlin 1973

153. Walter, Franz: Nationale Romantik und revolutionärer Mythos. Politik und Lebensweisen im frühen Weimarer Jungsozialismus, Berlin 1986

154. Walter, Franz: 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 - und Intellektuellenorganisa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1990

155. Walter, Franz/Denecke, Viola/Regin, Cornelia: Sozialistische

Gesundheits – und Lebensreformverbände, Bonn 1991

156. Walter, Franz/Dürr, Tobias/Schmidtke, Klaus: Die SPD in Sachsen und Thüringen zwischen Hochburg und Diaspora. Untersuchungen auf lokaler Ebene vom Kaiserreich bis zu Gegenwart, Bonn 1993

157. Walter, Franz/Dürr, Tobias: Die Heimatlosigkeit der Macht. Wie die Politik in Deutschland ihren Boden verlor, Berlin 2000

158. Weber, Petra: Sozialismus als Kulturbewegung. Frühsozialistische Arbeiterbewegung und das Entstehen zweiter feindlicher Brüder: Marxismus und Anarchismus, Düsseldorf 1989

159. Weber, Petra: Carlo Schmid. 1896 ~ 1979.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1996

160. Wehler, Hans – 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3: Von der >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1849 ~ 1914, München 1995

161. Weichlein, Siegfried: Sozialmilieus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Lebenswelt, Vereinskultur, Politik in Hessen, Göttingen 1996

162. Wette, Wolfram: Gustav Nos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Düsseldorf 1987

163. Wickert, Christl: Unser Erwählten. Sozialdemokratische Frauen im Deutschen Reichstag und im Preußischen Landstag 1919 bis 1933, Göttingen 1986

164.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 bis 1924, Berlin 1984 (Geschichte der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Bd. 9)

165.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Der Schein der Normalität.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 bis 1930, Berlin 1985 (Geschichte der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Bd. 10)

166.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 bis 1933, Berlin 1987 (Geschichte der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Bd. 11)

167.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Hg.):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 ~ 1933. Handlungsspielräume und Alternativen, München 1992

168. Witt, Peter Christian: Friedrich Ebert. Parteiführer, Reichskanzler, Volksbeauftragter, Reichspräsident, 2. Aufl., Bonn 1988

169. Zollitsch, Wolfgang: Arbeiter zwischen Weltwirtschaftskris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Beitrag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Jahre 1928 bis 1936, Göttingen 1990